《汉译大众精品文库》经济类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

[美]理查德·布隆克 著
林季红 译 杨仁敬 校

PROGRESS AND INVISIBLE HAND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经济类

精汉品译

中国人民银行图书馆藏书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

[美]理查德·布隆克 著
林季红 译 杨仁敬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Z0031451
中国人民银行
图书馆藏书
F014.3/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美)布隆克著;林季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2

书名原文:Progress and the Invisible Hand

ISBN 7-214-02590-6

Ⅰ.质… Ⅱ.①布… ②林… Ⅲ.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研究 Ⅳ.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67074 号

书　　名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
著　　者　[美]理查德·布隆克
译　　者　林季红
责任编辑　许尔兵　张惠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印　　数　1—6125 册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590—6/F·600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Progress and the Invisible Hand
Copyright © 1998 by Richard Bronk,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前　言

女士们对美国人本质上的乐观主义的丧失，那种不断追求进步的梦想的丧失，那种认为一切都会好转的自信心的丧失感到悲哀。这往往被看做是社会经济学的规律，就像万有引力是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每个小孩都会比他或她的父母过得更好，社会将一步步地向前发展。可是现在这个规律已不再起作用了。

——帕蒂·瓦德迈尔，《金融时报》，1996 年 2 月 10 日，关于依阿华会议的报告

这种越来越糟的感觉表明，人民和政治家已经分道扬镳了。40 多年来，整个政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财富的创造，财富可以用人均 GDP 来衡量，因此人均 GDP 的增长率是经济成功或国家成就大小的试金石。不论是人民还是政治家都认为，高增长率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是取得选民支持的通

行证，而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戴维·马库安德，《观察家》，1996 年 6 月 9 日

这两段摘录集中反映了 90 年代后期的一种日益明显的现象。在整个发达国家，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财富和繁荣是与日渐焦虑不安的社会共同存在的，这种焦虑显然是被那让人觉得越来越糟的因素触发起来的。当我们展望下一个世纪的时候，世界弥漫着一种不安和悲观的气氛，这使政治家们感到困惑，让社会评论家感到忧虑。政治家们继续许诺，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欢迎变化，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和持续不断的进步，因而就可以更有效地追求经济的增长。但对他们的许多选民来说，高经济增长率和在越来越快的变化节奏下保持高增长率，显然并不能再保证人类进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

本书意在通过对进步这个概念的模糊性进行探究，并着重探讨过去的 200 年里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关系，从而对目前这种悲观主义进行观照。特别是本书分析并指出的，那种认为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经济条件下可以自发地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与整个社会进步之间建立起毫不含糊的联系的乐观主义的假说，已经日益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其中许多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无力防止和解决的，有些问题则会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极大地加剧。

本书并不企图对进步的概念和经济增长的本质作十分全面的综合的叙述，也不想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推动人类进步的

制度，即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谁是谁非作出断然的裁决，而是通过分别分析这些制度的主要特征，从而令人信服地解释人们为什么对人类进步日益缺乏信心，对经济增长感到失望。本书是为非专业人员而写的。在对不同学科的专家——包括哲学、历史和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回顾和审视后，把我们在世纪末遇到的主要问题提出来。由于现代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强，因此无论是对学者还是对大众来说，要把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整个地综合起来考虑，都是同样让人感到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本书开头几章对人类进步的本质进行总体的分析，并主要对决定人们对人类和社会进步产生自信心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本书对人类进步这一广阔领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人类幸福的进步这个重要而又谜一般的概念作了扼要的讨论，以便对我们生活中容易受明显的、可以度量的进步影响的那些方面作出解释。然后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对未来的焦虑和悲观的心态提供一个历史的观照。这可以通过对人类进步产生自信心的主要条件的描述，通过对各个时代那些增强或削弱人们对人类进步的信心的哲学、宗教、科学和文学思潮的探究而获得。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早期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及认为社会的目标在于使绝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有关思想上。

直到过去几年，有关人类进步的思想好像建立在科学探索不断发展和对经济增长奇迹的阐述之上。当然过去200年了不起的经济增长不仅提供了推动人类进步的主要机制，而且是人类进步的体现。本书的后半部分更集中地探讨经济增长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在当今时代的变化，并论证自由市场经

济体制的局限性将日益削弱两者之间的积极的联系。政治上的辩论还是经常坚持两者之间积极的有益的联系这一面。但事实上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较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人类进步的保证已经变少了。而且，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成本却比利益增长得更快。特别是环境的压力日益突出，社会紧张和经济不稳定越来越明显。在压力下的当代政治家们通过放松管制和全球化等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率，可是这样追求经济增长看来不仅是辜负了日益增多的在变化中成为牺牲品的非熟练劳动者，而且也没能使富裕社会中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的抱负得以施展。更糟糕的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的观念促成了社会理念的瓦解，同时使个人主义甚嚣尘上。因此，经济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显然不应再与人类道德的基本问题割裂开来。

由于越来越快的变化以及现代生活的巨大的复杂性而导致的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已十分明显。相信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和人类有能力预测、控制和应付这些变化是人们对人类进步产生自信心的前提。但是，急剧的变化会使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和迷茫，因为在社会这些群体当中，人们的情感、观念和技能往往赶不上新形势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因而无法迅速调整以适应环境。同时，快速的变化也会削弱环境和我们的经济制度本身以足够快的速度顺利地避开巨大的负面影响的能力，特别是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非常快的变化会导致日益混乱和不可预测的后果。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经济上的打击不仅会对社会而且会对他们精心设计意欲提高的经济增长率本身产生负面效应。经济，就像栖居其中的人们和人们发展经济的环境一样，只对缓慢的、适中的变化适应得最好，取

得更多的可预期的效果。由于激烈变化而导致的不确定性都会使理性的计划和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效果和效率大大减少。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对最富庶的发达国家中奇怪的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的现象作出解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常常在程度和本质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历史和宗教背景会使他们对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变化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所以,尽管本书的许多观点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有些只适宜于发达国家。我们把重点放在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相对地不重要。事实上,富裕国家的人们日渐感到糟糕的这些因素还无法与其他国家的饥饿和疾病所带来的不幸相提并论。因此,在为发达国家开药方以争取高质量地增长的时候,当然必须把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需要考虑进去。

详细的政策上的建议在本书中无法找到。本书的目的在于质问我们以进步为名,以高经济增长和快速的自由市场放开为名所作的不够深思熟虑的追求背后那些基本的假定和设想。我们认为,如果人类进步是首要的目标,那么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并保证社会能承受得起渐进的变化。我们的结论是,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它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们对人类进步抱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这种支撑性的框架不应为铺天盖地的对个人利益的赞美或片面的对最

大限度的放开和贸易自由化的热衷所动摇，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心理学与进步的概念 （1）
第 二 章　幸福的进步与美好生活 （12）
第 三 章　人类进步信仰的早期历史 （28）
第 四 章　人类进步的哲学 （62）
第 五 章　科学与技术时代的进步 （83）
第 六 章　经济学时代和幸福的最大化 （104）
第 七 章　经济增长衡量的标准 （134）
第 八 章　环境对增长的限制 （157）
第 九 章　徒劳无益的无休止的竞争 （191）
第 十 章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挑战 （215）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和全球命运 （239）
第十二章　利己时代 （257）

第一章 心理学与进步的概念

心理学与观点

人类进步的观念可以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人类进步已经发生并将继续下去。另一些人认为,对进步的信念表明人们没有认识到人性是不变的。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反映了人类思想中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斗争。乐观主义者相信,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沮丧的悲观主义者认为,问题的核心,我们人性的弱点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克服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斗争,其根源不仅来自我们对自身困境的看法,也来自我们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处困境的看法。托尔斯泰通过其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人物,那个充满激情又躁动不安的列文表达了这种斗争。

当他看到这些,他开始怀疑他是否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按照自己的梦想安排自己的新生

活。他过去生活的痕迹像在攫住他说："不行，你不能摆脱我们；你不可能变得不同。你还将跟过去一样——带着你的怀疑，你对自己永不满意和想改变的徒劳的企图，带着你的失败，你的永不停止的对幸福的渴望。但幸福你得不到，它不属于你。"这仿佛是旧生活在说话。但是他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却在说，不要对过去屈服，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创造新生活。

当社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对人类进步可能性的相信与否同样部分地要由人类内在的、无法改变的弱点所导致的邪恶和不幸的程度所决定。启蒙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认为，邪恶和不幸不是人的内在弱点造成的，而是由于无知、偏见和贫困造成的，因此启蒙主义产生了乐观主义，即认为人类的问题可以通过理智、良好的教育和日益增长的物质的繁荣来解决。

对人类进步的信念一般认为，人类的问题是有限的，至少理论上说可以通过人类的理性来解决。但由于各国不同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观，能否使它们协调一致并从总体上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仍是个未知数。现实中，对某些重要目标的竭力追求不可避免地总是要损害到其他为人们所固守的价值观。比如，我们对个人自由和用小轿车使个人能在道路上自由移动的追求，与我们希望一个更加干净、安静环境的愿望相冲突。而且，我们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预测我们行为的长期的后果。在这个世纪的早期，人们根本不知道一些无可指责的目标会造成一些新的严重问题。如给亿万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品储藏的冰箱，会制造含氯氟烃并将把臭氧层戳开一个洞，从而损害植物并产生数百万的

皮肤癌患者。人们理性预见的局限也使我们对人类进步的信心有了局限。正如伊塞亚·伯林在他的《人性扭曲的本质》中所说的：

> 确实，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生活，一些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一些疾病可以治愈……但有关社会的研究表明：每一种解决办法会产生新的情况从而萌发自身新的需要和问题，产生新的需求。小孩们获得了他们父辈、祖辈梦寐以求的东西——更大的自由，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公正的社会，但旧的毛病被遗忘了，小孩们又会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解决旧问题带来的，而这些问题即使可以得以解决，又会产生新的情况，从而又出现新的要求，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而且无法预测。

我们对人类进步的相信或怀疑，一般是我们潜在的对我们的父辈和祖先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外部的表露。一些受社会尊重而死去的人或过去的事情，这种尊重并不是人们对进步产生信心的温床。神话传说和礼仪把过去的人物提高到英雄的地位——这反衬出后代的脆弱和无能。相反，在现代西方，年轻人反叛他们父辈的信条，因为他们很自信，许多问题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他们父辈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使我们更不会去尊重我们的祖先，因为祖先能教我们的确实太少了。

每一代人都会形成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即使某些价值是永恒的，每一代人在实际运用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重

要，因为进步不仅是一种事实，一种状态，也是一个主观的和评价性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我们可以用来衡量是否有进步的价值尺度，而且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从什么角度作出判断的。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的：老一辈人往往把新方法看做是不利于他们所恪守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东西，因此从他们的价值观判断，变化不是进步而是颓废。同样，青年一代对上辈人的生活并不想作出一个中性的价值判断，而"倾向于摆脱这种认同感并有一种本能想从父辈的影响中逃离出来，但他们带来的变化往往又是盲目的"。

这一辈人与上一辈在价值观上的分裂使得我们用我们明确的价值观来判断不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倾向于把新近的历史看做是朝着我们现在的价值和我们观念中的好生活的方向发展的，是进步。而过去500年的历史，用过去时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他们信奉国王的神圣权力，信奉精神高于物质，这些在现在看来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事实上，历史很多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来写的，也是以这种价值观来读的，所以过去给人一种朝着今天的价值目标前进的印象。我们是以过去的事件对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以及我们观念中的好生活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的意义。这使我们觉得历史的发展好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而生活在那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却没有那么清晰的感觉。

不同时代人的价值观的差距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会带来社会价值观更迅猛的变化，这会使那些在知识技术更新和价值观、道德情感方面难以适应更快的变化和节奏的人们面对新的压力。结果，不同辈的人在判断更快速的变化到底是不是代表着进步的意见分歧。而且，随

着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加速，社会的代或辈变得更短。技能和价值观很快就变得过时，那些刚刚进入中年的人也很快成了老一辈而赶不上进步的潮流了。没有变化也就不可能有进步，但变化的结果往往是有受益者也有牺牲者。更加快速的变化，一方面使受益者增强对人类进步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牺牲者对人类进步抱更为悲观的看法。

一些社会历史学家认为，不同时代人价值观的分裂是那么严重，因此，过去与当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历史被看做与现在无关，上一代人的技术也变得没有用。同时，集体的道德观（或偏见）和旧习俗被当代人抛弃，旧的社区被人口流动弄得四分五裂。在这种环境中，可以说不仅仅是较老一辈人感到迷惘，即使生活在当今的年轻人，也缺乏一个标准和方法来比较和评判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前几代人孰优孰劣。过去已不再是他们心灵的一部分，他们无法从中学到什么。所有的知识都是当代的。当然，一个买了拖拉机的农民会觉得，与他的父辈或祖辈用马拉车耕田、长统鞋沾满泥浆相比，他幸运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是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变化并判断是否进步，但是，对一个软件程序员来说，他一天得工作15个小时，住在城市中拥挤的单元里，每天只在英特网上与外界沟通沟通，身上带个“索尼”牌的随身听，听听流行音乐，吃比萨饼，所以要他比较他的生活方式与其祖、父辈的生活方式并判断其价值，就不那么简单了。

应该看到，不仅在不同代人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标准，甚至在同一代人之间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标准。特别是，当变革使同一社会及不同的国家利益的分配发生大的变化时，即使那些拥有同样价值观标准的人在判断是否进步方面也会产

生不同的看法。毋庸讳言,进步并不会让所有个人(或国家)同等受益,因为在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总是有受益者也有牺牲者。因此,一些社会的群体认为是进步,而另外一些群体却会认为是倒退。E·H·卡尔在他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引用了A·J·P·泰勒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而又深刻的论述:

> 所有这些都是在谈论文明的衰落,他写道:"这只意味着,大学教授过去有家庭仆人而现在得自己洗衣服。"当然对以前的家庭仆人来说,教授自己洗衣服也许是进步的象征。

一般地,那些走在变化前面的与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受到新的危险的影响是不同的。电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那些拥有最新技能的人显然是有利的,而那些只具备过时技术的人面对这种新媒体就有被边缘化甚至丧失工作的危险。同样地,由于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电脑技术对拥有高技能或大量资本的人最为有利,许多产业迅速地全球化——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的非技术工人的工作将更少,工资也将减少。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从变化中得到好处,那么就会对人类进步抱有信心;如果只有少数人受益,那么人们就会有越来越糟的感觉,而乐观主义只可能由幸运的少数人独享了。

人类进步的不同方面和层次

尽管人类的价值观多元化,而且不同的观点又有各种变形和扭曲,但人类进步的观念在过去的200年中一直占主导

地位。在我们开始讨论这种主导地位是否合乎情理或者它现在是否在削弱之前，我们必须分清在宽泛的“人类进步”概念下的各种各样的进步的含义。因为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有明显的进步和改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然。

必须清楚，在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方面的进步中，那些已有的知识和人类积累的经验或技能的传播是主要的，而另外一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内在性格、能力以及我们生物性遗传的结果。按进化论的观点，后天的知识技能等特点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速度会比以生物性遗传的随意性变化为基础的自然选择基因进化快得多。知识、科学和物质福利事业进步的历史则与后天的特点的传续有类似之处。潜在的情感、性格或内在的艺术想象力（如果有的话）的进步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长期进化过程是很接近的。比如，我们的大脑并不比1万年前的人类大多少，因此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内在的情感冲动或艺术想象力在性质上会有什么不同。当然，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工艺、技术、知识、风俗、习惯与永恒的内在冲动、能力等等都不断地积累和融合在一起。这两方面——积累的以及永恒的东西往往变得难解难分。

科学、技术和医学的进步是其中的一方面。没有人能否定这三个领域在过去几百年的巨大进步，不断增加的知识和见解像滚雪球一样不断产生新的原理。知识的积累和飞速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知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却往往是模糊的。科学解释能力的增强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人们控制自然界的能力。17世纪早期，培根强调实验以及对具体的事实进行观察，从而归纳得出结论的重要性。用他的话来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应该只信奉古代圣人的话。早

期他反对什么都以古代哲学家自以为是的格言为标准，并进行演绎推理的僵化死板的做法。他倡导和支持科学实验。培根认为，知识的真正目的不应是满足反思和冥想，而应该改善人类的福利，使科学、技术和医学沿着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

物质财富的进步是人们对人类进步有信心的另外一个重要支柱。像知识一样，物质繁荣也是不断累积增加的，而且在一定时期是飞速发展的。大约200年前经济增长的突飞猛进，使物质繁荣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自从亚当·斯密的那本研究财富创造起因的《国富论》问世以来，他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可以无限地、不断地增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经济增长使人们相信福利事业可以不断地进步，这种信念在现代人中占主导地位。现代的自由经济好像不仅可以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现福利最大化从而引人注目，而且实现这种目标似乎还不需要个人具备有意识的伦理或社会意图——因为市场这看不见的手被看做可以最有效地满足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的愿望和需求——而只需通过控制个人在实现其目的时的自我欲望就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言而喻，这种纯自由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利益的发动机显然有其严重的缺陷，这些是本书后半部所要探讨的。尽管许多政治家仍然认为经济增长与福利事业进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很显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处于紧张状态。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没有得到很好的度量，也没有被完全认识。

从以积累知识、技能和物质财富为主导的生活到人们以内在能力为主导的方面，文学和艺术的进步很值得探讨一下。艺术的进步是一个模糊的概念。3500年以前，古希腊克里特

岛弥诺斯的陶器图案并不比18世纪英国韦奇伍德的瓷器逊色。印象派画家的画也不比拉斐尔的画好。萧伯纳的戏剧也不比莎士比亚的戏剧好。威廉·戈尔丁的小说也不见得比奥斯汀的小说更成熟。这些例子当中,艺术的概念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看做艺术想象力的进步。正如贡布里奇在《艺术史》中指出的,每一代艺术家都在某一程度上反叛上一代的标准和观念。这促进了艺术潮流的运动和嬗变。但贡布里奇说,不应"天真地认为艺术的不断变化是不断进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方面获得或进步必然在另一方面造成损失,而这种主观性的进步虽然重要,却并不意味着客观的艺术价值的增加"。甚至同一流派的艺术技巧也不总是越来越进步,多少代以来都没有人能够在玻璃画方面占中世纪那辉煌的蓝色的上风。

道德进步的说法就更有争议了。有人认为,人类表面的道德进步只不过是披上一层新的外衣,兽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可维持的道德规范系统可以不断进化以保证道德的进步,尽管我们潜在的情欲冲动的本质不会改变。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性本身是追求完美,因此社会制度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善;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在发达国家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也比上个世纪大大地改善。因此,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发展,可以使各国寻找更加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和平衡它们的利益冲突。但也很明显,具体的社会(或国家),正如国际政治一样,反映了人性不变的事实,转瞬即逝的社会和文化时尚,反映了它们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如孔多塞侯爵则持乐观态度。他

认为，人的内在性格可以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和教育而得到锻造和改善。由于知识的不断加深，人本身也可以趋于完美。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罗伯特·欧文认为，邪恶和不幸都是坏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社会改革可以消灭贫困和邪恶。但在这个复杂而血腥的世纪，人类追求完美的信条却很难自持。20世纪的战争不仅证明极端邪恶的持续存在，而且也表明，令人敬畏的科学和技术理性的进步本身对道德能否促进也值得怀疑，它的强大力量导致了更多的邪恶而不是仁慈。科学进步和经济增长能否导致人类的进步完全要看人类能否很好地驾御它们，其中人们的道德素质至为关键。

纵观历史，许多人认为，道德和精神的进步与知识的增加和物质的繁荣恰好成反比。无论是从潘朵拉魔盒的传说还是圣经里的《创世记》都可以看出，人类致命的好奇心（确切地说，是女人的好奇心）被看做是邪恶的根源。古代许多哲学家和基督教以各种理由倡导禁欲主义，认为这是获得更大幸福和道德进步的最佳途径。现在大多数人在道德与知识或繁荣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他们认为，人性事实上只有很小的变化。虽然指导社会前进的道德控制既可以向好的方向也可以向坏的方向转化，但这些变化未必与经济增长和科学进步成反比或成正比。以这种观点看，人类道德的发展并没有一定的方向。经济增长的伦理和道德内涵将在本书的后面详细加以讨论，结论可能正好相反：自由市场对财富增长的追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社会道德水平的持续下降。

当然，在社会道德领域，不同的价值观会让人们作出不同的评价。在一些人看来，在快速的经济变革的压力下，邻里关

系和社会道德规则的崩溃是一种不幸。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好事，因为它让人们从令人窒息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中解脱出来，并使社会更有容忍性。但是，没有人会认为现代战争的恐怖、纳粹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或波黑战争不是对社会和道德进步的威胁。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使那些乐观主义者噩梦不断——想想看，正当欧洲文明处于巅峰的时候在欧洲爆发了这么一场可怕的战争。

盛极一时的民族主义、现代技术（机关枪和铁路）以及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想象力的丧失，造成了数百万计无辜平民的死亡。这一幕已成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不朽诗句，以下几行摘自幸存者西格弗里德·萨松的诗作：

一排排灰色的、嗫嚅的人群，脸上写满了恐惧，
他们离开坑道，走到土坡上面，
时间嘀嗒嘀嗒地在他们的手表上空虚地走着，
而希望，就这样，带着无助的眼神和握紧的拳头，
倒在泥土中。啊，上帝，制止这种行为。

甚至在今天，当人们驱车路过法国北部皮卡迪那鬼气兮兮的荒芜地带，映入眼帘的仍是遍野的白色十字架。这提醒我们和平和文明的面纱是多么地弱不禁风，可又是多么地宝贵啊！

第二章 幸福的进步与美好生活

关于人类进步的争论集中于幸福的进步这一有争议的焦点之上。在一些人看来，福利事业的巨大进步，更长的寿命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令人怀疑这样的进步是否存在。但另一些人指出，幸福是一个有弹性的、复杂的概念，而不是可计量的物质渴求的简单相加，也不同于更容易计算的福利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要在不同时代人之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为了说明这些分歧意见，本章首先简单探讨了“幸福”包含的大量各种不同的涵义，接着引出相关的“幸福生活”的概念。在对幸福作出一个更明晰的界定之后，来评估该定义在用于比较不同时期的幸福时的逻辑和可行性，并判断幸福是否取得了进步。对幸福的分析以及幸福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重要性是伦理学的核心，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所以，很多内容是本书无法涉及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仅需就进步这一主题

及与其相关的不同观点稍加论述，并说明人们感觉越来越糟的原因。

边沁和早期功利主义者主张，幸福就是快乐，没有痛苦。按这种观点，人们可以在单纯量的基础上——如快感或痛感持续的时间和强度——精确地计算和比较社会中的种种幸福，但这种享乐主义的幸福观及其四则运算式法则在比较人与人之间的幸福多寡时确实难以尽如人意，理由有二：第一，即使幸福可以简单地等同于肉体和心理上的感受，将人与人的感受进行具体的比较也是困难的。进而，据这种狭隘的定义，从量上评估整体人群的感受在一定时期所取得的进步就更不可能了——除非每个人的大脑都像电极和发报机一样与一个中央控制系统相联。第二，认为幸福只是快感或没有痛苦这种定义过于狭窄，令人难以信服。一方面幸福包括各种各样的感受，而不仅仅是快感。另一方面，辨别两种不同的快乐时需要直觉。通常我们并不认为单凭生理上可感知的痛苦的消失和快乐的出现就可使幸福得以保障，如性愉悦和吸毒引起的陶醉感，不管这种感受多么强烈，也不管这种感受产生的环境如何。再如功利主义者所说，产生于特定环境的快乐更易于持续，并且能够免除令人不愉快的负面影响。所以，从长期来说，来自安全和爱情关系的快乐比起来自妓女或色情的快乐来，更强烈，更满足。同样地，延长毒品的使用时间会令人不满足于这种依赖性的毒瘾，并可能导致人们犯罪。但是比这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快乐也表现出内在特质的差异——比如，在长期稳定关系下的性的愉悦与紊乱随意的性关系的满足之间是有区别的。许多人认为，快感可以被视为幸福的条件和前提，但是这种感受必须是真实可靠

的。他们认为，吸毒所带来的快乐是不真实的。因为吸毒损害了一个人的名声。

后功利主义者如穆勒认识到边沁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了，为了使"享乐主义"的幸福观更令人信服，穆勒试图在引入快乐的"量"的同时，引入"质"的概念。穆勒指出，有些快乐具有内在特质，因此经历过这种大量的低质快乐的人会更偏好于少数的高质量的快乐，许多人在眼界拓宽并发现生活的多姿多彩之后就不会完全安于舒适豪华的享受。此时他们便不会为满足于单调乏味的生活而感到幸福。一方面，穆勒从享乐主义的观点中超脱出来并进一步认识到：幸福含有评价性的内容。只有当我们把自尊、个人定位感、成功者的理想与我们赞许的快乐相联系的时候，只有当快乐来自于我们认可的源泉的时候，快乐的企盼和实现才能令我们幸福。即使证明了确实有一种药物可以使我们永远处在一种永恒的狂欢一般的极度亢奋状态，从而使我们可以永远把握住这种快乐的感觉，无忧无虑，但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审视，他们认为这也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约束、自尊、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真实可靠的快乐对幸福来说则更为重要。后功利主义者对粗浅的享乐主义幸福观所作的这一发展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当把幸福放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时代中进行比较时，它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为要对人们自发的生理感觉进行技术上的比较是不可行的，以单一的客观的尺度来衡量那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内在特质上都不尽相同的快乐，就更不可能了。

幸福这一概念包括诸多方面，而不只是快乐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是强还是弱。我们常说生活幸福、婚姻美满或工作愉快，却并不意味着这种快乐时时都可以识别，更不用说计量

人民银行图书馆藏

了。在一定程度上，幸福至少包括对事业的成就或行为感到愉悦。伊丽莎白·特尔弗在她的《论幸福》一书中，曾经把幸福作为一种心态来探究，这种心态包括对事物感到愉悦这一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比享受或快感更宽泛的概念，不是享受事物本身，而是被该事物可能带来的结果所取悦而产生的反应。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幸福时，主要是指我们对事物的状态和我们的成熟感到满意和快乐。这种把幸福作为一种心态而下的定义更为成熟。正如特尔弗所说，这种定义把个人作为惟一的评判自己是否幸福的仲裁人，这种幸福不再是可由旁人任意裁定并判断是否客观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精确的对比，更不用说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比较了。一个人认为幸福的，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是不满意或远未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并不包括获得财富、健康和知识这些可计量的事物，相反，它是一种主观观念——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或依赖于更容易计量的那些因素。

有些人试图把幸福定义为渴望的满足或愿望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主要的欲望和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或实现是令人不快的。在现代自由经济中，这个定义在许多政治争论中体现得很明白，假设市民们在市场(或投票箱中)表明他们的愿望和欲求，当经济增长(或政府行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时他们会更幸福。但是，任何以满足欲求来定义的幸福都是有问题的，比如当我们牺牲自己来推进我们珍爱的事业时，这种行为与通常意义上的幸福，即满足渴求(或是对这种满足的企盼)却是不相吻合的。我们希望达到某种最终的目的，仅仅是因为自己乐于这样做，并不去管这种结果必须作出自我牺牲并有损于我们的幸福。

人们进一步反对幸福只是满足欲求这一说法：人们可以由自身的原因从不幸福变为幸福，而不是靠更多的欲求、愿望的满足来实现。他们可以以一种更顺服、乐观的态度来适应同一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顺服态度和乐观脾性实际上是人们对难以满足的渴求的松动，这种松动包括数量和强度两方面的减少。通过满足欲求获得幸福与通过减轻和转移欲求或降低强度而获得幸福，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伊壁鸠鲁是对的，那么幸福（按他对快乐的定义）很大程度来自对欲求、野心和需要的抑制，按这种说法，清心寡欲的人是更为幸福的了。现代世界和现代经济不断地创造新的欲望和需求，其速度远远超过欲求的满足。如果幸福是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平衡（需求是被动的而满足需求是主动的），或如果（如伊壁鸠鲁所说）幸福即是安宁，这种安宁只有在未满足的需求所导致的痛苦不存在时才是可能的。按此说法，上古社会比现代社会更幸福。显然这是卢克莱修这位公元前1世纪罗马伊壁鸠鲁派诗人的看法。他认为虽然当代人们的行为更有教养，目的更加高尚，但他们所获得的享受并不比原始森林部族的人多：

> 就我们所知，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过去有更令人快乐的事物，曾给予我们极大的满足，并被认为是同类中的最优者，此后新优事物的发现只能钝化和破坏我们对旧事物的享受。这令我们对尖端技术丧失兴味。

用卢克莱修的话来说，正是这种欲求的急剧膨胀，使人类

成了“不断的徒劳无益的殉难行为的受害者，在失败和无望的忧虑中磨尽生命之后才认识到真正快乐的获得和增加是有限度的”。

和这种反发展立场相反的观点认为，幸福不仅是欲望的满足（缺乏任何未满足的欲望），而且还应包括欲望本身的特性以及生活的丰富多彩。生活的丰富多彩在穆勒讨论快乐的质量时处在中心位置。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生活的丰富多彩可以用独立于主观的满足感或快乐的感受之外的客观标准来衡量。正如哲学家安东尼·肯尼在他的文章《亚里士多德论幸福》中指出：

> 满足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概念可以是相互独立的，而这就产生了有关幸福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一个人所受教育和敏感度越高，他就能享受“较高级的”快乐并且过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但随着教育和敏感度的增加也带来更多的欲望，而要满足这些欲望却不太可能。教诲和解放既有利于幸福，又不利于幸福。因为从生活的多样性来说，它可以增加一个人获得幸福的机会，而从欲望的满足来说，它却减少了幸福的机会。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给幸福下的定义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必须注意的是，希腊语的“eadaimonia”跟英语的“幸福”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它包含的意思更广，有“富裕”和“总体上满足”的意思。希腊语教授阿姆斯特朗曾经说过，希腊人所说的“幸福”的人是不仅感到幸福，而且可以说他一生各方面

都很顺、很圆满。因此，幸福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就与我们的"美好生活"最为接近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较为宽泛的定义是这样的——它包含了成功的活动——一个人潜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而带来的满足感。这种个人潜能所取得的成就，一个人主要活动的最好成就显然是我们所谓的美好生活的一个特征，但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完整的。特别是要以此来当做幸福的话还差得远。幸福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成功地实现了一个人的目标或具体特色的活动。因为有的人即使实现了他所有的事业目标，并在主要的领域发挥了潜能，他仍然不幸福。这种情况很多。但即使我们摒弃了亚里士多德这不完整的定义，美好生活的概念对于幸福的进步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美好生活的一般性概念里包含一些重要的客观的因素。它不像主观的感受或态度，这种客观的因素至少可以从外部来判断。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谈到幸福的进步时，我们就是在间接或直接地讨论实现美好生活进步的因素。这种美好生活包括一般的福利和繁荣，疼痛减少到最低限度（如疾病）以及人们能够发挥潜力。这种进步性的美好生活的获得是经得起真正的客观评价的——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都可以进行评价——这比其他一些主观的有关幸福的概念要好得多。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有关幸福的一些言论。我们知道，对伊壁鸠鲁来说，幸福的要旨是宁静以及缺乏动态的欲望创造的过程以及相应的为欲望满足的努力。对他来说，现代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那么多的欲望膨胀和压力真该诅咒。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来说，幸福包含着"不断地进步；它包含在不断的繁荣之中，而不是包含

在已经出现过的繁荣之中；幸福不是静态的——当然，天堂的欢乐除外”。（伯特兰·罗素的话）这是我们现代人有关幸福的一部分概念。现代人是一群奋斗的动物，他们不会轻易地满足于无休止的重复的快乐。那些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增长必然促进幸福的辩护者们极力主张多样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消费品领域，正如俗话所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品。尽管这是事实，但是现代经济往往是一方面在车间限制工人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又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商品。许多工作越来越专业化，面越来越窄而且单调、重复。结果，不仅造成工作越来越乏味，而且人们要改换工作也更加困难——最终大大减少了多样性。

在简要地讨论幸福的本质之后，我们可以说关于幸福的定义没有一个是全面的。我们最好把它看做是一个无定形的宽泛的概念——包括像快感、对事物愉悦的态度、欲望的满足以及缺少重要的没有满足的欲望等等这些主观性的概念。由于其概念是难以确定的，由于不可能在不同的人之间作精确的比较，更不用说对不同时代人作这些主观的、个人的感受、态度或欲望的本质和强度的比较，因此要对幸福的进步作一个严格的、客观的评判只能是虚妄。幸福的概念确实也包括好多客观的因素并可以作些比较，比如生活是否丰富多彩，但这些客观的概念往往是与“美好生活”相联系的。实现美好生活的进步是一个清楚的可以量化的概念——这与福利事业的进步相似。美好生活可以根据某一特定的社会或集团的品位或价值观来界定，这样，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以这个标准为参照，从而作出客观的判断，即到底有没有进步。这种客观因素（对美

好生活下定义)与这些主观因素(个人的感受、态度和欲望)的区别,有助于解释关于在是否存在幸福的进步这个问题上的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些认为进步显然已经发生的人们往往是根据他们的美好生活的实现及其进步而作出这种判断的。而那些对进步有怀疑的人们则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那些主观性的因素上。但至少在判断一个特定的美好生活是否进步方面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宣称,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主观的幸福感要比其他时代的人们的幸福感更伟大或更渺小。甚至我们也无法在理论上对不同人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的主观感受作出精确的比较。

当然,主观的幸福的概念与更客观的美好生活的特征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大多数集团或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都包括了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带来更大的快乐或欲望满足、或使人们对生活感到更加快乐的因素。尽管如此,在作不同时期的比较时还得小心,一个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有可能与另一个社会流行的看法大不相同,因为享受的源泉改变了,期望改变了,新的欲望发展起来了。

我们无法肯定,我们所看到的对我们观念中的美好生活的发展是积极的变化是否对其他人来说也同样是积极的。这是我们确立幸福的进步这一概念的另一道障碍:不仅是一个特定社会有关美好生活的客观要素与那个社会个人主观的幸福感受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美好生活本身也随时间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如柯林伍德所言:

> 我们能说幸福或舒适或满足是进步吗?显然不能。之所以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人们享受

生活的习惯不同，他们可以获得的舒适的条件不同，
他们认为是满足的成就也不同。

而且，往往也很难确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实际上是从哪里获得快乐（或愉悦），也不知道他们的美好生活的定义包含了什么内容。如果把我们自己在现代社会中认识到的快乐或幸福的源泉推及到过去，并判断现在的这些快乐在过去多大程度上存在，那是大错特错的。比如，如果把我们现在没有小车、电视或洗衣机而出现的失落感类推到过去时代的人，以为他们没有这些也会有同样的失落感那就荒谬可笑了。或者反过来，假如一个人具有更多浪漫的气质，或许他会羡慕过去那种平静和缓慢的生活节奏。但把我们的感受和态度的投射作为幸福的进步或退步的证据就不妥了。而且这对于判断过去时代的人们把什么看做他们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或他们认为什么最有价值时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因为价值观、期望和快乐的源泉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证据往往是难以捉摸的。特别是我们对那些由于变化、物质繁荣和经济增长而消失的东西，以往时代的人们又从中获得快乐和享受的东西，往往会低估或高估其价值——这些东西或许已不再是我们意识中的一部分了。

比如说，没有遭受破坏的乡村美景，野花飘香，空气清新，百鸟啁啾。一般认为，从这些事物、景色获得幸福基本上是都市文人的创造，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和华兹华斯等人从美感距离和浪漫主义的角度来描绘自然界和乡村生活，这些都市文人只看到古老乡村经历巨变和遭受破坏的代价，而没有看到饥饿和劳累的农民。当然，这是一种自忒奥克里托斯以来

诗人们理想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阿卡迪亚田园牧歌式的和平景象的描绘——牧民很少劳作，而是吹着笛子，欣赏着云雀和布谷鸟的婉转歌喉，他们的脚下、身旁到处都是苹果和梨。但如果认为牧民或乡村农民不会在他们耕作时欣赏这些美景也未免有点自视过高了，虽然他们不会有都市诗人的那种过分的浪漫主义情调。证据或许能找到一些，但也不容易找到。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作于艰难的农业社会时期，请看以下一段天神宙斯与赫拉会合的美景：

> 说着，克罗诺斯的儿子用手臂夹着他的妻子俯视——下面是神圣的土地，绿草葱茏，带着露珠的三叶草、藏红花、风信子，层层叠叠，柔软如被。

荷马的许多比喻也让人看到自然界之美以及人工小心翼翼的护理。《伊利亚特》中的其他地方也有描绘美丽的雪景的："在雪花纷纷飘落的时候，风好像睡着了，大雪覆盖了山脉和平原，一片白皑皑、静悄悄的世界。"显然，如果那个时代没有领略自然界的美感，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在古希腊，距今约3 500年的克里特岛弥诺斯时期的陶瓷图案和壁画也显示出对美的欣赏，尽管有些图案的人物是宗教性的，但许多动物、植物很有特色，花园鲜花盛开，肥大的鹧鸪在草丛中跳跃——显然这些都是他们朴素的审美情感。再看看公元前6世纪的成长于雷斯布斯小乡村的女诗人萨福给我们描绘的一幅绿树葱茏、草地上鲜花盛开、流水潺潺的乡村美景，这种美丽的景色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愉悦：

在苹果树林里，有一座神圣的庙宇，祭坛的香火飘着乳香。溪水汩汩地流过苹果树林。玫瑰花到处盛开，树叶闪着微光。这里牧草丰美，马儿肥壮，洋溢着春天气息，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果香。

再看她描绘月亮的上升——月亮带着"少女般的红晕，比星星更加灿烂夺目，把月光洒在大海和鲜花盛开的田野上"。这些描绘也表现出类似的对大自然的审美情趣。

这些都表明，农业时代的古人也从那未遭到破坏的乡村的自然美景中得到美的享受。在我们这个机械耕作的工业化时代，到处充溢着霓虹灯、噪音和机动车的污染。而那些蛰居乡村的人们，却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很大的满足。确实，农业时代人们的享受更可能是来自成功地培育了植物和动物，或者因成功地驯服了大自然而狂喜，而不是来自朴素的审美愉悦。我们也可以推测，那些远古的农业时代的人们比我们更有口福，可以比我们现代人吃到更多甜美的食物。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大段大段地描述人们准备盛宴和享受盛宴美食的情景。现在人们吃到的鱼有时隔了好几天，能吃到抓到几小时后的鲜鱼，或新采摘的柠檬汁涂抹的烤羊肉，或尝到早晨刚采的甜美的芦笋那是幸运之至了。这些愉悦对紧靠土地的农民们却易如反掌，而现代人却失去了这些快乐。经过加工、包装、转运和冷藏的食品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现代人吃的东西太乏味了，确有必要用美味佳肴丰富一下。

那些缺少浪漫气质的人们或许会说，既然乡下的农民纷纷进城(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那么他们的选择不是意味着城市生活比他们原来简单的快乐更富吸引力，工厂或办公

室的活比沉重的农活更好些吗？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那些改变生活方式，移居到城市的农民是别无选择，因为经济的变革使得原来的农村生活不再可能，虽然经济变革也带来了有吸引力的甚至是诱惑性的选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农业文明时期的人们那么艰苦地奋斗以保住其生活方式，绝不仅仅是因为怀旧。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印第安人残存的语言中看出，人与土地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印第安人那么热爱他们的土地，没有土地他们就感到凄凉和无所适从。1833年，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克劳族的首领阿拉普伊斯描述了一个狩猎者对其土地的热爱以及土地带给人们的快乐："这里空气清新、绿草丰美，河水从雪堤奔流而过，动物遍布四野。"他的话中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克劳真是个好地方，什么美好的事物都可在这里找到。没有什么地方比克劳更好的了。"但40年以后，肥壮的野牛群——以前有3000万只——大草原的印第安人所赖以生存并与之心有灵犀的野牛群却消失了。正如约瑟菲在他的《五百个民族》一书中所说的，随着野牛的灭绝，印第安人在居留地上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意味着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消失以及人与土地精神纽带的断裂。其悲伤之情可以在许多当时记录下来的言论中感受到，请听基奥瓦的首领沙旦达（绰号白熊）充满激情的言语：

> 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那些野牛，不能跟它们分离……我要把小孩养大，我也是在这里被养大的。我不想居住下来。我喜欢在大草原上游牧。这样我感到自由和幸福，而当我们定居下来，我们就身体虚弱，就会死去。

对那时候的印第安人来说，其实许多乡村农民也一样，自然界是他们生存的依托，不管它是否成为他们观念中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从自然中得到的享受有时是极大的满足：从自由的大草原，从刚割过的牧草的香味或麦秸的潮热的气味，或者从刚捕到的鲜鱼的美味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和快乐。我们视为优雅、有乐趣的，比如小木屋，在穷地方却是必不可少的权且度日的住处。但熟悉的东西也未必生厌。跑得越来越快的小车让现代人过了一把瘾，尽管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但不论我们是要证明还是要驳斥幸福的进步，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即我们无法比较过去一代人骑马在大草原自由驰骋与现代人驾车在道路上奔驰之间哪个获得的满足更大。我们也无法证明，过去的一代人（他们如果活着的话）是否会赞同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他们或许会认为，缺少一些他们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可忍受的。

对许多人来说，对我们建立幸福的进步或者说建立一个客观的、适用于所有时代的美好生活的社会抱怀疑的态度是中产阶级学术圈的典型特征，而跟现实世界毫无关系。正如贝克曼在他的《小的是愚蠢的》一书中所说，那么多的疾病被消除了，人的寿命得到延长，尤其是妇女和婴儿——这怎么能说对人类的幸福没有很大的影响呢？现代的焦虑或不幸能与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小孩死于肺结核或猩红热所承受的痛苦相提并论吗？

“正如对经济增长持批评态度的人们所坚持的，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今天的条件更会导致人们的精神焦虑。这种看法显然是：要么对在不远的过去劳动人民的生活到底是个什

么样子视而不见，要么就是缺乏想象力，想象不出这些条件对普通的工人群众意味着什么。”

很少人不会对这种想法产生同情。也许人们获得的幸福与福利以及他们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没有什么联系，也许我们得靠想象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不同时代人幸福水平的变化。到底什么可以给以前的人们带来幸福或不幸，他们的美好生活的观念包括些什么，这些只有靠我们想象和推测了。婴儿疾病和分娩死亡这些问题尤其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用推测，而是用严格的分析，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目光放在福利事业进步的评价上面，也就是说评估在实现美好生活方面我们取得了多大的进步。鉴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价值观、快乐和绝望的缘由，我们不难列出一个20世纪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关于美好生活所包含的基本要素的清单，比如充足的食物、住宅、健康、安全的分娩、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就业、男女都能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法律健全、秩序稳定、环境洁净等等。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统计指标来测量进步或倒退的程度。如按贝克曼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因素来衡量的话，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确实在福利事业的进步方面很有成绩。但是，问题在于，所有的这些客观性的福利因素或者说美好生活的这些客观性因素，是否真的能用加权后的、融合在一起的、单一的指标或统计数字，来对进步的程度作单一的估量呢？在以后的章节中，在我们考察福利事业的进步与可度量的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会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要分析为什么这些联系现在弱化了。比较而言，幸福的进步，与福利大不相同，它不能成为我们分析的主要问题。幸福也许是我们一切活动的目标。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清楚，幸福概

念本身的模糊不清以及比较不同时代人的幸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使得对幸福的进步的估量不属于分析的范畴，而属于想象和推测的范畴。

第三章 人类进步信仰的早期历史

要更清楚地理解对人类进步信仰的本质和所需的条件，有必要考察一下现代有关进步的观念和我们的信仰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这里我们不想对有关进步观念的历史作全面的叙述，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不是本书的任务，而且已经有两本很棒的书对此作了论述，即J·B·伯里的《人类进步的观念》和R·尼斯别特的《进步观的历史》。以下的四章只不过想概括地阐述一下有关人类进步观念的历史和哲学思想的一些特征，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这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人类心中乐观主义(认为人类进步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与悲观主义(认为人类的处境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改善)的长期不懈、至今仍无结果的斗争。本章分析了对人类进步的信仰的五个条件，并追溯这种信仰为何在古代只是缓慢地、踉跄地发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却突然演变为乐

观主义。

信仰的五个条件

任何想用几页的篇幅来概括进步观念的历史都有其局限性和危险性。对进步的信仰是与人们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同时代的人其心态也不一样，而且是非线性的。想用三言两语对过去时代的主观性的信仰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会产生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的危险，因此带点疑问是必要的。很有趣的是伯里和尼斯别特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伯里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原因见稍后的论述）——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前，进步的观念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而尼斯别特极力论证进步观点的存在，甚至认为在古代思想和基督教教义中就已存在。尽管所有的说明和解释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对人类进步要有信心，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我们在这里就把它们列出来。

第一，进步的信念与人们在其一生中实际感受到的积极的变化是有广泛的联系的。比如，公元前15世纪的雅典，古代文明达到了巅峰，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受到了积极的变化，因此对进步的信心就呈现出来了。如果在某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体察不出来，或者说变化是朝着更糟的方向发展，那么只有那些极度乐观主义者才会对未来的进步产生信仰和信心。但变化不论对某些人多么有利——也可能太快——那些不知所措的受害者的人数可能会超过那些有信心的受益者。使某一时代绝大多数人受益的积极的变化，是人们普遍对进步产生信仰的前提。

第二，对进步的信仰要求了解过去，但又对过去持批判的态度。那些把死人奉为神明的社会，或者其文化被夸大的英雄传奇所主宰的社会，会使自己在过去的辉煌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因而也不会有进步的观念。拥有过去历史是事实而不是神话，对于有信心的、稳固的、进步的信仰的演化是必要的。但是，与过去时代相比，现代人们在只了解过去的某些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自信，也会使人们过分地相信进步的存在。当我们面对新的考古发现或文字记载的事实，我们会惊慌失措。距今3500年的弥诺斯宫殿，以它那复杂精致的样式使我们震惊。2000年前的西塞罗书信，以其思想的“现代性”和实用性使我们瞠目结舌。我们对罗马时代的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为他们大胆的设计和高超的工艺所吸引。如果我们对“黑暗的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了解得更多，我们会赋予它另一个名称也说不定。至少可以说我们对进步的信仰，部分是来源于500年以前人们对以往所有时代零星的、很有限的历史事实的人为处理而得出的。

第三，要能普遍地对人类理性和驾御、控制变化的能力有信心。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索福克勒斯和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卢克莱修两位作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进步的观念——他们强调了人的聪明和理性的重要性。对理性的信仰在启蒙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时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的进步可以使人自身更加完善。自启蒙运动以来，虽然人们对人类及其道德可以通过摒弃偏见和无知来达到完善抱有怀疑，但是人们对理性的力量以及人类驾御各种进步的技巧却十分相信，而且福利在19、20世纪也随着科学、技术、医学和商业的大踏步前进而极大地增加。直到最近才再次出现从理论上和

实践上对人类在日益复杂的困境中控制、驾御和预测变化的能力产生怀疑。显然，无论在科学分析还是经济计划方面，人类理性都存在着一些局限。

第四，在一个社会里，要产生广泛的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必须具备一个世俗的环境或者有一个对仁慈的上帝的信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前科学时代，进步的观念很难占主导地位，因为当时人们对可怕的严厉的神充满了敬畏和不安，从而无法认识自己的潜能。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把地球上的生命看做是神的意志，而神的意志是神秘的、不宽容的。在神的力量面前，人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地球上想取得进步只会招来危险和上天的嫉妒。基督教与进步的信仰的关系更为复杂，在本章的后面要谈到。

第五，进步的观念只有在不相信失去的乐园以及周期性的、循环的条件下才能扎根。相信过去存在乐园是许多西方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要概念，且不说《圣经》中的伊甸园，希腊和罗马寓言中也有不少。正如 E·R·杜德斯在他的《古代进步的概念》一书中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进步的信仰部分来自个人在婴儿期的感受——婴儿期“生活是容易的”。它也反映了父母想让他们的孩子更加天真无邪。

我们的荣耀都来自上帝，
他是我们的归宿。
我们婴儿时期周围都是天堂！
但随着我们长大，
监狱一样的房子就把我们关起来了。

在这首“神的旨意”的诗中，华兹华斯也提到另外一种非常盛行的历史观——历史的周期性循环和再生。这些观点不仅反映了原始的对新生的渴望，同时也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对自然界四季的周而复始的体察所致。正像人们相信神是爱嫉妒的一样，对周期性循环或失乐园的相信，是有碍于人们对世俗进步的信心的。

对进步产生信心的这五个条件可以通过简要地回顾其在四个主要历史时期的缓慢演变而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这四个时期是古代、早期基督教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只有在启蒙运动时期，所有五个条件都具备。在有信心的19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五个条件同样继续具备。

古代的观点

古希腊罗马帝国是人类智慧、艺术、实践和政治等方面都非常灿烂辉煌的时期。希腊人是西方诗歌、戏剧、历史和哲学之父。他们在建筑方面的成就，如巴台农神庙、陶器和雕塑等很少有别人超过的。罗马帝国统治了欧洲大部、西亚和北非，通过法律和政府机构把它们联成一体，其法律和政府机构成为后来好几个世纪的典范。他们大规模修建道路、竞技场、水渠，从荷马到罗马帝国的灭亡前后1200年，在艺术、文学、军事和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后来的1500年中不断地震撼着西方人的意识和灵魂，他们惊叹于古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但这种对过去的追念和崇拜阻碍了人们对现代进步的信心。难怪许多研究者发现，在古代，人类进步的观念，虽然不时地

被清楚地阐明，却远未占统治地位，仍然没有被普遍接受。

在古代，进步的观念、地位及其被接受的程度一直是许多学术讨论的话题。路德维格·爱德尔斯坦的《古代著作中进步的观念》以及E·R·杜德斯的《古代进步的概念》都不遗余力地从浩繁的古代典籍中搜集有关进步观念的说法和典故。但在书末要下一个明确的结论，如"古代对进步的看法"却是没必要也是不明智的。正如爱德尔斯坦所言：

> 我相信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包容一切并适当描述1000多年的文明中人们对进步的看法。进步的和反进步的力量此消彼长，多得数不清、正如两方面的证据都有，包容在里面的看法也是独立于时间和情境之外的。

但了解人们的活动哪方面会使进步的观念遭到怀疑，哪方面不会却是有益的。同时有必要知道限制人们对进步产生信仰的范围及其强度。其中一些方面与我们现代的关于人类困境的观念也有关系。在现存的古代典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如何凭借其聪明、技艺和创造性从过去的野蛮状态向更文明的方向缓慢地发展。确实，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时期在许多领域，如艺术和实用技艺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变化——这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由于古代史相对缺少文字记载（虽然有一些过于夸张的神话故事），因此也不再阻碍人们对过去的进步的信仰。这不仅是因为对一个时代本身的变化产生了信心，也是因为人们对比较人类学越来越感兴趣，希腊人远离家乡出外旅行与更原始的社会有过接触。所以历史学家

修昔底德推测过去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外国人相似。他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希腊从半游牧民族缓慢进化为城邦的生活方式有着敏锐的分析。在这本书里,修昔底德强调了农业、海上贸易、资本和新的作战方式在促进进步方面的重要性。在这本书的后面,他引用了科林斯使者来劝降斯巴达时所说的一段话,使者在谈到来自雅典的威胁时,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并说明新的方式比旧的方式优越:

> 但现在,正如我们已给你指出的,跟他们相比,你们的生活已经过时了。无论在政治,还是艺术或工艺方面,新的方式总是驱逐旧的方式。毫无疑问,在和平时期,一个城市原有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当它遇到新问题时,它必须能够用新的方式来解决。所以雅典,由于它拥有更多的经验,比你们的国家更现代。

这种对新技艺的威力的信心是人们对进步产生信心和信仰的坚实的基础。我们也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悲剧中,清楚地看到人们对从过去野蛮的状态不断向前进步的信心。比如,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吹嘘他对人类的贡献,并用下面一段话描述更早时期人们所处的可怜的境地:

> 虽然他们眼睛可以看,但没看出什么名堂;他们耳朵可以听,但啥也听不懂;就像梦中奇形怪状的幻

象一样，他们整个糊里糊涂，毫无目的地活着。他们不懂得用砖盖房子，出去晒晒太阳。也不懂得伐木盖房子，而只是像一群蚂蚁一样呆在地下，呆在没有阳光的洞穴里。

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火、数字和字母（这样"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记在头脑里"），他教人类驯养动物、出海航行并教人治病。在其他人的著作中，人类从洞穴生存到现代城市生活并不是靠神的帮助，而是靠人类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公元前6世纪晚期，爱奥尼亚哲学家色诺芬尼说人类是通过漫长的时期靠自己的研究取得进步的。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安提戈涅》，其中有一个唱段颂扬人类的智慧。

很多动物都很聪明，但没有什么比人更聪明的了。……人学会了语言，思维敏捷，知道如何管理城市，如何躲避没有善意的火山爆发和瓢泼大雨，他们多才多艺，可以凭借智慧面对未来的一切。

400年以后，即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一个伊壁鸠鲁派诗人），坚决否认人的一切是神安排的。在他的第五本著作《从自然中走来》中，他详细描述了人如何从早期蒙昧状态艰苦地走向文明。书的末尾极力颂扬人的理性和经验在推动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强大力量。

所以我们发现，不仅在海上航行，农业发展，修

筑城墙，制定法律，制造武器和制作衣料，而且在给人以精神愉悦方面，如音乐、美术、雕塑等都是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一步一步地完善起来的。因此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随着时间而逐步地前进，人类的理性使它们达到空前的辉煌。一个又一个的概念在他们的脑中形成，最后凭着他们的技艺征服了最高峰。

对理性力量和渐进性发展的信仰是现代进步观的核心。而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古代的人们也有类似的观点。尽管如此，对卢克莱修的乐观主义还得说几句，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表明，最高峰已经达到——这样未来再进步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了。

从修昔底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卢克莱修著作摘出的段落中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自己的理性和创造力是充满信心的，人类可以从过去的不文明走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明。但是在古代的思想和著作中，甚至在以上四位哲人的著作中，也有强大的潮流。这些潮流要么是与对人类进步的信心、信仰背道而驰的，要么就是说人类的抱负是遭到限制的。它们是：1. 在嫉妒的神面前，人们感到危险和不安；2. 人类抱负应该有适当的范围，超越了就会出危险；3. 黄金时代以及失乐园的神话；4. 周期性循环的观念；5. 把物质繁荣的追求作为幸福的源泉遭到古代许多哲学家的诋毁。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现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西方文学名著，它对整个古代以及后来都有很大影响，它有助于解释古代对人类的看法。它与人类进步的观点的联系并不是消极

的。因为它极力褒扬过去的英雄——研究远古时代像神一般的英雄们在进行的那一场特洛伊战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强调和突出了这些英雄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死亡，并把这些英雄与过着悠闲生活的奥林匹斯众神相比较，因此其对英雄们的怜悯之情跃然纸上。史诗的结尾既不是写特洛伊的陷落，也不是英雄们对胜利的庆祝，而是写希腊英雄阿基里斯以及他的对手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所遭受的痛苦和悲伤。该书的第 24 章一开头就写阿基里斯无法入眠，流着眼泪怀念他死去的战友普特洛克勒斯：

> 回想几许往事，他眼泪扑簌簌地流，
> 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 他站起来，茫然地在海边来回踱步，
> 太阳照射到海滩上了，
> 他仍在那里踟蹰。

然后描写特洛伊的老国王来到敌营赎他的儿子赫克托耳（被阿基里斯所杀）。用这种方式，荷马在读者心中凸现一幅印象深刻的画面：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遭受折磨。在普里阿摩斯对阿基里斯哀求之后，荷马这样写道：

> 他说着，在另一个心里唤起对他自己父亲的哀伤。他牵着这老人的手然后又轻轻把他推开，他们俩都记得，当普里阿摩斯蜷缩坐在阿基里斯的脚下为其死去的儿子哭泣时，阿基里斯也在为他自己的父亲哭泣，后来又为普特洛克勒斯而哭泣。他们的

悲泣声在屋子里回荡。

在阿基里斯同意普里阿摩斯的要求而后又与他的宿敌共餐之前,阿基里斯说道:

> 这就是神给不幸的人带来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不幸中,但神却没有忧伤。宙斯的门口有两个瓮,一个盛着邪恶,一个盛着祝福。如果喜欢雷电的宙斯把它们混在一起抛给人们,那他就抛出邪恶,然后抛出祝福。但如果宙斯把悲伤从瓮里抛出,他就是要让人尝到失败的滋味。饥饿把人逐出大地的边缘,使他变得既不敬神,也不敬人。

荷马对人类普遍遭受苦难的描绘确实入木三分。即使最伟大的人也逃脱不了悲伤。这与其他时代思想典籍中所表达的对人的力量和成就的信心截然不同。不论人们在物质和智慧方面的成就有多大,都无法使人逃脱苦难和死亡。

人处于危险的困境,人的幸福和成功都是飘忽不定的,这已成为自荷马以来希腊、罗马思想中的主题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曾经说过:

> 过去曾经很大的城市如今大多成了小城市。而那些过去是小城市的在我这个时代却变成了大城市。因此,人类的繁荣从来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应对此加以注意。

后来希罗多德转引了索伦给富裕的克罗伊斯国王的忠告，人只有到死了才能说他幸福。因为“上帝往往给一个人尝到一点幸福的滋味，然后就毁掉他”。

当然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或一座城市的繁荣存在着危险性，虽然会削弱一个人对其自身命运的信心，但不会削弱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于进步的信念。在古代思想中，有一种信念却与一般的进步观有着更紧密而且有害的关系，这就是神会嫉妒人的成就，人的抱负或野心应该适当，要有节制，任何想超越这些限度的企图都会遭到神的惩罚。因此，在希罗多德的书中，索伦告诉克罗伊斯，神“嫉妒人的繁荣，会给人带来麻烦”。在《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的组唱中有一段是说“骄傲自大和傲慢会给人带来毁灭”。而那征服特洛伊城的凯旋的英雄甚至不敢踏上红地毯，因为他们害怕招来众神对他们的嫉妒。同样也是在这诗中，吹嘘人类进步的普罗米修斯也赶紧指出，是正义光顾了穷人，而不是财富和权力。同样，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赞美人的聪明和智慧之后，也警告说，聪明既会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邪恶，后来他又说：“神啊，人的傲慢能限制你的威力吗？……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条规律一概有效：对人而言，财富的光顾无不伴随着灾难。”该戏剧最后说：“理智是幸福的要旨。我们不能对神不敬。吹嘘者的夸夸其谈总是遭到巨大的打击，当他们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道理了。”

四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1世纪，温文尔雅的罗马诗人贺拉斯也用类似的话表达了神对人的野心、抱负是有限制的。

人并没有遇到太高的障碍，
他们愚不可及，还想爬上天。
哈，他们还有非分之想，
神震怒了，终于发出雷霆之火。

古代人们认为，人的野心应适当，如果超越限度就会招致无数的灾难。因此，那种认为人类的进步将持续不断的信念被许多人看做是对神的亵渎。人们对其潜力的认识总是因敬畏神而蒙上一层阴影，面对那些不可理喻的、不可预测和嫉妒的神而惶惶不可终日。

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赫西奥德在其作品中阐明了另一个对进步观有害的观念，即失乐园，人类从以前的黄金时代堕落。在他的诗《工作与时日》中，他把邪恶都归咎于潘朵拉，神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偷窃火种给人类，下令给奥林匹斯山众神，让他们创造一个女人，从而把邪恶和不幸带给人类。潘朵拉因好奇而打开了盒子，从里面飞出了所有的灾难、瘟疫和不幸，只有希望留在盒子里。同一首诗也叙述了人类从黄金时代堕落到现在的没落时代。在黄金时代，人们没有忧伤，不会衰老，不用劳作，田野自己长出他们需要的食物。赫西奥德还预见了人的进一步的堕落——孩子不尊敬父母，不尊敬客人，誓言不被承诺，暴力和邪恶将统治地球。这失乐园的神话——后来希伯来《圣经》中也叙述了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肯定对早期进步观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但是，在赫西奥德的诗中，他也强调辛勤劳动、良性竞争和公正公平的好处。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失乐园的神话慢慢地让位于前面

提到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和卢克莱修所倡导的更加进步的人类历史观。但是失乐园的神话从来没有丧失其对古代人想象力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它标志着在物质上比过去优越，倒不如说它转化为一种道德的理想——过去农业和游牧民族的道德理想有点像18世纪晚期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说法。道德堕落被看做是物质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回忆原始初民对艺术和实际技艺丝毫都不了解，但有吃有喝，这样反而比今天的人更像个人，更加温和。

> 所以在那些日子，没有极度贫困，也没有贫富差别；如果他们没有金银，他们就不可能富裕，而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没有贫穷也没有富裕的社会就会有高尚的原则；没有傲慢或不公正，也没有争斗或嫉妒他人。他们善良淳朴。

罗马诗人贺拉斯生活在奥古斯都成为第一任皇帝的时代，他的作品更强烈地表达了道德堕落的主题。他支持奥古斯都的道德改革："时间对道德的劫掠造成多大的伤害啊！我们父辈的时代比我们祖辈的时代更糟，它带给我们更少有价值的东西，导致新的一代变成更加邪恶的一代。"这些诗句开头用形象的蔓叶状的图形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一个是现代妇女在那里跳舞，卖弄风情，随便地跟别的男人睡觉，甚至在她丈夫面前。第二个是意大利旧乡村的图景，代表了古罗马时代的道德特征：

> 当时人们不会那么背信弃义，也不会打打杀杀。男的耕田，女的拾柴火。太阳下山了，就赶着牛回家。然后躺下来休息。

罗马帝国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中很多是表达这种对简单和富有道德的往昔的怀念。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对奥古斯都新时代抱乐观主义的态度。他说，这是对黄金时代价值观的回归，反映了罗马创始人的理想。维吉尔叙述了他的英雄埃涅阿斯纪——公认的奥古斯都的祖先，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和先驱者的葬礼。在葬礼上，他被认为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包括奥古斯都自己：

> 这就是奥古斯都·恺撒、上帝的儿子曾经发的誓言，他要在农神曾经统治的地方重新建立起黄金时代那样的帝国，而且要把帝国扩张到戛拉芒和印度……

正如R·G·奥斯汀对《埃涅阿斯纪》一书所评论的："……维吉尔的话有着特别的社会意义；农神的黄金时代象征着早期意大利生活的纯洁和淳朴，这正是罗马伟大的原因……很可能这里是指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的社会和道德改革没有成功……"

许多古代哲人都很相信人类历史的周期性的循环。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谈到人类文明会多次遭到摧毁，摧毁之后又再生和发展。所以后来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相信历史上发生的间歇性的大火灾和周期性循环还会发生。这种观点使得所有

对进步的信念都是暂时的，当然它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两个大灾区间的一些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念。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确实作出这种论断。同样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指出："或许每一种艺术和科学都发展到极至然后消失。"但这种悲观的看法并没有阻止他在其他领域形成一种清晰的看法，即知识是不断积累、不断进步的：

> 对真理的探寻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没有人能够穷尽真理，但也没有人完全失败。每个人都说出了某些事物的某些本质，对具体一个人来说，他对真理的贡献只有一点点甚至没有，但积累起来就可观了……

这清楚地表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一个整体，知识是不断进步的。正如爱德尔斯坦在他著作中所说，在希腊和罗马哲学家中，对过去知识的进步和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心越来越强。这种信念在公元1世纪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的著作中表述得最为强烈，塞涅卡也与罗马一般的悲观主义者一样认为，邪恶与文明相生相伴。他也赞同斯多葛派的观点：世界终有一天会被毁灭，所有人类的杰作都将被毁灭。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信念，他预言："长期的辛勤的研究会使现在还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理昭然于天下……我们的后代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对他们却那么明白易懂——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普林尼在讨论天文学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类不必绝望，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每一代的知识都是不断进步的。

在古代，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知识的进步的信念比对物质繁荣的无限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念要强得多，普遍得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的主要哲学家都具有强烈的苦行主义。柏拉图哲学诋毁物质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反思是幸福的要素，是“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即使认为快乐即幸福的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派也强调要限制欲望的数量，并从喧哗、骚动的商业化城市生活中淡出。对财富的欲望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会剥夺人的满足感并导致冲突和战争。所以伊壁鸠鲁派诗人卢克莱修（他的关于人类过去的进步的言论前已论及）的乐观主义，因其又同时强调文明进步在衰落并因此导致道德的退步、争斗和不满意而有所暗淡。他明确表达了对更大快乐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观点：

> 所以人类的受苦永远是无意义的、徒劳无益的。整天烦恼发愁却毫无成果，因为他们无法认识到真正快乐的获得和增加是非常有限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驱动着生活向前发展，从陆地到海上，以致波涛翻滚，卷起战争狂潮。

一句话，在古代，人们有时确实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知识进步充满信心和信念。但在大多数时期，人们普遍对人类道德的方向感到悲观，并对往昔的美德眷恋不已。在现存的典籍中，确实有很多可以证明当时人们对人的理性和创造力充满信心，而且相信在他们之前物质生产、技术和艺术等方面都取得过很大进步。但那个时代的人们由于强烈地感受到人类的困境，以及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追求是徒劳无益而感到极

大不安，从而使他们原有的对未来的信心和乐观主义大大地冷却了。

早期基督教的观点

基督教对世界的看法是如此丰富和复杂，以致其观点本身就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东西——有些对现在和未来充满着乐观主义，有些则对人类在地球上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和范围感到悲观。正如理查德·塔那斯在其著作《西方人的激情》中所说的：

> 的确，乍一看基督教确实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但是二者之间既共存又有交叉，有一种不断的张力。其中一种是狂喜般的乐观主义，它相信一切，而作为补充的另一种观点则包含着严厉的限制和审判，是二元论的悲观主义。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了世人，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得以永生。上帝的旨意因圣子而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并常驻我们心间。上帝的安排使过去人的物质世界与上帝的精神世界的分离重新得到统一，这是好消息。人类现在已经从极度的不安和对死亡的恐惧中胜利地解放出来。对死亡的恐惧原本限制了异教徒对人类处境的乐观主义。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即根据上帝的意志以一种单一的形式不断展开。这种线性的逐步实现人类潜力的概念是西方进步观

的主要内容。但必须注意早期基督教有关历史目标的非物质的本质的观点。世俗的荣耀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塔那斯所言:“所有真正的进步必须是精神方面的,这样才能超越这个世界。”的确,对物质世界和肉体要求的诋毁是基督教的永恒主题。在《马太福音》第6章中,耶稣说:

>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财利……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告诫,它劝人们把精神的和道德的要求置于肉体的需要和物质的进步之上,而这恰恰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内容。但是地球上的人类要在道德和精神上取得进步需改革和“更新”的东西还多着呢。

从一开始,基督教的思想中就有较暗的一面。从开始到启蒙运动的多少个世纪中,人类进步的观念就深受其影响和腐蚀。再没有人比圣奥古斯丁(354—430)更悲观的了。对他

来说，在肉体的快乐中寻求幸福是愚蠢，肉体的欲望是邪恶，对肉欲的依恋是罪恶。而且他认为，道德和精神的完善不可能由人自身的努力而达到，而必须靠上帝对其罪恶的宽恕。在伟大的上帝面前，人算不得什么，而且需要上帝不断地宽恕。因为圣奥古斯丁信奉凄凉的原罪的教义——人生下来就秉承了亚当的罪过；没有经过洗礼的婴儿就不是纯洁和天真的。原罪使人堕落，人没有权利自救，也不可能通过运用人的理性来拯救自己。原罪使人软弱无力，无法实现完美或道德进步。这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人类理性的进步可以促使其道德的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当代的圣奥古斯丁——著名的异教徒贝拉基对人性持更乐观的态度，而且认为人的优点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圣奥古斯丁坚持认为人的努力根本没有结果；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只能靠上帝的仁慈和怜悯才能得到拯救。圣奥古斯丁部分是出于维护上帝安排一切的教义。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以及对死亡的恐惧都是理所当然的。人类罪恶深重，本该遭到诅咒并永远死去。只有得到上帝分外的宽恕和怜悯，人类才能得到拯救。按这种极端的观点，谁该下地狱，谁可以上天堂的界线就模糊了。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景都是令人不安的。

维护上帝的旨意也渗透于圣奥古斯丁著名的二元世界：上帝之城与世界之城。面对遭劫掠的罗马城和帝国的逐步衰落，圣奥古斯丁竭力强调上帝要来拯救的承诺以及上帝的计划。但上帝的拯救是在另外一个世界，而不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圣奥古斯丁把世界分成两种：一个是上帝之城，人们把无私的爱都奉献给上帝，他们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另一个叫世界之城，那里人们只爱自己，傲慢并且不遵守上帝旨意，最后

审判日到来时他们得跟魔鬼一样下地狱。对圣奥古斯丁来说,真实的状态,比如罗马,是这两种状态混杂、缠绕在一起,在最后审判之前都是这样。上帝之城的公民是耶稣的信徒——他们生活在物质的世界就像外国人一样,从来没有真正的在家的感觉。在圣奥古斯丁的训诫中有一种深刻的悲观,它认为无法消除人类社会中的紧张和控制现有的邪恶,所以它蔑视所有世俗制度的终极价值:"就人的生命而言,他已度过并将很快结束,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在谁的统治下他都无所谓,只要那统治者不强迫他做一些不神圣、非正义的事就好了。"在圣奥古斯丁看来,政治制度——甚至罗马帝国——都不是上帝的初衷。奥多涅尔在他的《圣奥古斯丁》一书中写道:

> 用世俗的字眼,上帝之城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前景确实凄凉,毋庸置疑。大多的人类社会,由于被政治家的胡言所迷惑,以为人类的处境现在好多了。人们忘记历史,因为他们不想记住过去的人们曾经走过的繁荣之路及其自鸣得意的神情。但自圣奥古斯丁以来的西方基督教一直在以预言者的声音宣告人类政治社会的极度虚弱,基督教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这样人类处境的黑暗就算不得什么了。

对人类的努力抱这样悲观的态度,在早期的基督教或者在圣奥古斯丁的所有著作中也并非一贯如此。正如尼斯别特在其《进步观的历史》中指出的,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确有一些段落可以表明他真的欣赏过去人类文明的进步,虽然,正

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这并不是他的著作始终坚持的观点——圣奥古斯丁好像更强调人类道德的脆弱和无能。但在圣奥古斯丁时代却有人（优西比乌斯和奥利金）持不同的观点，他们实际上是想论证罗马帝国是上帝旨意和计划的逐渐呈现，这样就赋予了基督教帝国神圣的意义。把现存的政治秩序神圣化，在后来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又再次倍受欢迎并盛行起来。但是，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的让位，如果换成是中世纪早期则更顺理成章了，因为当时的人们跟圣奥古斯丁一样轻视人类世俗的成就，而且也赞同圣奥古斯丁关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与耶稣基督的精神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圣奥古斯丁和他的信徒们认为的承担和履行好日常工作不是一个基督徒的重要义务。正如R·A·马库斯在其著作《圣奥古斯丁神学中的历史与社会》中所言：

> 他始终认为，社会不是人类追求至善的媒介。他把社会贬低为人类在堕落时代的暂时需要。这种观点与他的历史的世俗化是相对应的。

可以说，早期的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在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徘徊的。对人类进步的看法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而有时则对人类进步抱着敌视的态度。上帝计划的展露导致耶稣再临——这具有很强的纵向历史感。但与犹太教的先驱者不同的是，基督教的历史在许多记载中包括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并没有说一定会导致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式的以色列王国，而是在可怕的末日审判日之后把人类带入精神的天堂——这样的历史的终结是有启示性的。尽管有人相信太平

盛世将会到来，即耶稣统治世界的辉煌时代（《圣经》中的“启示录”就是这么预言的），但他们也认为这只有在世界毁灭、所有的罪人（即大多数的人们）被硫磺石烧死、遭到惩罚以后才会出现。对最后审判日的危急的普遍确信，具有启示性意义的历史的终结，以及相关的对末世精神的救赎的期望和追求，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人们原来持有的世界将以缓慢、渐进的方式不断进步的信心。但伯里在《人类进步的观念》一书中写道：

> 对圣奥古斯丁或任何一个中世纪的宗教教徒来说，如果世界在他自己的一生中结束，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他对诸如社会的逐步改良或知识的增加能否使历史在最后审判日到来之前继续下去之类的问题毫无兴趣。

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能力将进一步限制进步的观念。人被看做是有罪的，需要靠上帝的宽恕与怜悯而得到拯救，他用自己的努力来改造自己注定要失败。与首要的需要“信仰”和启示性的真理比较起来，人类理性的价值也值得怀疑。所以圣保罗在给希腊科林斯人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人类的智慧在上帝看来是傻瓜……而上帝深知聪明人的那些思想，他们是徒劳的。”正如奥多涅尔所说，基督教的世界观与异教徒（或现代）的观点截然不同：“基督教并不宣扬现在的力量以及最终的无意义，它反其道而行之，它对有罪的人类的能力抱悲观态度，而对其未来的命运却抱乐观的态度。”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人们精神上的救赎是值得颂扬的，但对一个在圣奥古斯丁

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人，面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他怎么也不相信人类理性和人类进步会取得胜利，因为历史本身就不是这样。

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

如果在中世纪开始时社会的变化远不是积极的话，如果中世纪欧洲的辉煌成就是缓慢地展示出来的话，那么人类进步的信念就难以占统治地位。而文艺复兴则为进步的信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这个时期是西方文明的第二次繁荣，其程度不亚于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上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文学上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科学方面有哥白尼、培根和伽利略，而他们只是我们从众多精英中举出的几个代表而已。意大利和荷兰的一些城市率先开拓新的商业和银行业。几个重要的发明则对思想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1. 印刷术使得思想以史无前例和无法想象的速度得到传播；2. 航海罗盘促成了环球航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与远东地区有了接触；3. 火药宣告了封建和中世纪战争的结束，并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突然，历史的脚步加快了，生活的经济基础和生活质量在人的一生中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人类理性和人的独立价值又产生新的信念，而这是由这个时期的艺术、商业和航海发现带来的。

尽管这个时期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和实际的进步，尽管人们对艺术、诗歌、哲学和文学又产生了新的兴趣，但是有信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还是难以形成清晰的关于人类进步的概念。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对古代的尊崇，

另外还有教会的力量。中世纪晚期重新发现的大量的古代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典籍是文艺复兴的火星和取火盒。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主要在不断地发现和解释古代思想,而许多艺术也主要描绘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人物——这打破了基督教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人们更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但对古代文明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崇拜导致了对人类进步信念的阻碍,其程度与早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对进步信念的影响不相上下。

约翰·哈雷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一书中阐述了古代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 与中世纪相比,那遥远的过去却使他们更加关注。古代社会只是缺少马镫、罗盘、印刷术、火药、教皇统治和美洲大陆。但古代社会在历经时间的冲刷和筛选之后,一座座丰碑完全显露出来,那是一个充满着智慧和创造力的巨人的时代。无论是在哲学的沉思、政治的行动还是文化方面,都是以极大的活力进行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历史也因此显得不仅在时间上有清晰的界线和距离,而且有不断的循环——从蒙昧状态到帝国时代然后又走向野蛮和混乱。

这种对古代文明的尊崇不仅阻碍了人类进步的强大信念,也强化了人们的认识:中世纪使得历史从这成就的巅峰下降,而且是灾难性的衰落。因此毫不奇怪,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强调历史的循环论。马基雅维利把历史看做是从

秩序——混乱——秩序的循环过程；命运可以随时把一个国家颠倒过来，颠倒过去。人类历史并没有很强的线性式的发展。经过近千年的黑暗世纪，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但历史也有可能再回到那黑暗的年代。

教会的力量是第二个强大的阻碍因素。它制约了人们重新解释、控制世界的理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教会鼓励、支持对艺术和古籍的研究，但它对新观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激进的哲学家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遭到宗教法庭的迫害。天主教会所作的跟随新教的决定是为了重新肯定《圣经》的正统观念，而当时这些正统观念正受到新天文学的挑战，因此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的序幕拉开了。在以后的 300 年中，人类理性和科学逐步战胜了宗教的正统观点，并对古代圣人如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论提出怀疑和挑战，这给人们以自尊，从而对人类进步充满信心。

启蒙运动：人类进步的胜利

从伽利略重要的天文发现到 1821 年拿破仑去逝的 200 年间，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称作“启蒙运动”——它最后促成了，至少说在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了对过去和未来的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这样，对人类进步的信念所要求的条件都具备了：人们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可以操纵和控制变化；出现了一种更为世俗化的气氛，因为宗教丧失了部分情感上的魅力，另外新科学也弱化了所谓上帝的积极的而又不可预测的安排；对过去的权威采取了新的批判的态度，在人的一生

中已经有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

各方面的新视野和新观点对传统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探险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慢慢地冲击欧洲中心论。人类学发现了新的种族——有些是野蛮未开化的，而有些，如中国却拥有古老和高度的文明。缓慢地但又是必然地，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化石和遗址的发现表明，《圣经》所说的世界诞生的时间显然是太短了。世界太大了，多种多样而且非常古老。但用新天文学的观点来看，它又小得微不足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后来的伽利略以更简洁明了的语言所表达的他所观察到的天体的复杂性，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位置的丧失，对人们心理的震动是不能低估的。正如《世界的多样性》一书中所说：

我开始看着这个小得可怕的地球。

传统的基督教的世界观越来越不可信了。17世纪末，牛顿提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个理论与他的运动定律一起似乎可以解释天体的运动。这种新的、科学的和机械的宇宙观的理性解释，与教会所坚持的早期的托勒密天体的复杂性，以及但丁和宗教艺术中所描绘的装饰华丽而又静止不动的天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理性好像胜利地挑战着传统的基督教的世界观。然而，如果宇宙可以用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来解释的话，那么在许多人看来就会削弱上帝有意安排的范围。但牛顿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现世信心的增强，以及彻底地对宗教教义的摒弃是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信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为促进社会改良和人类进步发挥人的自身的潜力，使人们

从圣奥古斯丁的恐惧感和罪恶感中解放出来。正如诺曼·汉普森在其《启蒙运动》一书中所说：

> 皈依宗教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始祖的堕落及被逐出伊甸园。人生来就有罪，不断地做错事，流眼泪，大多数人的最后结局是遭到末日审判和惩罚。

或许对宗教的新观点的最极端的表达来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的著作《与超自然相对立的自然观或常识》(1772 年版)。在他看来，神学“之所以被尊崇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对它不能理解”、“是对自然的原因的忽视”。他强烈抨击宗教带来的不良的社会影响：

> 在可怕的阴影、恐惧和无知占据人的心灵的情况下，人类怎能取得大的进步呢？人们被迫停留在最初的愚昧状态，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他的头脑里只充塞着看不见的力量或神的故事，他的幸福就依赖这看不见的力量。由于心里只有恐惧和不可言喻的尊崇，他总是要靠牧师的怜悯，牧师拥有替他思考、为他指路的权利。因此人变得像个没有经验的小孩，没有勇气的奴隶，一个傻呆的动物。他害怕理性，从来没想过如何从他祖先迷失的迷宫中挣脱出来。他相信自己只能在神的桎梏下呻吟……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虽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也认为，宗教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有害的、致命的，是对人类

进步的阻碍。如果某些宗教信条产生的偏见和宗教战争可以用人的理性来控制的话，如果宗教的容忍能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话，那么人的困境就会很快地改善。

新科学不仅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和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它还导致了更普遍的对古代典籍权威的反抗，特别是反抗亚里士多德的统治地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古代圣人的偶像崇拜削弱了人类进步的信念，文艺复兴时的偶像崇拜到这时已经灰飞烟灭。

正如伯里在《人类进步的观念》中所说，笛卡尔很自豪他已忘掉了他的希腊语。而在其1668年的著作中为伦敦新的皇室社会作辩护的约瑟夫·格兰维尔，则乐于摒弃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转而强调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效用的重要性。伯里引用格兰维尔的话论证说，我们应该更感谢航海罗盘的发明者，“而不是上千的亚历山大和恺撒或几十个亚里士多德。罗盘的发明者对知识的积累和世界所作的贡献，比学院建立以来无数狡猾的诡辩家要大得多。”

过去人们对古代圣人盲目崇拜，现在解脱出来了，这使人们对在科学方面取得进步的能力的信心大大增强了。枫丹侯爵在路易十四时代曾在法国科学院担任大臣长达60年。他在巴黎的沙龙或聚会上极力宣传新科学，并明确表示，知识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是完全可能的。经验的积累和方法的改进可以不断地使新的一代在上几代人的错误的基础上学到新东西，并有新的发现。

对于来自新科学的人类理性力量的新的信心，其程度是非常深的，怎么说都不会过分。法国政论家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50年出版的《论人类智慧的不断进步》著作中，

有以下一段话可以说明这种信心增强的程度：

> 最后，所有的乌云都被驱散了。智慧之光普照大地！各个领域的巨人聚集在一起，多么完美和伟大的人类理性啊！牛顿使无穷尽的宇宙变得可以计算。他揭示了光的性质和特征。而以前光为我们照亮了一切，却隐藏了自己。牛顿把星星、地球和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他的天平上。

人们也越来越乐观，新科学使人类更好地征服和控制大自然，改善和促进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0年给约瑟·普雷斯特里的信中所说：

> 科学的如此快速的进步有时让我后悔自己出生得太早了。我们无法想像1000年后人类对自然界物质控制的力量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大众变得轻飘飘起来。农业方面，人们不用那么累死累活，而产量却可增加数倍。所有的疾病都可得到预防和治愈，甚至包括那些古老的疾病。这样我们的生命将得以在快乐中延长，甚至超过大洪水以前的水平呢。

但枫丹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信心只局限于科学和知识的范围。他相信知识可以不断积累和进步，但他对社会或道德进步则持怀疑态度。伯里非常简洁地概括了枫丹的观点：

> 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傻瓜，只有极少数理智的人。人们的激情是一样的，过去会发生战争，将来也会。文明没有什么作用，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装饰而已。

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颂扬科学的威力之后也发出惊叫：

> 噢，那伦理学也在不断发展，但人与人之间却狼心狗肺，人类最终会认识到他们被称做人可真不配！

但是许多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确实把对理性的信仰扩展到社会、政治甚至道德领域。许多人，当然也包括富兰克林，都非常相信，通过理性的政府的完善，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进步。许多人还认为，理性可以使人的本性更加完美，并导致真正的道德进步。阿贝·德·圣皮埃尔是法国作家中明确表示理性可以用来使政府的管理科学更加完善，并促进社会和道德的进步。他论证说，理性既可用在自然科学，也可应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对政府管理科学和管理艺术作理性的改进可以实现黄金时代那样极大的幸福，而且可以消除战争。他甚至建议成立一个欧洲民族团体，用理性来仲裁和解决各种争端。法国另外一个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人们道德水准的不同是由环境或社会造成的。理论上说，道德可以通过明智的法律、理性的制度和良好的教育来完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孔多塞的作品是当时乐观主义的代表，他认为人的完善以及人类进步的各个方面——物质的、科学的、道德的和政治

的——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在他写于1794年的著名论文《人类理智的历史图景》中，他想论证"人类才能的改进是没有限度的，人的完善绝对是无止境的"，"知识的进步与自由、美德以及对人的天赋权利的尊重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啊！"孔多塞预言，"阳光照射着每个自由的人，人们不知谁是主人只知理性，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他认为，理性法则可以使世界摆脱暴政和迷信，促进平等、健康、繁荣和幸福，甚至可以使人们主动地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不是愚蠢地让世界充斥着许多无用而又可怜的生灵"。

美国和法国革命（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在国内国外都掀起了巨大的乐观主义的浪潮——理性有助于建立起新的政府并赋予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正如普雷斯特里在给爱德蒙特·伯克的信中所说：

> 那时的前景是多么光明啊！把过去的一切都倒转过来，我们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是多么光明啊！……
>
> ……理性作为所有争端的仲裁人，它可以消除对外的战争，也可以熄灭内战的战火。当人们把剑锻造成犁铧，把矛变成修枝的剪刀，当民族之间不再互相敌视，当他们认识到不应该再进行战争的时候，理性的帝国就带来了和平。理性、商业精神，再加上基督教义和真正的哲学，就可以推动我们这个时代前进。

但这种毫无保留的极端乐观主义却敌不过法国大革命早

期后的恐怖——孔多塞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丢了命。在巴黎,1 100 人走上了断头台,而拿破仑后期的独裁歪曲了法国大革命的崇高目标,这些大大挫伤了许多青年(包括年轻的华兹华斯)纯真的理想主义,人类可以尽善尽美的新观念也失去了魅力。但是,对道德进步的信念却没有丧失——在 19 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仍发挥着作用。废除奴隶制,普通人拥有选举权(先是男人后来妇女也有)以及教育的普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人的尊严,改善人类的道德情操。早期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是拉那郡一个工厂的老板,他也相信:现有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不幸和邪恶,而社会变革可以让它们从世界上消失。在 20 世纪,人类可以尽善尽美的理想主义在一战和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中几乎破灭。人类制造邪恶的能力有增无减。社会变革在这个更加血腥的世纪继续进行着,但目的是为了促进福利的进步和平等,而不是指望社会变革能自动地促进人类的道德完善。那种认为理性可以使人类道德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到头来并没有成为现代进步信念的主要引擎。

甚至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人类进步的看法也大不相同。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也反对那种认为只要理性就可促进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的看法。最极端的要数让·雅克·卢梭,他认为:"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日臻完美,我们的心灵日渐腐朽和堕落。"而他极力为浪漫主义的"高尚的野人"的观点作辩护。在下面一章,我们要对这个观点以及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对理性可以促进人类进步的信仰的反应作详细探讨。我们还要探讨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思想家比如康德的观点。康德一方面坚信进步是朝着更加理性的状态发展,但他又强调,野

心、贪婪和骄傲在促进人类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比理性本身大得多。一个折衷的观点，一方面强调理性和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个人自由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这在英国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传统中最为普遍。亚当·斯密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论证了，只要在理性的制度、法律法规和个人自由的框架下利用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所表现出的创造力，那么是可以取得进步的。他相信，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运作，自由市场可以导致最有效地满足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的欲望和需求——每个人都埋头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最后也使社会的福利实现最大化。汉普森评论道，这一理论"消除了传统的基督教关于美德与欲望之间的冲突"。但斯密自己却一再强调道德情操的重要性，虽然他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他的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分析日益被重视，而自由市场被看做是可以保证福利事业的无限进步和财富的无限增加——这是社会期待的解决办法——却不必对社会的公民进行道德陶冶并使之完善。这种方式一下子就变成了现代的进步观念，它不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完善而是放在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理性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上。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好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们不断地取得幸福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

第四章 人类进步的哲学

启蒙运动时期，对人类自我完善能力以及人类理性推动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空前高涨。当然，这种对人类理性将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并不是普遍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众多思潮中两股有代表性的思潮——它们有时对理性的进步可以促进幸福生活的观念进行温和的反拨，有时则以激进的方式完全否认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或意义。这些运动和思潮是本章第二部分所要探讨的。但即使在那些对人类进步同样抱有信心的思想家当中，也并非只有一个同样的观点——不论是在启蒙运动时期还是之后都是如此。本章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人类进步观念在理论上的五种分歧：1. 有人认为进步是一个必然的进程，具有可界定和可预测的目标，但也有人认为对历史的快乐结局的相信只不过是一种信仰而已；2. 有人认为进步具有规律性，而有人则认为，进步只不过是各种不同因素

的相互作用，其结果虽然是积极的但仍然是不确定的；3. 有人认为个人或社会对理性的运用是造就美好未来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强调反社会甚至非理性动机（如贪婪或自负）的重要性；4. 双方都认为自由是进步的关键，但分歧在于，自由到底是集体具有自由还是个人具有选择自由并免于被强迫；5. 有人认为，进步表现为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的不断改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真正的进步是通过民族的自我表现和民族价值的不断发展来实现的。这五个对应且相互联系的争论和分歧主导着过去250年人类进步观的哲学演化。

五种分歧

第一种争论的焦点在于未来是否具有确定性或可望进步。一些人认为，未来的人类进步是必然的，而且具有一些可预测的、人们期望达到的目标。犹太教的进步观认为，历史是神引领人们不断前进，在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就达到顶点，给世人带来了美好的黄金时代——这是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耶稣必然再临，末日审判也注定到来，少数人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拯救。这两种都是很特别的人类进步观——与知识的进步、物质繁荣和社会进步不相干。但这两种观点与19世纪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的终结的观点相似。黑格尔认为，人类的进步是必然的，而且有一个可预测的、人们期望达到的目标。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理论。福山在其颇有争议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观点更是推崇备至。

福山认为，在20世纪末，人们更有理由相信历史是一个单一的、连贯的、理性的不断演化的过程，它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跟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他也相信历史的尽头是看得见的。这并不是说重要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而是说"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已经不会再向前发展，因为所有的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对马克思来说，这历史的结局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福山认为，历史的结局应是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实现了自由、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解决所有个体想获得承认的欲望，因为它们可以使所有的人得到相互承认。他看到其他的政治经济主张都行不通，因为那些主义不能使人们普遍获得相互承认。这也可以证明自由、民主必然取得胜利。福山还认为，科学正日益成为历史的调节机制，科学的进步会导致所有社会的日益同化。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实体"，真正的全球性的历史的结局就更确定无疑了。

但很多人会对此表示怀疑，不愿作这种历史是单一的、理性的进程之类的假定或推测，也不相信未来必然以这种方式作结。我们或许同意，在过去，人类是不断上升和进步的，特别是在知识、科学和福利事业方面，但是我们却不想把这种上升推及到未来，认为未来必然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如果人类进步的理论不仅要人们确信过去是进步的，符合人们期望的方向，而且还要预言未来也会按人们期待的方向向前发展，那么我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会同意J·B·伯里的看法：

> ……无法证明，人们往前走要到达的那个不可知的目的地就是人们所期望的。这种向前运动或许

是进步，但也可能不是人们期望的方向，所以也可能不是进步。这个问题跟人是否可以不朽的问题一样，在目前还无法解决。这是个涉及到生命奥秘的问题。

而且，即使人们可能承认文明的进步至今一直是按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如果再沿这个方向走下去，将会促进人类的普遍幸福，但是无法证明最终的成就会完全由人们的意志来决定。因为前进和发展到某一点时有可能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对J·B·伯里以及我们的大多数人来说，对未来进步的信念就成了一个信仰问题了——我们有这种信仰或者没有。人类不断地为进步而奋斗却没有一个肯定的结果。

第二种是关于人类进步背后的机制的不同看法。那些相信人类进步是必然的人们一般认为，人类进步是有规律的，正如自然或数学的规律或定律一样，这是19世纪中期孔德的观点，他提出人类的三个阶段。斯宾塞宣称他已发现社会进化的规律。斯宾塞认为，进化应该是进步性的。进化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过程，生物进化如此，人所生活的社会的进化也是如此——进化把人类生活逐步地推向更高的组织状态和更高的复杂性，这是通过人逐步地适应其文明环境的机制来进行的。黑格尔的理论则持不同的观点，且具有更长久的影响。他的历史辩证法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太容易理解，但他的主要观点很有影响，即历史不是一连串不可预见的事情的集合，而是有规律、有目的地向前运动。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以深奥出名，这里只作简单介绍。他认为，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

人类精神看到冲突的因素在复杂的情况下逐步地得到解决，历史是人类精神不断了解自身的必然结果。当我们达到再没有什么问题可解决的时候、当精神达到一个完全理性的状态时，历史就走到尽头了。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许多思想，同时摒弃了黑格尔的“精神”以及不可思议的形而上学。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规律是：它必然客观地走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命运将通过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来实现。

但是，过去150年在西方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对人类发展具有必然规律的观点却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比如，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被认为是误读了长期的真正进化适应的框架——这一框架是建立在偶然变化而不是后天的特征的遗传之上，而且社会进化论也误读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机会主义的本质。在自然界，后代的进化适应未必在客观上比其前代更优越，除了生存能力之外。自然不能在发展方向或目的方面与历史进行类比。西方思想的确越来越怀疑历史是根据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目的或模式发展的。人们逐步认识到，黑格尔的包容一切的“精神”是一个不必要的也不能让人信服的幻想，而历史的进程也不是由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来主宰，而是由各种力量相互的、自然的作用来推动的。因此，人类进步的现代模型是把知识力量的不断积累看做是促进人类理解和控制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的因素，而且知识的不断积累与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利益时发挥的创造力相互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们认为，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当然可以使未来进步的可能性增加，但并没有得到保证。

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不仅忽视了个人的自由选

择，而且也忽视了偶然的和意外的事件——偶然性事件的影响，如希特勒或拿破仑的存在，或者哪个神经不太正常的首脑控制着核按钮。无论我们在历史中发现多少发展模式，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偶然性事件具有很强大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使人类进步脱离原有的轨道。而且有些人认为，偶然性事件主宰着历史的进程，并且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伊塞亚·伯林的问题：

> 难道历史只不过是毫无目的的一系列的事件吗？难道历史是由于一些因素混杂在一起并盲目地相互碰撞，生出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但又毫无意义的故事吗？

在西方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怀疑主义认为，个人对未来的进步产生信心还是陷入绝望，最终取决于个人内在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我们找不出必然的目的或目标。尽管许多人仍希望从人类过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推断未来也将如此，但是乐观主义还是得靠信仰和希望。

第三个主要分歧在于：理性的运用，特别是对理性的集体的运用在一个更理性、更道德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是否成为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一些人强调其他因素在人类进步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比如杜尔哥认为，个人的激情和野心是促进进步所必需的。他说，没有“非理性”和不公正，就根本不会有进步。伯纳德·德曼德维尔在他的诗《蜜蜂寓言》(1714 年)中强调贪婪、奢侈和自负在促进繁荣和成功中的重要性，他的诗既幽默又让人震惊。或许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论文《我的历史观》中所阐述的理论。他把历史看做是人类在理性、道德和自由各方面潜能的发展。但他认为,这种发展不是由有意识的、理性的或善意的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带来的,而是由社会内部的对抗,由恶意的反社会动机和人们想统治别人的欲望所导致的冲突带来的。他巧妙地把这种对抗界定为"反社会的社会性":人们想统治别人,但在冲突中又需要别人作为搭档。康德认为,正是这种冲突使人类从总体上发挥了它的才能。他认为,这种有目标的冲突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幸福或满足,但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 还好有这种反社会的本性,这种嫉妒和虚荣,这种永不满足的占有欲和权利欲!没有这些,人类天性中的最好的才能就会沉睡不醒,永远得不到开发。

萧伯纳在他的戏剧《人与超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 理性的人让自己适应社会;非理性的人总是坚持让社会适应他自己。所以所有的进步都得靠这些非理性的人们。

康德在散文《永久的和平》中,确实预见到永久和平的到来。但他同时又说,战争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刺激或推动力。后来的许多德国思想家如黑格尔也认为战争和冲突在锻造人类时所起的巨大作用,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观点已没那么让人接受和欢迎了。

比较而言，西方思想中确有一种很强烈的纯理性主义——它主要由许多信仰聚合在一起，都认为人类的主要问题像物质世界一样，至少在理论上说可以由理性来解决。只要我们（个人和集体）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根据这些理性的解决方式，生活就可以飞跃式地向前发展，达到黄金时代那种和平和繁荣。无论是基督教徒、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主义者，许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相信，如果这些正确的理性的答案能贯彻在政府的政策中，就可以造就一个更完美、更有道德的社会。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一些思想家甚至认为，通过把理性运用在道德领域，通过改善教育，建立更理性的制度和更好的国家之间的条约，可以使人性日臻完善，并消灭战争。所以，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写的作品中就认为，理性的进步可以消除偏见，导致自由和道德的进步，而启蒙运动的进程将导致持续不断的社会进步，结束战争和不平等，使人类前进并更加接近真理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在他那些乐观地论述人类进步的作品出版之前，他被雅各宾派的革命者逮捕并死于监狱。但启蒙运动时期的乐观主义仍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法国、德国政治家要建立欧洲联盟的原因。他们仍然相信，理性的行动计划可以防止战争，改变历史，促进社会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和美国人思想中有一种混杂的观点：它虽然对科学和法律规则的理性持乐观的态度，但也强调利用人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性，比如以人的性格陶冶来促进社会进步。当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当理性用来追求自私的个人发展和荣耀时，人的理性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可以保证：竞争和个人理性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可以从总体上促进社会的经济进

步。甚至那些不完全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建立起社会和谐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也关心在一个理性的制度、政府行为和牢固的道德规则框架下，有效地利用和发挥个人以及竞争对手的创造力问题。尽管在政界和经济界继续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应在多大程度上由集体的理性计划来指导和限制进行辩论，西方大多数人仍认为理性和自私的动机对促进人类进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亚历山大·蒲柏在他乐观的《论人类》中这样写道：

> 两个规则在支配着人类：
> 自爱是动力，理性是控制。

第四种有关人类进步的辩论是关于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促进人类进步中的作用。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少有评论家不把自由的重要性挂在嘴上，但对自由这个词的解释却截然不同。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许多思想家基本上把自由界定为通过进入理性王国来集体地获得权利。以这种观点，自由就不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或免于被别人强迫，而是有机会生活在一个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理性的意志的国度。换句话说，自由变成了个人意志，在完美的理性国度中得到升华。马克思对自由的定义还涉及经济的范畴：除非人们能平等地（即集体地）控制经济方式并进行自己的选择，否则人们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自由。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人们对这种集体性的自由产生怀疑，主要是由于担心黑格尔或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进步必然会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性的王国——也就是说，通过辩证的发展会进化到理性王国，理性王国可以超越所有的冲突，

并使个人意志与国家处于完全的和谐状态，这样必然会怂恿政府完全免除个人的免于被强迫的自由，以及其他的道德约束。这种期待的目标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会使那些无法适应这种变化的人们处于危险的道德困境。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使我们更加注意黑格尔或马克思认为很有道理的这些观点。

比较而言，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舆论强调个人选择自由以及免于被强迫的重要性。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推崇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自由，而且绝大多数国家还在法律中规定个人的权利，以保证个人拥有自由思想和行动等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自由民主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人自由行动的权利会与另一个人的权利不被损害相冲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的文章中强调，只要个人的行为不损害到他人，那么个人就应该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在我们这个联系日益密切、越来越拥挤的世界，许多人都认为，没有什么个人的行动不会对别人产生重大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民主政府应该在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的更加和谐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应该在为整个社会营造最好的社会和环境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些相信集体的理性计划可以在经济领域为社会问题找到答案的人们，则更希望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利，甚至不惜牺牲个人追求其自身经济利益的自由。而那些认为野心和竞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的人们，如杜尔哥和康德，就倾向于强调个人自由竞争以追求其期望的荣耀的重要性。同样，那些相信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天赋自由的条件下，可以最好地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人们（如亚当·斯密），就会强调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性。对这些思想家

来说，不断进步的机会只有通过自由化、小政府和全球自由贸易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也就是说，经济自由和利益最大化要求公正和完全竞争。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再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

人类进步的哲学中常出现的争论，即第五种分歧是：有些人把人类进步看做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全人类命运的体现；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民族自我表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一些事实，如法国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相信，只要设计出正确的理性的行动方案就可以消除战争，使人类和谐相处。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目标和文明的文化价值是永恒的、普遍的。理性不仅可以发现物质世界的规律，同样它也可以为人类问题找到普遍的答案。孔多塞甚至认为，欧洲从本质上说是同一个社会。而另外一个法国启蒙思想家查斯特卢斯认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最终是相同的，可以在理性的原则下进行调整。德国哲学家对这种突出的法国式普遍性思想家的说法作出德国式的反应，赫尔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然这种反应与德国人厌恨法国在18世纪政治、军事上的统治地位有关，也与厌恨法国那自负的世界主义的世界观有关。赫尔德认为，民族的自我表现是极其重要的，每个民族和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价值观生活，唱自己的国歌，按自己独特的历史节奏发展自己的国家。进步就是实现民族性。而世界性的进步就是发展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民族或国家，并学会彼此之间和谐相处，但每个民族都尊重自己的传统。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及各自对幸福的看法都一律平等、不分孰优孰劣。赫尔德不认为人性是普遍的，每个种族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内在的心理特征。但种族主义的有害的本质却扯不到赫尔德，因

为他个人从来没有强调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优越。他关心的是每个民族应为自己的生活、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不屈从于来自巴黎的国际文化和命运而斗争。

伊塞亚·伯林非常赞成赫尔德的观点：把历史看做是"为通往光明而作的普遍性的斗争过程"的历史观是错误的。伯林在他的《人性扭曲的本质》一书中概括了赫尔德的思想：

> 如果一个国家能不受制于对历史毫无感觉却自封为名流和公断人的教条的看法，不受其约束而沿着本民族的道路进行自由地创造和自由地发展，那么它就实现了它的最高价值；如果我们不向权威、组织和极权妥协而牺牲本民族的真实性和多样性——而这些组织和权威往往倾向一切统一，从而毁掉我们最为珍视的本民族的语言、制度、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各民族所特有的东西），那么想在普遍接受的理性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和理想社会就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召唤民族自决的号角与目前在欧盟，特别是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上的政治、经济辩论有着明显的关系。从欧元的怀疑论者，如M·波蒂诺和英国的雷德伍德那里，我们可以听到赫尔德或伯林声音的回响。因为他们认为欧洲的进一步融合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主权、否定民族掌握自己命运、挂本国国旗的能力。而德国总理科尔却把欧洲的进一步一体化提高到"21世纪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高度来认识。科尔认为，如果没有不断的融合就会导致倒退和民族主义。目前的这种辩论

反映了18世纪巴黎的启蒙思想家(强烈相信理性的行动计划和条约可以促进进步并使各国和谐相处,消除战争)与自赫尔德开始的德国浪漫主义(认为最重要的是民族的自我表现和自发发展)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奇怪的是,二战后的欧洲,德国的领导人坚决地站在巴黎的启蒙思想家的阵营里,而且法国和德国的精英们都想这样。民族主义的火炬却已经传到了英国保守党和欧洲其他右翼小派别手里。当然,争论双方的热情和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欧洲一体化的动力,部分是来自欧洲大陆想建立和保护欧洲的模式,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文化和几乎遍及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正如福山指出,美国模式将快速导致世界文化、政治的同一性,建立起"地球村"。许多欧洲人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盛行,将最终摧毁民族的自发性和多样性,这比自愿建立起来的欧洲联盟更为有害。他们认为,不是欧洲各国主权的集合而是贸易的全球化导致欧洲各个国家的文化被击溃,民族语言日渐被英语所取代,而且国家的生活、工作习惯也日渐被美国的标准所同化。

逆流:浪漫主义与绝望

西方众多思想中对理性进步可获得更幸福生活的观念起颠覆作用的主要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包括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其共同特点是,认为人类生活中值得珍视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理性的产物。浪漫主义的观点是对日渐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理性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动——反对实验科学的理性,反对启蒙运动所认为的人的理性在指导人类活动和使人

日臻完美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来，它又反对工业化社会以及现代经济中日渐严重的物质欲求的鄙俗和无情。理查德·塔那斯在其《西方人的激情》一书中说道，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存在着理性与信仰的分歧，在17世纪则是世俗的科学与基督教的分歧，而在18、19世纪却是更一般的科学的理性与浪漫主义的世界观之间的分歧。

> 因为这两者都深刻而且同时表达了西方人的态度，但两者又是不相容的，是西方人复杂观点的分叉点，现代人的心灵受浪漫主义的情感影响极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其为特征，但真理又得靠科学来发现，因此对现代人来说理智与心灵是难以割裂开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人理解人类渴望与人类幸福时也存在同样的分歧。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怀疑科学分析的完全理性世界和物质欲求能否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至少不断地从浪漫主义的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那里认识到，情感、爱和自然具有超现实的价值。

建立浪漫主义世界观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卢梭。他对浪漫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坚决站在法国启蒙运动观点的对立面，对理性可以改善人类、促进文明的进步的信仰表示怀疑和反对。他认为人类由于文明而变得越来越堕落和不幸福，而野人才是高尚的，他说，原始社会才能给人带来幸福、自由和尊严。随着进入农业社会和私人拥有土地，不平等就出现了。文明使人

们多了一些虚饰和做作，丧失了以往淳朴的民风，用卢梭的话说：

> 随着艺术和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我们却日益地堕落，这难道不是我们时代的不幸吗？没有绅士，源于我们虚荣心和好奇心的邪恶与这个世界一样古老。

高尚的野人以及原始社会以来人类道德不断退化的观点是在文化上对乐观的人类进步观进行反拨——是单纯与文明世故这两种理想的对立。无论是18世纪狄德罗的作品，还是19世纪高庚的绘画，对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居民的单纯的幸福都有着强烈的文化上的共鸣——那里的社会习俗好像不是以人为的惯例为基础，而是顺着人的本能。

其次，卢梭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是最早倡导极权主义关于个人与国家的理想关系的观念的人。他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为现代人设计了一个蓝图。它开篇第一句就给人深刻印象："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到处受到限制和束缚。"他那富有影响但又危险的解决办法是让公民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它包括"使每个合伙人及其所有的权利移交给整个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把他自己和他所有的权利置于普遍意志的绝对指导之下"。这个普遍意志是指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共同利益，因此普遍意志的实现可以使集体的满足最大化。在卢梭的作品中，这种普遍意志的存在并非乌托邦式的沉思冥想。因为他的社会契约规定，如果个人拒绝遵守普遍意志，有时可以用死刑来惩罚。人应

该“通过强制手段以获得自由”，这与自由主义者的“个人自由”观大不相同。这种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定位对以后的200多年的欧洲意识形态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第三，他第一个提出，人的自然直觉和感觉是道德最好的源泉。他说，人性的内在声音、良心或心灵比头脑更值得信赖，比理性的自私动机更能够服务于共同利益。行为规则是天生在心灵中写就的。他说，只要我们听从心灵的声音，而不为文明和理性所转移，我们就会更幸福，道德也会更高尚。在他的《爱弥儿》中，他设计出一个新的儿童教育计划——它让儿童在大自然中尽情发挥个人的潜能，并使他们不受文明和哲学家的影响和污染。

大多数注重经验和实证传统的哲学家对卢梭的这些观点表示怀疑。比如伯特兰·罗素反对人的自然情感本身是真正的道德的源泉这种说法，他提出两条反对意见：

> 首先，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这种信念是真的；其次，这种观点只适用于个人，因为人不同心也不同。一些野蛮人其内心的“自然之光”告诉他们，吃人就是他们的职责。甚至伏尔泰所说的野蛮人，虽然他们是由理性的声音引导着，但也认为他们应该吃狡猾阴险的人，所以也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即使大多数哲学家从不相信自然的宗教，自然的宗教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和艺术的潜流。

浪漫主义运动的更加温和的表露，像华兹华斯的诗歌，表现了卢梭的一些主题。对英国诗人，特别是19世纪的许多伟

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音乐家、小说家来说，不是不存在人类进步，而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经济和技术的人类进步的世界观，被认为是狭隘并被摒弃的，而人性则得到张扬。他们认为自然不是可以驯服和利用，也不仅是美的东西，而是可以表达精神、陶冶心灵的。在他们看来，爱与死、梦与想象的神奇是生活的主要方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浪漫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深刻的美感和品位的转变。新古典建筑那种完善和谐的理性设计，让位于哥特式建筑的复兴。在诗歌和绘画中，自然景色也从过去的有秩序的、宁静的田园风光变成高山、危岩、湍流、洞穴和原始森林，浪漫主义幻想的本质或许在柯尔律治的诗歌《忽必烈汗》中得到了表达：

那倾斜断裂的深壑是多么浪漫啊！
两边是翠绿雪松覆盖的小山。
野人居住的地方，神圣而又迷人。
那景象就像弯弯的月亮下面，
有一个妇女在为她的情人而恸哭。

虽然这种很有活力的浪漫主义，表达了单纯的美学理想以及情感和自然的重要性，代表了一种与我们这个技术和物质主义时代理性的人类进步观相抗衡的重要的文化潮流，但它仍无力颠覆理性的观念。而且浪漫主义也有其丑陋的一面。比如在卢梭的作品中，不仅种下了极权主义国家的观念，而且浪漫主义还极力主张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是位于理性的应用或普通人的幸福之上，具有超验的价值。这种思想在拜伦的诗歌中得到了最令人难忘的表达，他在《拉腊》中描述了

一个遗世独立的英雄非常自豪地蔑视这个浅薄的社会：

在他内心他蔑视一切：
好像可能发生的最糟的事情都已发生。
他像一个陌生人似的站在这浑浊的世界……
对自私的平常人来说他太高大了，
他可以为了别人好而抛开自己的自私，
但不是因为同情，也不是他应该，
而是由于他思想的奇怪和任性。
他内心充满着高傲：
只有少数人甚至没人可以像他那样做。

在拜伦以及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者眼里，拿破仑是最伟大的英雄。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里描述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拜伦式的英雄——他具有超人的精力，是个被冤屈和经受着苦难的天才，与芸芸众生绝不是一路的。

他登上高山之巅发现，
雄伟的山峰被云层和雪所掩盖。
他征服了人类成为超人，
应该不去管众人的厌恨。
尽管有着太阳般的荣耀，
举目望去是大地和海洋，
但他的四周却是冰冷的岩石，
激烈的暴风雪吹打着他赤裸的头颅，
这就是他爬上顶峰的奖赏。

拜伦的诗在欧洲大陆很有影响，能激励人们，德国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尼采的思想与瓦格纳歌剧（特别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音乐和主题有许多对应的地方。尼采很崇拜瓦格纳，两人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后来吵翻了。对尼采来说，现代的人类进步日渐衰微和堕落，他尖刻地批评大多数的政治和道德。他厌恶因民主而造成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并诱惑伟大和高贵的人们的道德水准变得与普通大众不相上下。在尼采看来，所有好的和值得尊敬的品格只能在优秀的精英阶层找到。他攻击基督教，鼓励和促进了那些竞争失败者，那些无法靠自己双脚站立和生存的人们。他认为，世上并没有绝对的道德，道德规则不是依据一些客观的理性来制定，道德应该有多样性，有不同的价值观。他认为，对上帝以及客观的宗教道德丧失信仰——“上帝死了”——可以促使超人的出现。超人是尼采的拜伦式的英雄，即有着不可阻挡的权力意志，并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的英雄。尼采把生活看做是艺术作品，而领袖就是最杰出的艺术家。

尽管尼采本人变疯了，但是他的作品富有魅力，不仅对文学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很不幸的是其思想在政界也得到了共鸣。墨索里尼喜欢读尼采的作品，尼采是纳粹最喜欢的哲学家。二战的恐怖、希特勒的恐怖，使我们看清了不可阻挡的权力意志和超人作为杰出艺术家所蕴含的恐怖。但是，这些也让我们认识到：人们渴求得到承认并喜欢自作主张。如果我们否认这种动力的重要性，我们就可能给尼采式的恶魔创造条件。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后胜利，但他并没有把话

说过头——他提出疑问：人们是否会永远满足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平淡、没劲的争斗是否足以迎合和满足人们对荣耀的渴望？他们是否会觉得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勇猛而感到遗憾呢？在他的文章《论通史编纂的可能性》中，他得出以下让人烦恼的结论：

> ……人们不会满足于成为如此卑鄙的动物，整日为吃穿和卑劣的自我利益而心事重重。人类毕竟是有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他们必然不会满足于一个丧失理想和争斗的世界，如果他们不能抗争不公正和压迫——因为世界已经基本上充满了成功的民主——那么他们就会起而抗争公正、和平和繁荣。

浪漫主义最恶劣的结果就是它能够把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进步扭向倒退。

在20世纪，对人类进步信念的威胁不仅表现在尼采的幻想，也表现在由于战争的恐怖所带来的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日益绝望。人们对人类的兽性感到绝望：无法改变。同时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异化现象日渐严重，另外随着旧的宗教和社会道德的瓦解，人们在情感和精神上越来越缺少安全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某些圈子内存在的普遍的悲观情绪可以从W·B·叶芝的诗歌《耶稣再临》中透露出来：

> 一切都支离破碎，支柱无法确立；
> 世界混乱，一团糟，
> 到处都散发出血腥。

人们已不再单纯，
精英们丧失信仰，而那些恶人
却充满着强烈的激情。

在20世纪的哲学当中，存在主义所谓生活是“迈向死亡的激情和自由”，以及虚无主义对一切道德规范的蔑视和拒绝，是人们对人类命运丧失信心的表现。人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其行为是盲目的。同时，许多艺术作品都没有主角，也不和谐，支离破碎，缺少一致性。如果作品有主角，也是倾向于表现人类的苦难。像蒙克的《尖叫》(1895年)，或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只有两种情感：害怕和厌恶。在文学方面，加缪很有影响的小说《局外人》(1946年)，突出表现了存在的荒谬、事实的无情以及人类所处的孤独状态。而贝克特作品所表现的精神的荒原、极度的孤独好像是在说所有人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价值的。贝克特作品《马洛那之死》的内心独白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很快就要死了，还要什么东西呢？”在其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无名的人》则是这样结尾的：

……我在哪，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在静寂中你不知道，你必须走下去，我不能走下去，我要走下去。

第五章　科学与技术时代的进步

关于人类进步的信念在1914年以前的100年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虽然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噩梦不断，但这种信念在1945年以后的那一代又重新上升了。人们之所以广泛地对人类进步充满信心，是因为有两大支柱在牢固地支撑着：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另一方面是物质进步与经济增长。这两种进步的形式看起来具有渐进性、累积性的特征，并且二者一起对全人类幸福和社会福利事业中的进步作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保证。本章以一个简短的概览开始，阐释在过去的200年中科技进步的一些重要特征。也正是这些科技进步使我们对将来产生了一个广泛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然后本章分析了某种疑虑和担心在本世纪缓慢地重新出现，即对人类完全理解和控制自然世界的能力的疑虑和对社会能否明智地引导由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巨大力量的担心。

进化与进步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它长期以来变得越来越习惯于期待在正常情况下，医学与其他问题将会越来越受到科学的解决办法的影响。我们越来越期待着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会继续把我们推向未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容易、长久、丰富，使我们对宇宙有更多的认识。人们很容易忘记早期的科技进步对当代的关于人类困境的看法所产生的巨大的心理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天文学和牛顿的物理学对17、18世纪的集体意识所产生的非凡的影响。但是对于这种把地球贬到如此不重要的地位所产生的震惊，也由于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而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进化论，在几十年中已经逐渐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并且由于查理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和后来的《人类的后代》(1871年)中的精彩的阐述，而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意识。达尔文强调生存竞争，并认为新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而逐渐出现。不利的环境确保了一个具有天生差异的种群当中，最适合的个体最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它们的优良的差异性传递给后代。用这种方式，尤其当环境本身在变化的时候，对于最优秀的随机差异的自然选择能够逐渐地导致一批新物种的进化。在20世纪早期，遗传学——这是对G·门德尔早期著作的一种回响，解释了随机差异的存在是自发的基因变异的结果，并为基因特性的遗传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甚至在遗传学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机制来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解释之前，达尔文尽力传播的进化论思想就对当

代有关人类困境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理学的发现已经表明，地球的存在是远比《圣经》上所说的早得多，而且无法测量。现在就像早些时候地球被降级为广袤宇宙中的一个行星一样，人类现在也处在被降级的危险之中——即被视为长期进化过程的结果——古猿的一种最新近的形式。然而，正如彼特·波勒在他的《进化论思想史》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达尔文的著作发表之后，理论的影响由于进化的不同概念的存在，而使理论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复杂化了。许多进化论者不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随机特性。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仍然相信按照"设计"的方式进行的进化。他们认为仁慈的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人类是上帝的杰作，达到了顶峰，是有远见的"设计"这种观点认为，进化是一种由上帝为了实现其最终目的而"设计"的自然规律。当达尔文理论的细节被接受，这些观点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通过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是一种残酷的机制，因为它使得无限的痛苦成为必要，因此对于仁慈的上帝竟会将此作为其工具，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

许多其他的进化论者，像公开宣称自己是物质主义者的斯宾塞，坚信进化虽然是一个残酷的过程，但在本质上是一种进步。用斯宾塞的话来说，进化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且事情在随着生命进化成为一种更高的组织形式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斯宾塞的观点很重要，因为他认为这种进化过程具有普遍意义，对生物物种是这样，对人类社会更是这样。通过人类对其人文环境的逐步适应的机制，进化会逐步推动人类的生活向着组织形式和复杂程度都更高的阶段发展。因此，斯宾塞认为自然应该不受阻碍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以此为

"放任自由"的社会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这种政策能够保证人类进步。在这种观点中，进化的成功就变成了正确行为的惟一标准。而适应并遵循社会进化的要求的能力，就变成了进步的前提。斯宾塞认为，为造就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消除阻碍个人创造的一切障碍。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右翼"放任自由"观念的集合，它认为如果最适合的人们被允许不受约束地发展，进步就有保证了。

因此进化论在19世纪尽力去培养和补充有关进步的主要信念。然而这是一种对达尔文理论的不接受或是一个基本的误解，就像彼特·波勒指出的那样：

> 然而，等级制度和进步的概念是那些最受达尔文理论细节威胁的观念。分支进化使得人们很难解释一种形式怎么会比另一种形式更高等或低等，特别是一些明显的低等形式能够生存很长时期。自然选择是朝着适应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并且在其对新的发展途径的探究中是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如果这些观点在表面上被接受，大部分的19世纪晚期进化论哲学观都是毫无价值的。

与斯宾塞和其他人的观点相反，达尔文主义认为，在自然界中并没有必要的方向或目的。后来的进化适应无论从客观意义上还是生存的能力上都未必比他们的先辈更优越、更高级。一些成功的进化适应性也许十分简单且为人注意。变化并不意味着更优。

伟大的生物学家赫胥黎强烈反对把神的"设计"当作进化

证据的企图，他也反对斯宾塞利用进化论作为“放任自由”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如果进化性的变化在自然界中不一定是进步的，那么为什么社会中的变化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进步性呢？在赫胥黎看来，将人类的道德观归因于某种进化成功是非常错误的。自然的生存竞争，它包含了巨大的痛苦并且导致了成功的物种的生存，但它未必是崇高的和具有进步性的。人性包含了保护和帮助弱者，而不是消除他们，包含了培养爱和仁慈，并鼓励成功的动机。在赫胥黎进行攻击以后的那几年中，斯宾塞的理论陷入了声名狼藉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日益丧失信誉的有关特性遗传理论的依赖；斯宾塞的哲学开始被视为一种对长期性的真正的进化适应性的理论框架的误解，这种真实的进化适应性的框架，是通过对许多代随机变化的、基因组成的探究得出的。

进化并不为人类进步提供必然的规律。它顶多代表一种对人类社会中的变化的类比。如果正确理解的话，这种类比更有可能强调变化的随机性和无方向性，而不是强调任何具有必然进步性的属性。在许多 20 世纪的思想家中——例如存在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达尔文主义确实帮助强调自然的无意义性、人类存在的无目标性和苦难的普遍性。

如果进化思想本身与有关进步的信念有某种复杂的关系，达尔文主义是最先进的理论科学之一。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大多数在化学、物理、天文学、生物学方面的理论进步一起，它有助于培养一种对知识的直线型的、累积性的、进步的强烈信念。当人类的理智逐渐战胜了生命和宇宙的神秘莫测，人类对其用理智来解释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的自信，在启蒙思想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传播得非常广泛，使社会作

为一个整体变得非常重要，甚至使得过去的造物主显得有些被蔑视，它为那种认为不可预知的上帝控制着地球上的日常事物和人类生命的迷信观念留下越来越少的空间，甚至大众也逐步接受科学的观点。当然，许多人继续用宗教的观点来对宇宙和自然的活动方式作出新的、合理性的解释，揭示了神的理智的光荣和上帝的理性所展示的创造的完美。但这样一种对仁慈的神的信念——通过伟大的可理解的规律，并运用那些知识去改善自身命运的能力来显示出他的博爱——并不代表一种对地球上的进步的信念的障碍；这种对进步的信念曾经是由异端宗教、早期的圣奥古斯丁基督教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提供的。而且，当科学技术的胜利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人类能够发现对一切事物的物质性的解释，能够控制自然并在地球上创造一个物质财富的天堂，基督教便会逐渐失去其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观念对西方思想的控制。它逐步变成一种个人道德和精神的宗教，这种宗教不得不适应世俗文化，这种世俗文化的目标、解释和标准都已日益物质化。渐渐地事情变得毫无疑问：道德和精神的进步，还有来世的安宁，即使在概念上也已不再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重要关心所在。对幸福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人在世上对改善自身的财产与社会福利的追求和世俗认知的进步，变成了关键的公民义务。基督教只不过是为地球上人们对物质天堂的急促的追求提供一个道德和精神的氛围。这种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与那种对知识的无止境的、进步的信念，及其期望通过技术和经济增长来推动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的信念结合起来，使世俗化的人类进步占了上风。

技术的胜利

知识渊博的精英们的世界观与普通工作人员相比，更容易受理论科学的巨大进步的影响。然而，应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20世纪早期就已经触动了西方世界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引起了对将来的更普遍意义上的乐观主义和对人类理智力量的信心。如果说达尔文主义通过把人类描述成仅仅是进化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而降低了人类的地位，那么也可以说19世纪与20世纪的技术发明的潮流，以及日益增强的帮助人类控制自然世界的科学力量，却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个世纪，大多数人们开始意识到，《创世记》中的故事不是一个对"创造"的文学性的描述，根据《圣经》上的观点，如《创世记》第1章中所说，人类被允许主宰和控制自然界的万物，由于新的技术，而变得比《圣经》上所描述的更加真实：

> 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尽量卓有成效地使地球增值，不断地补充它、征服它；主宰海中的鱼、空中的飞禽，还有地球上活着的一切东西。

从1800年起，技术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和令人鼓舞的。技术进步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这里仅需作最简短的概述。19世纪，蒸汽和煤的力量被利用来开设工厂，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花。汽轮航行和铁路大大地缩短了地球上的距离，打开了新的视野，并促成了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汽灯开始征服了

夜的黑暗，而更好的卫生条件和清洁的管道用水战胜了霍乱和痢疾的祸害。自行车给个人提供了一个比骑马和徒步旅行更便宜且实用的工具。在过去的100年中，汽车已经提供了一个先前做梦都无法获得的个人活动的自由，航空旅行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电力已经给发达国家的几乎每个家庭都带来了光明，并且已进入了一个清洁的工业和交通的时代。冷冻使人类饮食空间得到巨大扩展。打字机、打印机以及文字处理器等已改变了办公室的生活，而电讯使我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交谈，计算机给予了人们以前难以想象的计算和信息存储能力。电影、广播和电视已经建立起全球性的娱乐业和文化，并将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音乐、戏剧和世界新闻带入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家庭。在过去的50年中，洗衣机、电熨斗、真空吸尘器和微波炉已经改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尼龙和塑料带来了更廉价的衣物，并且大大增加了拥有更便宜和更耐用的消费品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医学为人类福利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疫苗消除了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和天花等等疾病，这些疾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麻醉剂和抗菌素使外科手术的疼痛减轻且更加安全；抗生素给许多从前十分致命的疾病，比如肺炎和血毒症提供了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已从过去的53岁增加到66岁——确实是一个进步。

自从18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改变生活的发展，对大多数人的福利产生巨大的积极变化，几乎在每一代都有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处不在，它表面上宽厚仁慈的性质和对仍然十分年轻的技术的迅速改善、提高，很快地确立了一个世界，在这里“新”被看做是“更好”的同义词。

技术和医学进步的加快，似乎日益表明每个人的健康、福利、物质财富的无限进步是可能的。

由于技术带来的许多变化，当然在过渡时期造成了某些人的艰难，并且产生了失败者与成功者。尤其给世界带来创伤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农业革命。由于圈地、轮作的引进和新的作物的出现（例如甜菜和土豆），在18世纪产量开始增长缓慢，但是正是技术的影响，真正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性质。铁路和汽轮航行允许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建立大的农场，使得它们能与欧洲的农民进行竞争。几乎同时，新的钢犁和机械收割机、脱粒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马拉的收割机能够做许多用传统镰刀收割的人的工作。在20世纪早期至中期，拖拉机和后来的联合收割机，还有自动挤奶机和对家禽及猪的工业化的养殖技术，进一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二战后的几年中，化肥和杀虫剂的大量运用，对单一种植农业的转向和高产种子的引进，促成了亩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大幅增加。由于这些变化，人被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1850年有60%的美国劳动人口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而在1990年，这个数字还不到3%。

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不变的农村生活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并给许多人带来痛苦和不幸。然而，这并没有严重损害进步的广泛的信念。部分是因为食物更容易获得；丰富的、廉价的食物使世界许多地方消除了饥饿，允许人口大量地、持续地增长；通过削减必需品的价格，还可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因此推动了经济增长。农业就业大幅减少并没有粉碎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因为大多数由于时代变化而被替代了的人们也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机会。大量增加的工业企业需要更多的劳动

力，铁路建设需要工人，工程工作需要额外的工匠。美国的新边疆也允许由于技术变化而被替代的人们去开创新生活。确实，战胜了贫瘠的荒野和野蛮的印第安人部落的西部和新的跨大陆铁路在美国象征着进步性文明的前进，西部边疆象征着致富的机会。根据美国人的梦想，这对所有的人都是可能的。凭着努力与意志，一个新的未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起来。

疑虑和不确定的重现

从20世纪开始，人类似乎被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真正赋予了对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的肯定性的变化进行控制的能力，并且通过自身的理智和机灵来保持这种进步。人类也许不久就能够控制自身的命运，并达到一个物质繁荣、健康和幸福的黄金时代。然而1914年以后，对科技进步力量的这种自信的严重挑战重新出现。正如理查德·塔那斯在《西方人的激情》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挑战采取两种形式——对理论科学研究本身以及科技在道德和实用方面模糊性的疑虑。也就是说，存在着对知识本身的性质和进步范围的疑虑，更重要的是，对人类能否利用科学赋予的巨大力量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存在着日益增加的忧虑。

在新物理学上，第一次出现了对18和19世纪科学确定性的内在挑战；同时，牛顿物理学的简单性，受到来自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理论，特别是海森伯格不确定性原理(1927年)的挑战。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当物体运动速度越来越快，尤其当其速度接近光速时，物体变

得更短，更重。这些现象使爱因斯坦得出以下结论，即质量与能量是同一事物中相异的两部分。他的著名方程式 $E = mc^2$ 就反映了以上结论。此种质量与能量相等的反直观本质与爱因斯坦关于四维时空连续统一体相吻合。在他的理论中，四维时空连续统一体在质量的重力影响下，被表示为弯曲的，时空再也不是绝对独立的对等物。而且，爱因斯坦证明了：当两个观测者相对地运动时，他们关于任何特殊时刻会发生何种情况，将作出不同的判断。在其中一个观测者看来，某事物正在发生，在另一个观测者看来却是事物的将来状态。从某种意义上，现代物理学消除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另一种基本差异。在量子力学领域，海森伯格在其著名的不确定原理中指出：当人们同时测量粒子的位置与运动量时，其精确性会受到一种基本的限制。另外，同时测量能量与时间时，也会遇到与此类似的限制。在次原子层面，为获得所需的值，对这些因素精确的测量也往往产生不确定性；而海森伯格认为，这种不能避免的不确定性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对一个系统的测量活动，实际上对该系统进行了干扰。在这个层面上，惟一的确定性是可能性。在海森伯格看来，原子和粒子组成"一个由潜在力或可能性构成的世界，而不是事物或事实构成的世界"。

物理学和数学上这些了不起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人类理性进一步的巨大成功，也描绘了知识进步的又一飞跃，正是这些知识开发了可怕的核物理领域。然而，借助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发现，牛顿学派关于宇宙的许多极易理解的事物和简单明了性开始失败了。在总结弗洛伊德的理论，即人类具有兽类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冲动以及新物理学的影响和

冲击时,塔那斯这样写道:

> 某种早已在人类中被公认的不可削弱的非理性,现在出现在物理学世界的结构中。来源于新物理学的概念,不仅让普通人难以理解,也常常在人类直觉中呈现看似不可克服的障碍,比如说,一个弯曲的空间,有限却没有限制;一个四维时空连续统一体;同一次原子实体所具有的相互排斥的性质……

从19世纪20年代起,大多数科学的理论前沿逐渐变得不可理解,不仅普通人而且就连在不同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也难以理解。知识变得越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然,知识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但新知识渐渐描绘出一幅几乎是由难测的复杂性和反直观性怪异的世界构成的图画。知识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扩展,以致单个人不可能理解关键科学理论中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部分。过去可能要多个数学家耗费许多年才能完成的题目,电脑可以按秒来计算。科学发现的日新月异以及科学发现的复杂性是几十年前的人类所无法想象的。当科学家们越来越专业性,而且不再用人们能听懂的语言说话时,人们对科学家们的信任就渐渐变成了怀疑,而且,对科学界自身而言,要控制或粗略地把握他们知识所希望导引的方向,也已经越来越难了。

科学理论,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尊奉并建立却又被废除的理论(如牛顿力学理论),要么不完善,要么存在着简单得发傻的错误。它们一直削弱科学发现的确定性程度。科学知识本身也逐渐被视为易变范例的集合,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强调科

学知识也有谦逊的需要，在不否认科学发现影响渐增的前提下，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研究与观察不外是满载理论的东西。在此意义上，科学家们的工作范围，就只限于范例（或主要理论学说），他们对这些理论情有独钟，他们在做实验或观察分析数据时也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只有当情况朝着反范例的方向发展的事实增多而且不同寻常时，范例危机突然出现，这样科学思想领域即将革命的想法才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变革将使从前更多没有很好解释的东西得到解释，这也就意味着进步。但是，以上革命也可能引起对一些结论的怀疑，而这些结论长期以来都被坚持认为已经解决了。知识进步已远远不是事实的一个简单附加物。这样的进步是间歇不定的，而不是直线性的。

混乱与复杂的新科学理论，向可认识的、前进的科学知识提出了内在的最新一轮的挑战。爱因斯坦早已对那种有规律的宇宙设想提出怀疑，而量子力学也早已断言，在次原子层上存在着不可削弱的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那种混乱与复杂性的新理论，强调我们日常环境的不可预见性。混乱系统是指：许多结果，起初无法预见，因为条件的微小变化将引起根本不同的结果。天气的“蝴蝶效应”，就是混乱学说的典型例子，即蝴蝶翅膀的拍动，就可能产生飓风。爱德华·洛伦兹在制作天气模型时注意到，极其简单的数学方程能导致巨大与世界天气相似的复杂且又无法预测的模型。其中最主要的是：输入一个极微小的差异，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在事后可以根据简单原理得到解释，可是在事前却不可预测。天气、云层、瀑布、液体动力，阻塞道路上的交通状况以及正在滴水的水龙头，都表现出混乱的特性。最近，正如米切尔·瓦

尔德洛普在他的著作《复杂性》中所解释的一样，大批圣塔菲学院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索在更大范围的定律之外加深对力学性质的了解。他们探索物理学、生物学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经济学中一些复杂行为的相似性，在以上众多科学领域中，似乎存在一个处于"混乱边缘"的"自发的调节组织"。特别是，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良性反应，或经济系统中增加的收益以及非线性关系的影响。在许多领域，人们认识到：旧的平衡状态的确定性和可预见的线性反应，不是现实力学的好模式，无论在生态系统抑或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性就是瓦尔德洛普所说的"始终变化的、连结的、非线性的、不断改变"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我们还不了解全部系统如何运作，就试着为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我们启动了一系列事情，很可能反转过来并形成让我们去适应的不同模式"。

我们生活着的世界，它的复杂性不仅限制了我们作出理论预见的程度，也严重限制了我们希望控制预见的程度。这就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带动社会进步的信念提出一个重要的外部的挑战。我们对自然界、药品或经济方面，惯常的对问题的解决方式，现在似乎都产生了新的问题。我们无法预见这些新问题，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技术导致对无辜百姓更加有效的屠杀，尤其是铁路、机枪、潜水艇以及鱼雷等。二战中，纳粹政权背叛了科学事业，同时盟军开发出最早的两枚原子弹，并将它们投向日本。这时，事实越来越清楚：从道德方面来看，在科学技术理性上令人敬畏的进步，就其自身而言，是中性的，其产生恶性有害结果的力量与产生良性结果一样强大。科技变化所带

来的愈加模棱两可的可能性也并不局限在战争舞台，许多曾经获过奖的发展成果也早已贴上一张巨大的、以人类环境为代价的标签。比如，汽车造成严重污染、噪音和拥挤。而且当人们改变环境与改造自身的力量变得不可估量时，人们越是关切能否明智地操纵并运用这些能力。

基因工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科学家们着手描绘构成我们这个自然界的那些成千上万的基因时，那些曾经乃至现在仍折磨着人类的令人恐惧的疾病，可能就不再是由于基因的责任导致。当这些良性结果成为可能，依照遗传学重新巧妙处理就可以制造出我们所希望的孩子——即自己来指导进化。对很多人而言，这种前景在道德上存在矛盾；而且，它还违反了我们某种残余感觉，即认为有必要对人类的权力进行限制。在生物技术领域，诸如此类的进展引起了科学和伦理上一系列的问题。如：制造出具有杀虫效果的转基因植物时、制造出转基因的猪时，这些猪也可以为人们提供非常需要的抗凝血剂。我们是否真的明了：交叉物种边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药物和环境影响？当我们解决旧的问题时，是否已陷入那些新的、更加危险问题所引发的危险中？下面，讲述一个有轻微差别的例子。为了增加牛奶产量，一种遗传学上巧妙重组生长的荷尔蒙被注入到奶牛体内。这种行为使健康和安全问题增加了，而且，就像其他诸如发展问题一样，这一行为也引发深奥的社会、经济和伦理问题。如果奶牛被注射了荷尔蒙后真的多产20%的牛奶，许多小农场主将不可避免地破产，要么就得由公共津贴补助。现在还没有到纳税人花费数百万美元或英镑来购买一种产品的时候。杰瑞米·里夫金在他那本《工作的尽头》书中，引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引发了

许多伦理和道德的困扰。也就是,由于基因工程,如今只需从马达加斯加进口一点点的材料就能在实验室中制出香精。而在马达加斯加,这一产业为7万名自然栽种这些材料的农民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由第一家世界生物工程公司作出的,关于是否要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决定,将即刻对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地球另一端人们的生存。

从事这些计划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总是对一种"信息有误"的偏见表示轻蔑,这种偏见,就是对最新技术知之不多的偏见。他们可能指出某些人害怕新技术的事实,比如: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无线电波。同时,他们还指出良性变化将使大多数人获益,只有少部分人付出代价。他们在许多事件中都能使人信服地论证,新生物工程设备较之传统和普通的技术带来更小的危险。含有杀虫剂的转基因植物很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极小的危害,且较之40多年前在空中大量喷洒的DDT产生的危险小得多。同时,将废除现在仍在使用的许多复杂的化学杀虫剂,这些杀虫剂有更多的健康和生态方面的副作用。

然而,人们对这些巨大的科学力量存在着普遍的不安。这些科学力量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的生物技术、电脑技术或其他领域。这种不安也不全都没有道理,就连许多科学家也感觉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安部分来自那么多发展迅速的领域,它非但没有使人类的自信增加,反而导致巨大的不安全感和迷惘。对那些被迫适应新环境、新观点,远远快于适应他们所属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技能所能适应的普通人而言,就更是如此。正如我们以后将在书中探讨的,一个高速变化的世界,可以限制生态和经济系统快速且平稳地避免消极

后果的能力。此时，许多最新的发展改变了这些复杂系统，以至于由怠慢而引起的危险性可能增加，这些后果是危险的，不可预期的、混乱的结果有可能增加。最后，对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后果能否进行控制也颇具争议。

理论科学发展的方向以及新理论发现的运用在时间和性质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这些新理论的运用将改变人类的命运，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们的世界观。发展和应用新技术经过仔细的、民主的程序，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很少见的。那些改变而且打乱我们生活的变化也很少是国家和人民的初衷或有意的计划。政府的确控制着大型的军事研究项目，政府也确实会确保其在公众基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责任。他们也坚持给新的药品和杀虫剂发放许可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科技研究方向的扩展，是世界上赞助科技开发公司的零星决定的总和。专家个人对其专业领域、名誉很敏感，而公司对能否增进其财产最为关心。科学研究的自由是开明、民主的基石之一，也是研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许多从地下爆发出来的突发的研究，其遵循的方向缺乏民主的控制；而且，技术创新在一些人看来，已经再也不是知识自由与公平的卓越保证，而是产生不安的一个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的怀疑反映了极低的信任水平。不大有人相信：科技上飞速发展会必然导致人类进步，会更有利于与无知、疾病、贫困作斗争。它也反映了在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出现了不断增大的隔阂；而且在某些时候，专家们对理解他们专业领域外的东西也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在科学研究领域，古老的“默顿标准”的逐渐崩溃加深了这种不安。正如汤姆·威尔基在 1996 年 5 月 28 日的《独立》

中的解释：罗伯特·默顿在1947年制定了五个标准，包括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标准，人们广泛赞同这五个标准必须主宰科学社会。它们是：集体性、普遍性、无私性、独创性和怀疑性。然而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开放合作以追求真理为惟一动力、公开受公众审查的标准，正日益受到科学的商业化和私有化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研究由私人药物公司、生物技术公司或工程公司主办。他们对申请新发明的专利，自然比对公开这些发明并对之进行公众审查和辩论更有兴趣；他们当然要致力于商业实用技术的迅速发展，以保证投资的回收。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影响日益等同于对其他改变原动力的影响，这种原动力是指经济发展，即自由市场。在以后的几章中，我们将作更多的思考：自由市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以传递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些因干扰复杂系统而产生的长期影响且难以查明的领域。

在医学领域，"超级细菌"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受重视。所谓超级细菌，即能抵抗所有已知抗菌素的新菌系。滥用抗菌素使药物公司有利可图，然而极大地改变了具抗药性细菌的生存环境，加快了它们的发展速度。这种情况为开拓性研究和药物发展提供了良机。领先于自然力使药剂公司有利可图，但许多生物学家担心这种优势最终将消失。同时从社会角度看，发展更新、更贵、更有效的抗菌素和其他药物，以使在一段时间内抵制持续生长的抗药性细菌，这一想法意味着保健费用的额外负担。和其他例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并不代表着进步，因为需额外花费才能保证保健方面的特权。医药学正如农业上的控制害虫技术，也要灵活不断地找寻出路，以对付早期发展遗留下来的、难以预计的副作用。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论证道：科学日益成为历史的调节机制，科学的发展加快了不同社会的同质化；就像全球自由市场一样，科学通过建立“经济生产的统一体”，打破国别并为全人类创立了国际性定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对未来几个世纪的世界稳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不在统一控制下发展的新定势有利于大部分人，而不只是西方小部分的上层人士。对这一点，还有许多不信任和不乐观的看法，不只对节约劳力的技术发明而言。

杰里米·里夫金在《工作的尽头》中强调了技术进步对就业前景的影响。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工作场所的技术进步的最新浪潮，特别是电脑革命将前所未有地威胁到就业。过去，当各类新制造业有能力而且需要吸收几百万额外工人时，出现了农业机械化；二战后 40 年，正当欣欣向荣的服务及零售业乐于雇用失业劳动力时，各工厂逐步实现了自动化。既然电脑革命实际上同时打击了所有的就业形式，所以在当今看不出谁将吸收剩余劳动力。各工厂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以及以电脑辅助设计和电脑为基础的库存管理。同时，在服务部门中，柜员机取代了银行职员，口声邮件和文字处理器取代了话务员和秘书；而零售业运用销售点银行业务和存货管理，绕过了财会部门和批发商。电脑具有无数种文书和管理功能，还能免除一层层的人力劳动，因为简单的软件程序能够解决各种复杂的工序，而这只有少数人能操作。除去起初执行的困难，在大多数公司，电脑帮助人类进入一个“简单生产”、“公司重新设计”和“反阶层”的时代，这极大减少了无工作经验人士的就业机会，也同样减少了中层管理人员的就业机会，在一些情况下，形势更为严峻。

近两个世纪以来，机器已经代替了体力劳动，并很快会取代脑力劳动。需要复杂技能的工作可以由电脑程序来完成，从而消除了对技术工匠的需要。计算机能存储、处理和传送数据，其效率比一二十年前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使用的管理和存档系统要高得多。现在计算机已能讲、能听、能读，也能理解；也许不久它甚至能产生意识。当它能从事一切工作，不仅局限于面带微笑供应汉堡包或擦窗户时，社会要怎样才能在工作领域满足人们的抱负和渴望？

当然，乐观者会指出，90 年代后期在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时候，失业率曾降到历史最低点，并且由于重要的新就业机会产生于发展极快的新行业，因而并非所有的新工作都是非全日性的、低技术的、低报酬或危险性的工作。但里夫金认为，只有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才有机会获得新的科技领域的工作。他说，在美国，从 80 年代早期以来，一些发展很快而又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譬如电信业，已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与之相比，生物技术业到目前为止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得多。他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未来几十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将发现他们不可能找到稳定高薪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当购买力和信心都衰退时将导致经济萧条，甚至会造成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紧张。里夫金把他的意见清晰地描绘成一个广为流传的预言：新超级富豪们居住的地方用墙围护着，受保镖和摄影机保护，而城市内部却如同一个盘旋的楼梯，陷人犯罪和绝望（在美国，每四个年轻黑人中就有一个已坐牢或缓刑）。要防止出现这种社会混乱，他建议最好将新技术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并通过延长个人休息时间和缩短工作时间，改变欧洲失业率不断上

升的趋势和美国再就业不充分、许多人报酬低的现状。他还倡议使用专为利用剩余劳动力而设计的程序，帮助改造社会，以免为时过晚。

稍后，当我们分析经济增长和自由市场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社会和环境的稳定和进步时，我们还会回到这些紧迫的问题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个伦理道德问题，它极为关键——因为如果要产生对进步的绝对信仰和对未来的普遍乐观，就要改变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利的状况。在判断变化是否代表进步或代表破坏性的混乱时，变化的速度也是一个基本因素。譬如，据传统理论，如果慢速引进，让人们在经济、政治和情感上都适应，那么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就能真正地降低物价，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并确保产量提高、就业的增加和休息时间的延长。但如果引进速度过快，这些新技术会导致不可估量的经济萧条，对信心和发展都是一个负面的打击。

没有变化，就不可能有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快的变化就保证最快的进步。如果技术和经济变化的步子继续不断地加快，令人们无暇考虑和适应，人们可能又会因为不安全感和对自身困境难以控制而不知所措。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命运的不安全感归于令人敬畏而又难以解释的奥林匹斯山众神的神力，而我们的不安全感部分来自我们自己构想的——即科技之神及自由市场之神。它们的力量令人敬畏，象征性的祭品不足以平息。同时，古老的自然力用不可预测的反应对人类的干涉进行反击，它的力量令人不安，令人吃惊。科学之神和自由市场之神正和大自然难以预言的力量进行大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场战争的结果。

第六章 经济学时代和幸福的最大化

用现代的观点看来，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仍然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因素，代表着人类理性的向前发展和人们认识、预测、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的提高，显然，不可阻挡的科学进步提供了人类进步的机制，而且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它比深奥难懂的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更为直观，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兴趣，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被看做是科学思想胜利的产物。

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的最有贡献的因素，反过来，经济的压力和激励又促进、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增长都被看做是人类物质福利事业巨大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类进步的两个引擎。而且，如果经济增长提供了人类进步的另一种机制，

那么用货币价值衡量的经济增长好像也就是对人类福利事业进步的衡量，从而成为人类进步的客观标准。

本章探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理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派有关人类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概念上的联系方面的论述。正确的和误导的我们都加以讨论。本书后面的章节将集中讨论强有力的自由市场机制及其建立起来的关于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一些缺陷，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人们对经济增长可以促进人类进步的信念却在消蚀，以致出现新一轮的信仰危机。

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经济增长直到18世纪才成气候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时在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商业和工业化开始以快速的、持续的姿态发展起来。据估计，公元500年至1500年，经济每年平均增长只有0.1%，在1000年漫长的岁月中，产出大约只增长三倍。而在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年增长率超过1%），这样一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产出和物质财富就得到巨大的增加。这种新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在1870～1990年间，英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了五成（扣除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的因素后的人均GDP）。在当今世界，扣除通胀因素或实际年增长率2%都被认为是可怜的，虽然2%的增长率就可使产值在55年里增长三倍；而这种增长在过去却花了1000年（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

经济学家们都在不断探讨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这种现象。

而最有影响的恐怕要数亚当·斯密。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当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巨著《国富论》。在这以前，亚当·斯密是在格拉斯哥当他的伦理学教授。他因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而名噪一时。在这本早期的书中，斯密非常重视"同情"的作用，而且希望别人支持他的关于建立社会契约来使社会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观点；他也很重视理想的、公正的、旁观者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个人良心的作用，人们可以想象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如果他们完全知道实情的话。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研究不像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与他研究伦理学的研究一样，是在广阔的背景下作出分析的。当时，经济学并没有被当成一门科学，还未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是从更广泛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分析。虽然斯密视野开阔，但是，他还主要是被看做——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在他的论文《时代的局限》中所说的——是自由的"凶恶的个人与公正的社会的矛盾统一体"的倡导者，而且他认为，斯密是主张可以不问道德动机，只要经济的成果在道德上能被人接受就行了。

虽然有很多事实表明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这两部著作所强调的重点是大不相同的。《道德情操论》强调同情、想象、认同和仁慈在形成社会态度和建立紧密结合的社会所起的作用。而《国富论》则强调个人利益或自爱作为社会合作、发展和相互依赖背后的推动力的重要性。

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而使我

们有饭吃，而是因为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使然。我们要谈论的不是他们的博爱、仁慈，而是他们的自爱。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的需要，而要大谈特谈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没人会完全去靠他的国人的仁慈而生活。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和日益繁荣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劳动分工当然又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技术进步带来了新工具和机器，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的专业化。新技术和专业化使生产率和产量得到巨大的提高。但斯密又指出，只有当市场交换进一步发展时，劳动分工才成为可能：

劳动分工有那么多的优点，但要追根究底起来，它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为普遍富裕创造机会，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并不以这种广泛的效用为目标，而是由于人性的倾向而缓慢、逐步形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在斯密的论述中，如果没有市场交换的过程，所有重要的劳动分工都是不可能的——劳动分工本身与其说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不如说是由于人们对交换的内在倾向或喜好。但是斯密在书中作出理性的呼吁——人们应该采取审慎的行动来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尽可能使它免受干预。因为他认为，劳动分工的范围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市场的大小。在他看来，要追求高的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就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

来使交换的可能性最大化。这会鼓励一个国家尽可能地从事它自己具有特定优势的产业生产的专业化，而且从别国进口那些别国有自己没有优势的较廉价的产品并从中获益。诚如所知，这种对自由贸易的呼吁只是他所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的一个方面。

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斯密强调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不论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是对借以提高生产率的机器的投资，都可以持久地推动生产水平的提高。在强调节俭的重要性的同时，斯密指出："储蓄是人的一种天性，是人们改善其处境的一种期望，是人生来就有、死后才会消失的一种欲望。"出于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人都会利用他的资本以期获得最大的、可能的回报，因此也使整个社会的产出最大化。

> 所以当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利用他的资本来支持本国的产业的时候，就会去发展那个产品具有最大价值的产业。每个人都必须尽其所能来使社会的年收入得到增长。一般来说，他也没有想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作了多大贡献。他们支持本国的产业胜于支持外国的产业，以此来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以这种方式来发展那些产品具有最大价值的产业，他也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以及其他的情况下，他是被看不见的手牵着来促进一个目标的实现，尽管这个目标不是他的初衷。他的初衷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对社会来说也算不上一件坏事。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往往同时也

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而且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促进还好得多。我可不知道，那些装着要为公众利益做事的人到底做了多少好事。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仅有两处明确提到看不见的手，上面这一段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一段的表述更能代表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即一个自由的、竞争的市场可以使每个人的个体利益自然地相互影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看不见的手隐喻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竞争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自然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古典经济理论把斯密的这种直觉感受发展成复杂的理论，分析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是如何通过价格的自由升降来达到供求的平衡，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把所有市场参与者表示出来的需要都考虑进去)，从而保证可以充分地利用市场交换带来的潜在利益，使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互惠互利。

很有趣的是，斯密对自由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社会效益的本质的信任，甚至扩展到它可以减少不平等的程度。他认为，许多不平等是由于扭曲性的干预或管理造成的。比如，他说，自由市场可以平衡工作乏味与报酬的诱惑力的关系(即最脏、最危险的工作给予最高的报酬)。而且，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当他提到看不见的手，他显然是在为市场交换所具有的再分配的效果辩护——这种效果我们今天称之为“滴入论”(也称“利益扩散理论”)：

富人只比穷人消费得稍多一点，尽管他们天性

> 自私和贪婪，尽管他们只顾自己的方便，尽管他们雇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的惟一目的是使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和贪得无厌的欲望得到满足，但是他们与穷人共享所有世界进步带来的产品，他们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对生活的必需品几乎作出相同的分配。假如地球在所有的居民中被分成相同的两半，他们也会作出相同的分配。因此他们没有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推动社会进步，提供更多的方式来增加产品的种类。

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要论述的，现代经济理论已经能够用精确的数学计算来证明，斯密所推测的竞争的市场可以使公众利益得到改善，但它不能证实他的关于竞争的市场可以促进财富或收入分配的平等的观点。其实，过去的200年的经济辩论的焦点，大多是集中在市场效益的要求与分配公正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亚当·斯密当然很清楚，自由市场机制在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方面的力量有赖于几个重要的条件——虽然每个市场参与者主要是由个人利益驱动的——在斯密的分析中，首要的条件是存在一个完整的衡量天赋自由的尺度，而且不存在对市场活动的管理方面的限制。他说：

> 每个个体改善他自己的条件的努力是与生俱来的，当它被允许自由地、安全地发挥的时候，它不靠任何帮助也能把社会推向富裕和繁荣。

这些必要的自由包括没有政府干预或管理。在他看来政府干预是“起破坏作用的”，是阻碍而不是促进“社会朝着真正的富庶和伟大的方向前进”。在斯密看来，管理和政府干预不仅扭曲了市场和资金的流动，而且它们所依据的基本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观点或幻想，以为政府具有所需的知识或理智，引导私人企业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

> 政治家想引导私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利用他们的资本是不必要的，不仅一般人不会相信他，就连政府官员或议员也不会相信他。再没有什么比一个愚蠢的而又自以为是的人掌握了权力而又自诩可以适当地操纵它更危险的了。

这种对政府应放松管制的呼吁预兆了现代自由经济对国家计划的批评。诺贝尔奖获得者F·A·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是民主的政府都无法确保一切都从大众的利益出发。这只能通过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参与者在自由市场的大环境中作出的实际选择来表现。这些人又说，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就可以使分散在无数个体的智慧才能得到发挥，从而使“大众利益”得到认可和满足。

在亚当·斯密看来，天赋自由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自由市场经济对社会利益的促进，还需要其他一些重要的条件，而最重要的是“只要不侵犯公正或公平”，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否有效运作要看政府能不能建立起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如财产权、商法等等）。斯密也没否认政府应该扮演许多其他的角色，主要包括

国防以及提供某些公共货物和服务。许多现代的右翼保守人士或许会感到惊讶,他们崇拜的圣人怎么也认为公共工程应该由政府来管。斯密认为,某些公共货物的生产并不是自由市场资本家的义务,因为对那些建造或维护公共工程的个人来说,"收益永远抵偿不了成本",尽管有关的公共工程"可能对整个社会非常有益"。

但是,斯密厌恶各种形式的垄断,因为垄断会破坏完全竞争的许多重要的前提。他认为,只有当完全竞争没有遇到障碍的时候,自由市场才能使经济得到最优配置。但他确信,在一个适当的法律框架内且没有扭曲性的干预,竞争本身就可以控制垄断的倾向——可惜这是他对自由市场的威力过分乐观的又一个表现。其实,许多人都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积极的反馈,即积累性的成功,完全竞争的条件是很不稳定的、没有保证的。技术竞争或市场竞争中的胜者常常能够自如地建立起主导地位,控制价格,树起壁垒排斥对手的进入,这样就会使自由竞争遭受挫折。

虽然亚当·斯密没有预见到竞争具有否定自身的倾向和问题,但他预见到了其他一些问题。最令人注目的是,尽管他对经济增长和自由市场竞争的好处表示乐观,但他警告说,劳动分工会有消极的副作用,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工厂里专业化的劳动者感到工作简单重复,枯燥乏味,这会使他们的心智受到损害。为减少工业化、专业化对劳动者的异化,他建议公民应获得义务教育的机会,以便使他们的心智得到增强,以承受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压力。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具体指出什么样的社会和道德环境可以使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得以有效地运作,但他提到应该要有一个公平的制度。他在《道德

情操论》一书中反复提到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同情、仁慈和自制，可以看出，他在《国富论》中也含有建立一个以道德自律、有内聚力的社会的思想。许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他思想中所蕴含的可以为看不见的手健康运作的社会和道德的环境，在当代社会中消失了，才使斯密的中心思想即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可以使大众利益得到最好的满足的有效性大为削弱。

亚当·斯密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真正的自由竞争，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就可以使更多的大众受益。可是在《国富论》出版后的那个年代，斯密所说的条件（特别是完全竞争所需要的条件），以及他作为启蒙运动的伦理学家所倡导的道德环境，已经不如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那么被人记住了。看不见的手就这样独自地进入西方人的意识当中，并加强了人们对人类进步的信念。很显然，那是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可以推动人类进步而不需要健康的人类动机，所以，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对人的道德完善的要求不见了，为建立一个能够提高大众福利的政府机构而对人们的理性的要求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认为只要有天赋自由的条件、公平的制度和自我利益这剂灵丹妙药，就可以使公众利益自然地增加的思想占据了主流。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亚当·斯密的乐观并不赞赏，但也没有人成功地动摇过这种乐观的思想。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不仅对斯密，而且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孔多塞的乐观主义都持怀疑和异议。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粮食供应的增长，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邪恶、不幸和饥饿可能使人口降到粮食供应可以

足够的水平。当然,从目前来看,他在《人口论》第一版(1798年)所作的悲观预测是不对的。技术的进步和地理上的扩展,使世界的粮食供给有了保障,远可以对付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如果马尔萨斯还活着的话,这种情况一定会让他大为惊叹。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经济的日益繁荣与廉价的生育控制综合效应使人口停止增长。但在马尔萨斯那个时代,他的预测确实对启蒙主义者极端的乐观主义是个很大的打击。

亚当·斯密之后,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他对经济进步的认识并不像斯密那么乐观。在马尔萨斯的影响下,他认为,不论经济如何繁荣,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工人的工资不会超过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这叫做"工资铁律"),而且他也不相信公司的利润会极大地提高。他倒是认为,土地的所有者是惟一的受益者,因为粮食短缺会导致较高的土地价格、较高的租金和较高的粮食价格。这些反过来造成较高的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从而减少公司的利润,为避免这种后果,李嘉图竭力倡导自由贸易。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可以降低谷物价格,防止价格再度攀升。

但在当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却被19世纪经济增长的大踏步前进和物质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供给的增长所掩盖。在19世纪后半期,对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批评主要不是针对他们所坚持的自由市场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针对市场不能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或提供公共的设施。那时候,大多数的政党,甚至包括那些信仰资本主义的政党都认识到提供公共设施如修建下水道、铺设道路等的重要性。完全的放任自由政策会导致工业城市的急速增长而缺少必要的卫生或净水的供应,这样对工人的健康和

生产率的危害会与日俱增。1850 年，曼彻斯特男性的平均寿命仅 25 岁。人们也认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通过了法律，比如，禁止使用童工并使工会合法化，这样他们可以争取较短的工作时间和较好的工作环境。到 1914 年，人们认为政府必须干预的领域比前工业化时代大大扩展了。

许多左派政治家当然则更进一步，认为应该减少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消除绝对贫困。这也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增加产出，改善福利，但他们在寻找与自由市场经济不同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由于社会主义者极力强调通过利益的再分配、社会改革和调节来保护劳动者，他们抛弃了 19 世纪初带来的许多自由；由于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经济的萧条以及凯恩斯等对自由市场的批评，许多非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来附和说，为维持与充分就业一致的需求水平，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计划和调节又变得时髦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反动是可以忍耐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用完全的国家计划来取代市场配置机制，那么社会主义者的这种选择就是一场灾难——正如斯密所预见的。人们只要看看二战后的 40 年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的失败，就可以知道资源的配置过程是多么复杂和重要。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经济让其自由运作，它会很快达到竞争均衡，即经济中商品的价格会保证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价格可以使市场“透明”，可以使商品在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中间进行有效的配置（但未必会公平地分配）。这种对市场机制威力的洞察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正确的。一般说来，自由市场可以使生产所需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并确保服务和商品的生产能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而且价格制度是以分散经营的方式来促成这一点的。正是市场机制和价格发出的信号，保证了消费者能够买到尺寸、瓦数、外形都称心的灯泡。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估计和制定计划来迎合各种不同的需求或供给。不论公务员机构多么庞大，国家计划仍然无法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样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坚强的内核。20世纪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就不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各种不同的偏好，当然也无法创造出富有意义的物质文明。

但强调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往往会使人们洋洋自得而忽视了自由市场体制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有能力——特别是在没有被完全认识的时候——把自由市场机制从作为人类进步的最有力的引擎变为对人类福利和公众利益的威胁。在书的以下几章，我们要探讨自由市场机制作为人类进步的发动机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缺陷。这些缺陷与市场机制，与我们这个日益拥挤的复杂的世界中的实际运作方式有关。特别是与近年来许多国家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和社会的首要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

功利主义与经济价值

到20世纪晚期，经济学已逐步取代了政治学和伦理学在作为人类追求进步过程中的理性启示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恰好是由于经济学已开始被懂行的政治家和

实践者当作一门科学。特别是，公共政策层面的许多经济分析是依赖于在正式的、假定的框架内的复杂的数学计算。对数学的精确的重视会产生两个主要效果：第一，如果数学计算可以奏效的话，它会要求有具体的假定或前提，而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他们根本弄不懂，即使那些玩弄神秘的“科学”公式的人也不会提出足够的疑问。这些前提包括这样一些可疑的假设，如假设市场的参与者具有很好的预见能力或者市场上不存在积极的反馈机制。第二，对数学精确这一重要性的体认会使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可测量的事情上，而把它转化为相应的用数字表示的价值（主要用货币）。这些都会导致经济学逐步地与每天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非理性相脱离。更重要的是，学术界把经济学归入“科学”的倾向会逐步使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完全分离。

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科学的研究——研究什么是可能的，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进行的，这种相互作用怎样才能变得更有效。阿玛塔亚·森在他的著作《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称之为“工程的（技术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并非没有价值，只要这门“科学”所依据的假设或前提与人类社会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作这种狭隘的、“技术的”假定，并把经济科学与伦理学研究（研究我们该做什么）正式划出界线时，经济学就放弃了那些帮助我们选择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的那些范畴（伦理学研究的那些领域），很奇怪的是，经济学所考虑的市场中什么是可能的已越来越被整个社会当作什么是应该做的行动计划。它不只是用来促进预定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是首先用来规定、安排目标和价值的选择。对效率的关怀常常摆在对道德的关怀之前。而且，

由于政坛上经济政策排在首位，经济模型的特点已开始极大地改变和限制我们原本对人类的特点和困境的广阔视野。比如，经济学假定的所有的市场行为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及其所“证明”的它在效益上可与公众利益达成一致的观点，这至少会使人们低估仁爱的社会内聚的价值，从而使个人主义到处横行蔓延，甚至出现许多自我利益的反社会行为。在环境问题上，由于无法对乡间的美丽风光作出客观的价值估量，因此会造成有害的影响，使环境问题被忽视。同样地，经济学家习惯于把未来消费的价值打折计算成“现值”，其实是把某种资源在未来时代的利益跟其现在的利益进行比较——这显然是个难以定夺的问题。同时，外部性，如污染被置于市场机制之外(不纳入经济增长的计算)，以及那种认为额外的管理会减少市场效率的观点，都会使人们认为污染问题的解决有益于公众，但需花很大的成本。同样地，为使分配公平而对市场的干预也会降低自由市场的效率。但在政治上，平等与效率的权衡往往造成以效率最大化为名而忽视所有的分配问题。这在自由贸易的辩论中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即使自由贸易的扩大可以促进总的财富的增长，但是自由贸易的迅速扩张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今人们只追求效率的时代常常被忽视。

对看不见的手的探讨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已经被允许支配我们的政治目标和影响我们的伦理价值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接受伦理的考虑(我们要什么样的人类进步)应从属于更狭窄的经济效益的考虑。

如果从表面上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好像替人们节省了有关伦理价值和公共政策的考虑，因为市

场机制显然可以提供一个道德上、政治上可接受的经济成果——促进公共利益——而不需要市场机制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道德上的动机或公众认可的社会目标。在本书剩下的章节，我们将论证为什么自由市场其实是需要一个紧密联合的社会环境、强有力的道德和政治框架来提高社会福利。但首先有必要研究一下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紧密相关的一种哲学学说，即功利主义。因为这个学说以及人们普遍的对它的误解又强化了人们的认识，即自由市场本身可以保证道德所要求的经济成果，对自由市场效率的科学的追求可以与道德目标达到一致。

功利主义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它的主要理论先驱者是边沁，他于1789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第13年）出版了有影响的著作《道德及立法原理》，这本书的开篇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

> 人生来就受两个无上的主人支配——痛苦和快乐。它们决定了我们该做什么，也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是非的标准和因果的链条都维系在它们的宝座上。它们支配着我们的所做、所说、所想……功利的原则承认这种服从并把服从作为制度的基石，用理智和法律在上面建立起适当的框架。

边沁所信奉的功利主义学说后来发展成多种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

第一，人类所做一切的、惟一的、固有的好处或本质上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行为的惟一目标就是快乐和痛苦的消失，

或者说是幸福或欲望的满足。一个事情的好处完全是由它所包含的快乐的多少、幸福或欲望满足的程度决定的。能产生这种快乐、幸福或欲望满足的某一物质的性能称为"效用"。

第二,与行为、动机、制度、法律等一致的伦理价值是完全由它们导致的结果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它们实际的对促进人类快乐、幸福或欲望满足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尽管在预测一种行为的结果(或者说确定事后的结果)时会涉及很多具体的问题,但是价值判断只简单地被看作是在计算结果的功利价值时存在的技术上的难题。它们不包括任何内在价值的吸引力——习惯的或宗教的——特别是行为的动机或类型。行为的价值完全是它们功利性结果的一种功能。这种只问结果的特点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保护人们免于被利用作为手段去达到违背他们意愿的目的的权利在这里也不被放在首位。只要考虑到忽视某人的权利所带来的结果,比如侵犯那个人的权利总体上讲可以带来更多的幸福或欲望的满足,那么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们可以忽视那些权利。权利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实现功利最大化。比如,在一个经济结构中,人们被赋予的免于贫穷的权利,不可能被一个功利主义者尊重,只要他确信忽视这一权利可以从总体上使贫穷最小化而使功利最大化。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某些个体的福利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或许功利主义原则最著名的表述就是,能使"绝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另外以道德要求我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作为假设,功利主义者认为,一种行为如果能比其他行为产生更多的快乐或欲望的满足,那么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必须履行的。功利主义显然是以最大化或最

优化作为其伦理的教条。最好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幸福。人类活动目标应该重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功利主义对现代精神不可磨灭的贡献之一，是现代有关进步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

功利主义最有魅力之处在于它声称为所有的道德判断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货币”（意为共同的尺度）。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用它所创造或带来的快乐或欲望满足的多少来判断，而道德的冲突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对不同行为所带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即幸福、快乐或欲望满足）的总量进行分别计算来得到解决。这个工作理论上是可行的，功利主义认为幸福的多少是可公度的（即各种各样的实际的或潜在的事物的状态，其幸福、快乐或欲望满足等等可以用单位价值来表示，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时代进行准确的比较）。这种纯功利主义的特征就是，人们可以把所有的快乐、各种类型的幸福和欲望的满足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标准不承认有种类的区别，而只用数量，如强度、持续时间等来衡量。但是幸福是一个很混乱的概念，它包括不同的主观看法，如快乐的感受，对带来愉悦的事物的态度，欲望的满足以及重要的没有满足的欲望的消失。很显然，一个人想对他自己的主观感受、态度和欲望作出定量分析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对不同的人和不同时代作出对应的比较了。因此，要对行动的最佳方向作出准确或客观的功利的判断，这与想对幸福进步的程度作出准确的估量同样是虚妄的。功利主义最有吸引力之处在于对道德的二难困境似乎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楚的、毫不含糊的回答，因为它没有把人的目标、渴望、欲望和享受所涉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考虑进去。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伦理学说

是一种幻想，因为它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一个度量单位，如货币来表示。那种简单化的只用经济的眼光来看世界，同样会假定人的价值的多样性可以用简单的货币指标来衡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功利主义用偏好或欲望的满足来解释人的行为，会产生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由于他们主张所有的欲望都可用价值来衡量，他们就会把广告所创造的欲望的满足与那种内在的欲望或偏好的满足等同起来，他们也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把非理性或反社会的欲望从这个等式中抹去。一些功利主义的解释想通过还原到只对"真实的"，即在消息灵通情况下的合理的欲望作出评价。但这种理想化的方式却有悖于起初不用幸福或福利而用偏好的满足来界定功利目标的目的。建立在满足实际的欲望或偏好基础之上的价值系统可能会提供一个政治上有吸引力且相对实际的行动计划——使偏好的满足最大化，就像在投票箱、民意调查和市场上所反映的那样。比较而言，如果需要事先界定可接受的理性的或"真实的"欲望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么功利主义的目标与政治上诱人的、满足现实人们实际欲望的计划的联系就断了。对经济学来说这种区别很重要，正如市场所显示的，市场可以使实际偏好（不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的满足最优化。但它不能有选择地使那些"真正的"或完全理性的偏好最优化，甚至也不能显示那些市场参与者没有表达出来的"真正的"偏好。我们也应注意，功利主义式的、简单的、对不同欲望区分的公正性是通过判断谁拥有这些欲望的公正性反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主义的学说是很客观的。它的公正性不允许我们只特别重视计算我们家庭或国人的功

利。我们的责任是使所有人的幸福最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公正性也可以扩展到对未来人们的欲望也给予同样的重视。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功利主义的特征并没有在自由市场的运作中反映出来。

功利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要求我们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快乐、幸福或欲望的满足。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那种认为穷人的利益或欲望与富人的利益或欲望同等重要,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幸福这个等式的分母的观点,几乎称得上是个革命性的思想。功利主义虽然提倡这种广泛的公民权,但在对待平等的问题上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尽管它认为在功利的计算上每个人权数应该相同,但这未必使每个人最后得到相同的功利。实际上,如果牺牲少数人的幸福来帮助实现绝大多数人幸福的最大化,那么只好在计算时把这少数也平等地包括在内,功利主义者就会同意了。功利主义者只有通过论证货币和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即第一单位的商品可以比后来的同样商品带来更多的幸福,才能论证对一定商品进行再分配的必要性。他认为,把商品从吃饱撑着的富人手里再分配到挨饿的穷人手里,直至他们的边际效用相等,这样可以使效用最大化。当然,如果所说的货物对穷人并不能产生额外的(或边际的)比富人多的幸福,那么功利主义者也不会说幸福本身的再分配必须达到一个点,从而使总的效用相等了。

许多功利主义者仍坚持他们的主张,即道德的目标应该是使绝大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他们认为,每个人实际上都把追求他们的幸福作为他们所有行为的目标。他们是"快乐机器",他们只根据能否使他们的快乐和功利最大化来决定

他们的行为。当然,没有必要因为要接受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说而对人的动机持这种看法。换句话说,人们没有必要为相信人的动机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幸福而相信行为的道德价值必须由每个人获得福利的结果来决定。显然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可以理性地达成与他们自己的幸福完全无关的目标(如在战争上牺牲自己),因为他们的行为促进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这种把个人描述成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者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后来被发展成现代经济学家的模型和假设中的具有理性行为的"经济人"。

鉴于功利主义的这些特征,它在人类进步史上具有的重要性是双重的。第一,尽管它有不少问题,但"最大幸福"原则的影响很大,特别是用它来作为公共政策的初步指南,结果它必然极大地影响人们对人类进步的看法。现代关于进步的思想常常包括人类活动的目标必须最大化——越多越好——而最大化的目标就是幸福。从它们对期望的结果——幸福的最大化的实际贡献来看,人们的权利和他们动机的本质常常被看作只具有派生价值。假如人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幸福的多少,那么,现代有关人类进步的概念也隐含着,至少可以直观地用可度量的价值来衡量以功利为目标的人类的进步。第二,功利主义对我们时代的主题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深植于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结果,经济学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就与功利主义具有许多相似的优点和问题。功利主义哲学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这种联系,使它因为忽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明显的道德考虑而备受尊敬。也正是由于这种联系使它造成广泛的对自由市场机制的伦理和福利意义的误解,对经济增长衡量指标所隐含的内容的误解。

效用的概念对许多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区别一般的效用与特别的边际效用，即最后使用或消费的一个单位的商品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一个消费者所拥有的某一商品越多，他从每一个额外单位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就越少。比如，一个人一天中吃第三块大巧克力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比吃第一块的效用要小得多，而同一天吃第五块巧克力的效用可能就是负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五块巧克力的两块或三块拿去换其他可以产生更多边际效用的商品，他就可以获利更多。19 世纪晚期的经济学家，像列昂·瓦尔拉斯和 W·S·耶文斯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人可以不断地交换商品直至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所交换商品的价格达到平衡。在这一点上，市场的参与者若继续交换也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必须注意，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只能根据他本来分配到的定量的商品去交换商品或货币。穷人只能用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去发挥最大的效用，而无法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换来增加更多的效用。但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把额外的商品再分配给穷人可以使总的效用增加很多。所以一些功利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鉴于个人的收入或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以及所有的个体都有同样的能力获得收入或商品带来的效用，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便要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应该平等。但是，一旦把这些效应考虑进去，如果收入分配更平等与有市场效率但分配结果不平等相比可以增加幸福的话，那么对功利主义者来说，再分配就理应是伦理的目标了。

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自从罗宾斯认为效用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并对之加以抨击以后，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都把他们模

型中的功利主义内容减少了。正如罗宾斯指出的，在人与人之间无法作出严格的功利或幸福的比较，比如，人们无法知道，把1000英镑从一个富人手里拿来再分配给一个穷人所产生的效用是否会比富人因此而减少的效用多。毫无疑问，罗宾斯和其他经济学家部分地是想把他们的“科学”从那收入再分配的伦理学中的“多石的海岸”中撤离，并用表面上较没有争议的目标，即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标准来取代严格的功利主义的纲领。这个标准是帕累托在1894年发明的。它认为，理想状态是喜好、资源收入和能力在一定的情况下，不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进行配置而使一些人更好，也不会使什么人受损。换句话说，“帕累托效率”状态是：假如没有减少某些人的效用，就不可能提高任何人的效用。这种市场效率的标准认为，如果收入分配和能力原本就存在的话，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的自由交换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这样，就无法实现完全的功利主义的目标，即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某些人的利益。“帕累托效率”在狭义上说仍然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概念，因为它是以是否实现（通过市场表现的）偏好满足的最大化来判断行为的结果。但“帕累托效率”标准对经济学家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不允许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某个人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功利或偏好的满足，它没有要求对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功利作比较，也不计算不同的方法所带来的偏好满足的总水平。它只说明，所有的通过市场表示的偏好的最优化达到某一点时，就不可能再进行互利的交换了。因此如果没有其他一些人变糟，人们的境况就不可能变好。由于现代经济学更强调“帕累托效率”的这个理念，而不是广义的功利主义关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它把经

济中的效率问题看成是“积极的”，而把有关公平分配和效用最大化看作是“标准的”。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阿诺和德布罗在50年代已经成功地用数学的方法证明：假如经济中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也就是说如果具备几个重要条件，如没有确定的规模经济，没有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外界因素（外部性），没有垄断，那么整个经济达到均衡将遵循“帕累托效率”定律。从这个狭义的效率上说，现代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证明了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认识，即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可以保证，个人对自我利益或偏好满足的追求（通过市场交换机制体现），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这个结果与证明在自由市场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导致大多数人功利最大化的证明不同。它只表明，如果符合这个模型的一些重要条件，自由市场可以使市场偏好得到最有效和最优化的满足，但它不能改变每个人原先的能力和收入。这个结果逃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公共利益是否可以通过原有的禀赋的再分配而得到促进。而且应该注意，现代经济学也证实了，一个真正的强调“帕累托效率”的自由市场并没有证实亚当·斯密的第二个直觉，即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利益扩散”效应使利益平等化。

虽然“帕累托效率”会对原有的分配产生一些结果，但它并不需要完全的中立以达到自由市场经济学所说的再分配。因为一般认为，由政府进行的再分配活动，会构成对市场的自由运作的干预，因而会削弱市场的力量，不能达到有效的结果。换句话说，要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据自由市场理论，如果没有干预（包括再分配活动），效率可以最大化。但通

过减少干预以使效率最大化，会以放弃效用最大化的机会为代价。如果原先的收入分配很不平等，能力也不一样的话，如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正确的话（看来这规律是对的），毫无疑问，额外的1000英镑带给一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家庭的幸福显然要比带给一个亿万富翁要多得多。但是，功利主义哲学和经济学都没有提出可行的办法来比较不同人的效用。如果有可行的办法，他们就可以证明再分配的行为是否能真正地增加总的效用或幸福（扣除市场效率的损失之后的效用）。如果可以的话，增加的效用有多少。正是由于功利主义和经济理论无法找到一种效用量化的方法来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而导致效率的目标占了幸福最大化目标的上风。

可以看出，不受欢迎的分配的不平等，是使市场效率目标与大多数人幸福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目标产生伦理距离的主要原因。当人们把市场作为惟一的、真正能满足人们偏好的工具时，当人们把道德目标放在市场效率最大化的从属地位时，他们就会把这种政治权利遗忘了。他们常常把功利主义的这种伦理教条与“帕累托效率”的概念相提并论，这只是功利主义关于实现大多数人欲望满足最大化的目标中打了折扣的一种极端的例子。而“帕累托效率”是不允许对最富的人进行收入调节以使大多数人受益的。

只要看看不平等对人们在市场上表达其真实的欲望和偏好的能力的影响，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保证各种不同消费者的偏好满足方面，自由市场总是很有效的。比如，市场的供给可以满足人们实际的对于各种各样小轿车或音乐的需求。但它却无法有效地给市场的参与者提供平等的表达他们偏好的机会。自由市场本身无法修

正像文盲或原先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些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只能使已经呈现在市场上的各种不同偏好的满足最优化。它无法考虑,在市场上表达偏好的能力本身是由收入和财富决定的。因此在偏好满足方面,并非所有人都一律平等。举个例子来说,家人一般不会表达他们对一个干净、宁静的环境的要求,因为他们必须用他们有限的资源来表达相对更为重要的偏好——对基本的吃住的需要。这并不是说,穷人不像富人那样期望一个干净的环境。原有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造成了在市场上对穷人的真正的偏好或欲望没有给予像富人那样同样的重视。据估计,世界上资产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 447 位富翁——在自由市场的庇护下,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比世界上的一半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因此市场对他们偏好的表达和满足的重视肯定有着天壤之别。

当这种市场对不平等的影响持续下去的话,市场效率的目标,即通过市场表现(用货币衡量)的偏好满足的最优化,就远远不能实现功利主义关于使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欲望的满足最大化这一目标。让我们作个假定,假设世界上 447 位富翁中有一个想买下一个原先供大多数当地居民娱乐之用的岛屿。现在,如果这个岛屿的潜在的使用者都具有平等的财力,自由市场机制就会把这个岛屿有效地分配给最想要这个岛屿的并愿意付最高价格的个人或团体。但如果当地团体没有什么钱或者缺少把资源集中起来以表达社团偏好的机制,那么这大多数人的欲望与这几个亿万富翁的欲望相比,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在美国,许多州根据健全的功利主义原则,已经把许多海岸、沙滩从市场竞争的舞台中拉出来,并且规定这些海岸、沙滩必须由大众共有。

帕累托或自由市场效率作为政策目标的依据不论从实践上还是伦理上看都有其局限性。而它作为促进人类进步的机制的缺点比分配不公的问题还严重。一方面,整个经济中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的"帕累托效率"均衡所要求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即使在自由经济的现实世界中也很难满足这些条件。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要探讨的,由于税收而造成的市场扭曲是不可避免的,收益有时确实是随着规模经济而增加,市场外部性随处可见,本来是不确定的、零零碎碎的个人决定会导致无法预测的、灾难性的后果。市场失灵,甚至在理论上都难以避免。而即使是帕累托意义上的市场效率,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实现。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表达和满足的欲望只不过是所有欲望的一个子集。还有许多人们想要的东西,如社区精神、自由和闲暇等是不用来交易的,但对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市场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实际上会严重忽视这些没有用来交换的东西,因为对它们的欲望没有在市场上表达出来。同样地,市场不会考虑那些不参加有关的市场交易的欲望,无法避免那些外部性的弊端,如污染和资源的耗尽。更为糟糕的是,它没有考虑未来人们的欲望——而这是环境学家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种信条,市场是最有价值的机制,它不仅可以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偏好,而且可以清楚地表达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偏好。但是这个信条忽视了市场范围的局限性以及市场失灵的存在。而且它陷进了功利主义的把所有的欲望都看成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可以比较的、连续统一体的泥淖。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消费者对从巴西进口的最便宜的牛排的欲望,可以直接地与巴西的印第安人对祖先的热带雨林的欲望相比

较和衡量(事实上,对为开辟牧场草地而对雨林的掠夺和砍伐是违背他们意愿的)。非理性的欲望、创造出来的欲望(如对时髦的提包之类的欲望)、甚至反社会的欲望(如认为别人不该有什么东西的欲望)都被当做一回事。现代经济通过增加期望,通过以广告煽起对现有商品不满足的手段来创造欲望。我们或许要问,由广告煽动起来的对最新的时装的欲望是否能与对最基本的穿着的欲望给予同样的伦理上的重视?但市场机制只能够把通过市场选择表现出来的所有的欲望都等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经济还会导致为减少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对一些商品产生新的欲望,比如对遗憾的必需品的欲望。对遗憾的必需品的欲望无论有多么强,比如,为隔开路上车流的噪音而对双层玻璃的欲望,与对一些确定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如钢琴或电视的欲望这两者总不该在效用的计算上面给予同样的重视或相提并论吧。对遗憾的需要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而满足人们拥有一台电视机或一架钢琴的欲望却可以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因此,道德体系应该审视不同欲望的起源和内在的伦理本质,而不是把所有的欲望都给予同样的伦理评价。

很显然,当市场效率使市场表达的欲望满足最优化成为目标的时候,它并没有给首要的道德和政治目标赋予同样的地位。这不仅避开了重要的分配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市场范围的局限性,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复杂的人的欲望的不可测度性。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可以恰好代表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目标。换句话说,即使功利主义被认为是最好的伦理体系,即使关于幸福的最狭义的定义只是欲望的满足,经济学家

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市场参与者在表达他们的欲望或偏好时其能力的不平等——这些都会极大地限制自由市场在实现幸福最大化方面的可能性。当然，许多人不仅会指责功利主义过于强调幸福最大化的道德价值，而且还会争辩说，无论如何提供更多的用货币表示的商品来满足欲望与幸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商品的价值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幸福是一个更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因为主观的不可度量的因素太复杂，不能用数学的精确来比较、交换和使之最大化。亚当·斯密自己也并没有把财富创造的较高的效率与幸福的进步等同起来。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是这样说穷人的：

> 从构成人类生活的方面来看，穷人并不会在任何一方面输给那些财富远在他们之上的富人。在身体的舒适、心情平静方面，所有的人都在差不多同一水平上，而在马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所拥有的安全感却是国王们必须费尽力气去争取的。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幸福的进步并不能完全由自由市场机制来推动。但是很显然，在今天的政治舞台，追求更高的市场效率被看成是最高的目标。虽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认识到追求更高的市场效率并不能保证幸福的进步，但政治家们却认为这两者的联系密切。现代的许多政治家也没完全认识到，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对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许多核心的政治设想构成挑战。特别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局限性意味着，即使能促进不断繁荣的自由市场制度，也并不能保证福

利事业的进步，更不用说幸福的进步了。

在我们对功利主义和经济学的潜在影响作出评价之前，有必要集中讨论一下其中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好像正把市场机制的某些弊端考虑到了——这就是成本的效益分析。成本的效益分析是一种用来评估一个公共的或私人的项目的社会成本和效益的方法。它认为这些项目的效应不在市场机制的范围之内。比如，建一个新机场，政府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把所有的重要的社会成本和效益都考虑进去，而不是只考虑那些通过市场机制表现出来的有关建设机场的成本和效益。首先，它必须估计当地道路的拥挤，附近居民遭受的噪音污染以及对当地自然景观等的负面影响，然后才与这个城市因建造机场而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比较，作出权衡。要做到这一点，它最终必须把所有该考虑进去的因素都用一种价值计量单位来衡量。这就意味着需要把那些不可计量的东西，如不断增加的噪音污染、自然景观和宁静气氛的丧失等也用货币值来衡量，然后再跟机场带来的更快的旅行上的方便，更多的到国外度假的机会等相比较。这样，成本的效益分析就与功利主义具有许多共同的优缺点。使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成本的效益分析就得把所有的价值和欲望折成单一的可计量的单位，即货币价值，但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用货币价值来估算的非交易商品价值会遇到巨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这些困难许多人都认为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把社会效益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也可能忽视一些个体的权利，他们恰好成为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幸者和牺牲品。

第七章 经济增长衡量的标准

我们现在已经探讨了自由市场机制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在理论上的一些主要的局限性。在书的后半部分探讨实践方面的问题之前，本章分析经济增长衡量的尺度与理论紧密相关的问题。经济增长衡量的尺度大体上也有同样的局限性，当它作为总的偏好满足的尺度时，就像自由市场机制作为满足每个人真正的偏好一样。讨论经济增长衡量的尺度的缺陷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现代经济奇迹的条件下仍有许多人产生幻灭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增长与人们感受到的幸福的增加之间日益加剧的偏差。

经济增长的定义及其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种经济产生的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增加。衡量经济增长

最常用的方法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它是一年内商品和服务产出的总值。由于 GDP 系列标准是以人们自由交换产品的市场价格来对经济的产出进行估价,因此 GDP 好像可以用相应的计价单位(货币价格)衡量不同的利益。因为价格与人们主观上想获得的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的利益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 GDP 增长不仅对经济学家,而且对政治家和社会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GDP 是对一个经济利益产出的实际价值的变化作出的客观的衡量。

在我们探讨衡量标准的模糊性及其与福利提高的关系之前,还得对其定义和解释再理一理。第一,必须注意 GDP 系列只衡量一个经济商品和服务的净产出卖给最终的消费者或使用者而获得的价值的增加。它不包括在生产中使用的半成品,虽然这些半成品的价值会在最终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得到反映。第二,由于名义 GDP 只衡量出售时的价格,因此如果价格上升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利益增长的印象也是虚假的。所以经济学家们用零售价格指数把名义 GDP 的水分挤掉,给出一个剔除通胀因素的实际的 GDP 来衡量实际的产出。第三,实际的 GDP 可以除以该国人口总数而得到人均 GDP,这样就可以知道人均实际利益的增加是多少。第四,我们应该注意衡量经济增长还常常用另一种方法,即国民生产总值(GNP)。GNP 衡量一国国民创造的总收入,它是 GDP 再加上国外的净收入。这两种衡量方法对一个有巨大的海外净资产或净债务的国家来说会有很大差别:瑞士人和荷兰人的生活水平凭借海外资产的巨额收入而得到极大提高,而墨西哥人或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却因为巨额外债所应支付的利息而大大降低。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作为一种突出的现象使经济学家们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古典的增长理论主要通过分析四种因素来解释经济潜在的产出的增长。第一个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机器、设备的投资等等。股本的增加只有当现有收入的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投资时才产生。资本的净增加只有当储蓄率高得足以筹措资金购买和更新机器设备，并且可以购买增加的股本时才发生。高储蓄率和投资是生产率（即工人人均产出的增加）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不论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或以前非劳动人口（如妇女）现成为劳动人口而导致的增加。这第二个因素至少在短时期内不是主要的，只要资本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人口的增加也未必就能保证高增长率。如果经济不能成功地吸收新增加的人口成为劳动大军的话，反而会降低总的生产率。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第三个因素是土地的增加或资源的扩展。比如，中西部平原成为稻麦产区或者油田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可以算是“免费投入”，但是这些开发通常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因此，像资本积累一样，是储蓄水平的产物。为改善现有土地资源的质量所作的投资（如水利工程、化肥等等）对提高产出特别重要。第四个关键的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开发和采用创新的工艺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改善土地或资源。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会使新的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减少，这样增加的储蓄和投资最终也不再促成潜在的收益的递进。对于进行收割庄稼的农民来说，拥有三把镰刀并不比一把镰刀来得有意义。但如果是收割机代替了镰刀，或者钢犁代替了铁犁，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大多数分析中，技术的进步以及为使用技术

所作的投资是长期性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进步本身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和开发的多少决定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发明创造没有通过专利保护，不仅是资助研究和开发的人们可以获益，而且有更多的人们从中获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常常是由于他们使用了在其他国家首先研究和开发的创新技术而得到极大提高的。

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来解释经济活动的增加。比如亚当·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的重要性。即劳动分工可以促成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斯密以及后来的李嘉图也强调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性，通过国际贸易，每个国家可以专门从事其具有比较优势领域的生产，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生产的实际成本。现代经济学家如西蒙·库兹涅茨常常强调制度的和个人的适应性，特别是作出迅速调整的能力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应付变化。这其中一个方面是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

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的优点以及市场自由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使社会具有必要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方面进行过辩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为寻求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途径，往往强调国家应放松对经济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样才会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市场的灵活性。而所谓的“新增长理论”则主要强调：在任何经济领域的资本投资（不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从总体上都会有有益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在整个经济领域提高效率。同样地，“人力资

本”的投资，即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使受教育者受益，而且可以使产业更快地适应新技术的变化，促进创新，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个经济效益和生产率。举个例子来说，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来开发人力资本是韩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取得骄人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与古典经济学家所坚持的新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观点不同。“新增长理论”认为，从整个经济层面来看，投资的规模越大，其不断的甚至是增加的收益也越大。这有助于说明怎样才能使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该理论还可为政府干预经济促进投资提供依据。特别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其回报大多是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形式出现，但与私人投资所带来的市场收益有很大不同。

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决定因素不是本书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只需观察这些互相影响的因素就够了——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人口增长、资源的发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灵活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指数式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商品产出的提高。这个现代经济指数式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米歇尔·托达罗在他的著作《经济的发展》中估计，自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1770年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以实际GNP计算为3%。等于说，每24年产值翻一番。即使人均产值以2%的速度递增，人口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实际的人均产值每35年即可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率就足够使过去几代人的物质财富得到迅速增加，并带来了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化。由于经济的增长，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有小轿车、电视、各种玩

具以及多种多样的省力的家用电器，如吸尘器、电烤箱、洗衣机；新的服务如医疗保险和财产保险；每年离家出外度假等等，不胜枚举。难怪经济增长被当做是人类进步的引擎，难怪追求更高的 GDP 或 GNP——这些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正如托达罗所说：

> 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或者身兼二任者，都把经济增长奉为神明。每年岁末，世界各国的统计数字都在展示他们相对的 GNP 的增长率。"增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由于人们为 GDP 指数式的经济增长奇迹着迷，所以往往容易忽略经济增长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 GDP、GNP 作为经济增长衡量尺度的局限性。对其模糊性和局限性的认识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GDP 增长与人类福利事业进步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复杂。它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从 1870 年以来，英国实际收入(GNP)或者以货币计量的产出(GDP)以五倍的速度增长，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福利水平(更不用说幸福)也比过去高出五倍。

用 GNP 或 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总的实际收入的多少或产出在满足通过市场表现的偏好的情况。假如所有的重要的欲望都通过市场表现出来，而且通过可计量的经济产出得到满足的话，那么 GDP 增长的衡量尺度就有可能真的代表人们欲望得到满足的总水平的增长，因为总的价值判断可以从消费者对满足其欲望的产品所付的价格中体现出来。

换句话说,假如这种简单的欲望的满足能代表福利事业或幸福的全部的话,那么这种 GDP 增长的衡量尺度就可以作为衡量福利或幸福增加的尺度。但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承认,GDP 并不能完全衡量经济的产出,更何况,许多对我们的福利和欲望满足的总水平极为重要的商品却不在市场交换范围之内。这些不进行交换的商品包括闲暇、家务劳动、社区氛围,以及外部的污染、拥挤——它们对我们的福利多寡至关重要,但这些并不反映在 GDP 里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书的前面几章谈到的,欲望的满足与幸福或福利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已经论及,幸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相当混乱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各种欲望的满足,而且还包括人们对快乐的各种主观的感受以及对能给予快乐的事物的态度等等,因此不仅不同的人之间没法相比,就是不同辈的人之间也没法相比。我们也注意到,幸福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的福利目标或通过市场表现的欲望的满足之间并没有清楚和准确的可以衡量的关系。确实,有许多人认为,幸福既包括欲望的满足,还包括强烈感受到的没有满足的欲望的消失。这个观点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幸福是没有满足的欲望消失后的那份宁静。这样,幸福就更容易得到和增加,因为放弃欲望比满足这些激起的欲望要容易一些。伊壁鸠鲁的信徒们也认为,欲望的膨胀对幸福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可是现代经济却倾向于通过创造更多没有满足的欲望来创造需求——因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所以这种观点表明,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增加有着根本的不同。GDP 的增长与幸福的增加之间的关系的本质仍然令人捉摸不透——只要看看留存下

来的那些诗歌和传统的神学家们的言论就知道了。但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GDP 增长与福利增加(或者说实现我们观念中的好生活所包含的重要方面)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并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即使是这种不断增加的欲望的满足(通过市场表现,用 GDP 衡量的欲望)与福利的提高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和模糊的。

任何一个有关福利或幸福生活的定义当然都会反映出我们认为能够满足重要欲望的那些东西。但这种欲望的满足必然包括许多非交换的商品(比如没有污染),这些非交换的商品可以满足不通过市场表现的欲望,所以它们就无法用 GDP 来衡量。反过来,福利的定义也不包括用 GDP 衡量的许多欲望的满足,这些欲望可以通过市场表现并得到满足。所以关于福利或幸福生活的定义很少包括满足基本的非理性的或反社会的欲望,也很少把满足低级的(如色情)欲望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或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如教育或音乐)等同起来。换句话说,福利和幸福生活的定义倾向于反映对需要或欲望的质量作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欲望在市场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或数量。需要或欲望并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数量比较。所以在给福利下定义时,比如肯定是更重视消除文盲而不是在全国范围设立抽奖,尽管对后者市场需求会更大。而且,对福利的定义也不允许用实际购买力来判断和衡量那些重要的需要或欲望。我们知道,在市场上富人总比穷人有更多的靶子可射,他们可以表示偏好并使自己的偏好得到满足。而福利的衡量则必须在富人与穷人的利益之间保持中立。

既然关于福利的定义与用货币计量的通过市场表现的欲

望的满足之间存在如此复杂的理论上的断裂，那么以货币作为评价尺度就不能很好地衡量出不同利益或需要的相对重要性，至少从福利的观点看是这样。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市场用货币价值单位度量福利的不同组成部分，我们又怎能期望对福利的提高作出总的度量和评价呢？品位和价值观即使对同一个人来说也不是完全可以度量的，所以想制定一个单一的、综合的价值指示器是行不通的。而且，品位和价值观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所以一个群体或一个时期对幸福生活或福利下的定义与另一个群体或时期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撇开用市场价值作出的衡量，处于变化中的价值观和品位也使对福利的提高或幸福生活进行总的评价成为不可能。除非我们愿意用一种特定的但又是模糊的定义。在我们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即分析为什么我们认为 GDP 增长与福利提高之间只有不多的联系，而转到讨论实际中这两者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偏差的例子。

GDP 的局限性

对 GDP 增长作为福利提高指示器的怀疑在理论上并没有被设计 GDP 指标的经济学家们忽略。他们早就指出 GDP 并不是用来衡量人类福利事业的进步，而只是用来衡量年生产流量的货币值，GDP 最初是作为战时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而今天，用货币来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却成为经济学家手中的一个法宝——对短期的经济管理尤其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广泛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这样

一来，GDP 增长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不管其实质内容有无保证。GDP 系列指标作为衡量社会福利之所以是错的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GDP 系列指标忽视了许多没有用来交换的有价值的活动、产品和服务。这些活动可以在家里进行（如抚养小孩、家务活或 DIY）；还有在不发达国家里那些维持生活的农活（其产品不用来作商品交换）。如果人们只对通过货币进行的商品买卖感兴趣，这些忽视或许是很合理的。但它也表明 GDP 系列指标与福利的衡量存在着相当大程度上的偏差。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5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的估计，家务活和社区工作这些不计算在产出之内的活动其价值在 1933 年达 16 万亿美元，而同年以 GDP 计算的世界总产出值是 23 万亿美元（据估计，在这"隐性产出"当中有 11 万亿美元是妇女创造的）。对这些非市场交换的劳动的忽视到头来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活动的商业化，从而造成对实际产出增长的夸大（假如用 GDP 系列指标来衡量）。举例来说，假如一个母亲出去参加工作，不仅她的新工作被算作增加的产出，而且由于她不在家而由她付出的照看小孩的费用也被当作增加的产出。这样，一个新的净生产活动却被算成了两个。同样地，原来为维持生活的农活，现在转为专业化的现代经济（其产品已用来交换），也会夸大以 GDP 度量的产出。因为早期的为维持生活的社区生产活动的产品不用来交换，也没有被计算在内。

第二，GDP 系列指标忽略了闲暇。结果，GDP 没有把现代经济所创造的增加的闲暇的机会对福利的影响包括进去。如果一个工人自愿选择放弃一周的薪水或产出去享受一周的

闲暇,显然他想获得的享受或福利要比那一周薪水的价值高得多。可是 GDP 和 GNP 系列指标只记下产出和工资的下降。在 20 世纪早期,对这个问题的忽视会导致对福利增长的低估,因为一般工人逐步赢得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以及一年四周假日的权利。而在 19 世纪,一年通常只有一周的假期。但在过去的 40 年当中,闲暇时间的增长显然比 GDP 度量的经济增长慢得多,而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闲暇时间最近还有所减少,所以至少在这方面,GDP 的增长已经过分夸大了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要客观地评价闲暇的价值也不容易。如果人们用被扣去的工资来衡量闲暇的价值,那岂不是说教师和护士应得到比债券经营者更少的工资?对于其他许多不用货币度量的产品也同样存在如何准确估算价值的问题。危险在于,由于一些产品不用来交换或其价值很难准确估算,所以就被我们重要的指标体系剔除掉,这样这些产品的价值就会被低估,甚至被忽略。许多东西可以归入此类——比如日光浴的快乐(但现在由于含氯氟烃却更危险),在没有污染的乡间散步的乐趣(现在已经更难找到时间和地方了),或者听听鸟叫(现在更难听到了)。

把 GDP 指标体系等同于福利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它忽略了经济活动中非交换产品的直接成本(或利益)。这些成本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外部性"——不由市场交换的各方承担,所以也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它们主要包括以污染、资源的耗尽以及人口密集拥挤等形式体现的环境的恶化。这些经济活动的有害效应并没有从 GDP 增长指标体系中扣除,不像增长的总效益扣去总成本。GDP 指标体系是对货币交换的总度量,而不是对增长活动的影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就存在

这样的危险，即只顾使 GDP 增长最大化会使我们忽视增长中非交换的成本。而当成本的增长开始快于收益的增加的时候，问题就特别严重了——许多人都说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危险在于，在当今科技时代，成本不被算进关键的目标性指标体系当中，这就成问题了。对经济增长主要衡量标准的重新界定，把经济增长水平的最终成本和收益都完全纳入计算可以改变我们的政策，使我们知道应优先考虑哪些事情。它会让我们同样关注增长的效益和成本。只有当额外活动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时，社会的福利才会由于经济活动的增长而提高。除非我们计算这些成本并与效益作比较，我们就无法肯定我们的政策是合理的、正确的，或者说将无法肯定经济增长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进步。然而，要对环境恶化作出估价却会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许多难题。因此要建立一个严密精确的有关增长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体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难题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另外一个 GDP 指标体系与福利关系的模糊性，是由于防御性的开支或称为令人遗憾的需要造成的。GDP 指标体系不仅没有把环境遭受破坏的价值以及经济活动造成的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等因素扣除，而且还把为保护我们免受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增加的防御性开支也算进 GDP 的增长中去。比如，购买过滤器以防止和减少水污染，以及由于城市向外围扩展而不得不延长上下班的路线也被算进 GDP 的正增长中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是很值得的，因为建起生活用水过滤器或长距离的上下班路线是经济活动，它可以解决就业，而且对较富裕的购买者或消费者来说也有价值，不然这些人就得不到这些好处，既然存在人的拥挤和污染，没有把抵消经济

增长的负面影响而增加的防御性消费扣除掉，那么 GDP 作为经济福利净增长的指标的可靠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另外一个包括在 GDP 中的“令人遗憾的需要”是防止犯罪的开支。装防盗铃、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及在每个门窗安上锁可以增加购买、使用者的安全感，对日益增加的犯罪的害怕可以减少。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用来（部分地）防止犯罪率上升造成的有害影响，而犯罪率的上升又是由于我们后工业社会和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社区的迅速崩溃，以及非技术人员工作机会的不断减少而造成的。“了不起的汽车经济”对 GDP 数据也有同样荒谬可笑的影响：不断增加的对汽车的使用反映在 GDP 指标体系里面（汽车、轮胎、汽油等的产出则更多），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交通事故损失的价值却没从 GDP 中扣除。而且，建造新道路以缓解拥挤的花费，建造隔音墙保护社区免于新道路上的噪音污染，制造催化整流器以减少污染以及医院为成千上万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进行护理等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却被当做 GDP 的正增长。

表面上人们好像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想修正 GDP 指标体系，以便抵消上面提到的局限性——通过加进有益的非交易活动和商品的价值，并扣除由于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造成的防御性开支和环境破坏而损失的价值。但有关问题却使把 GDP 指标体系等同于福利的增长指标的企图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不可信的。第一，虽然防御性开支确实有市场价值，但这种价值又不能孤立起来，因为它常常包含在商品的总成本中。第二，很难对闲暇或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作出客观的估价，因为它们不用来交易，我们无法依靠市场价格来判断，所以任何估算出来的价值都带有很大的主

观性而值得怀疑。而且，在用经过调整的 GDP 指数作为能较好地衡量福利事业进步的尺度之前，还应该修正一些更深层次的缺陷。特别是，应该把作为实现最终产品的手段的商品或活动与本身就是最终产品二者之间严格区分开来。并且也有必要考虑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最后还必须考虑未来可持续的福利水平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所以应该把资源的损耗也算在内。

防御性开支纯粹是由于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所以从 GDP 中给予扣除是完全合理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动态的增长中环境方面的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对以上的道理加以延伸的话，我们就得在许多经济领域（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进行复杂的调整，因为 GDP 指标体系没有把消费者为满足内在的需要而购买的商品与为促进、保证或保护其他商品获得的满足而购买的商品区别开来。GDP 指标体系不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半成品，而只包括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商品。但它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终消费者购买的许多商品本质上也是“中间产品”，因为它们是为保证获得更高福利的一种手段。比如，为得到一种资格而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为得到一个理想工作的手段，而这工作本身又是为能获得一栋房子或度假的手段。其实，人们购买的许多商品只是为了能够得到其他商品的手段。希尔斯在他的《增长的社会限制》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把消费者看做是他们自己在扮演加工的角色，投入，然后把投入转化为自己想要的产出。当我们自己这么做，并认识到 GDP 指标并没有把半成品与最终消费的商品区分开的时候，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如果半成品转化为最终产品的效率发生变化，就会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用 GDP 表示的福利的内容。希尔斯举了下面一些例子：

假如这个过程需要更大的投入才能得到一定量的产出，那么效率就会降低。比如，由于在冬天必须额外加热才能保持一定的温度，或者由于需要额外几年的全日制的教育才能获得为找到一个特定工作所需的资格。在这些情况下，作为投入在半成品上多付出的费用，如果按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它表面上看来是加在消费上面，但实际上如果以消费者的目标来衡量的话，此时的消费并没有使他们的境况更好。

如果我们首先假设为获得一定水平的福利而必须估计不同的障碍的上升和下降的高度，那么在使用中间投入物以产出所要的产品时就要作出效率上的相应的调整。这样我们就会很快地认识到，要使 GDP 指标体系变成能准确衡量福利事业进步的尺度所必须作出的调整的尺度和复杂程度有多大。

如果 GDP 指标体系要反映每个人总福利的变化，就必须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大多数人或一般公民的福利感兴趣，我们就必须调整收入的增加集中在少数人的状况。即使我们不去过问平等不平等，对现有的富人或穷人福利增加的状况也完全缺乏兴趣，我们也还是有理由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并对 GDP 产出系列指标进行调整。如果我们想测定总福利的增长，额外的收入或商品的边际效用一般是递减的。对一个富裕的流行歌星来说，第二辆法拉利车对他产生的额外效用比同样的 10 万英镑对挨饿的人产生的效用要小得多。但市场机制和 GDP 指标体系却把这两者的效用等同起来。用 GDP 衡量不同欲望的满足不单单是预期效用的一种显示，而且是市场上不同参与者的财力的显示。所以

GDP 指标不能很好地显示总的或平均的福利水平的变化。

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在增加，因此这种局限性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据估计，在 1979～1993 年间，英国最穷的 20% 的人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约 20%，而最富的 10% 的人的实际收入却增加了 6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6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在过去的 30 年里，世界上最穷的五分之一的人在全球收入所占的比例从 2.3% 降到 1.4%，而最富的五分之一的人却从 70% 上升到 85%。在 1980～1993 年间，世界上最穷的 10 亿人的实际收入确实减少了。托达罗在他的《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中，“基尼系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呈上升趋势。（“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系数。0 表示非常平等，1 表示非常不平等。）在美国也是这样。1977～1989 年，最富的 1% 美国公民其税后收入的实际增长达 60%。在许多国家，最富的 20% 的人拥有该国收入的 50%。在英国，最富的 20% 的人的收入大约是最穷的 20% 的人的 10 倍。鉴于这些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GNP 增长实际上主要是反映富人收入和欲望满足的增长。另外，假如促进 GNP 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采取效率方面的措施从而对非熟练工人和不幸者的收入产生更多的压力的话，那么 GNP 的增长不仅仅表示富人福利的增长，而且会以穷人的牺牲为代价。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建立一个“同等权数”的 GDP 指标来衡量每个人的收入增长率。这个经过调整的指数对穷人收入增加 1% 与富人收入增加 1% 给予同样的权数。另外也有人建议采用“贫穷加权”指数，即给穷人收入增加的百分比更多的权数。这些指数表明实际增长率要低得多，在高度两极分化的国家如巴西尤其如此。当然

经过这样调整的计算也有问题，它不能客观地衡量额外收入边际效用的递减率，无法对收入分配进行客观的、有效的福利方面的衡量，因此对收入不平等而作的调整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其中也有很大的主观评价的成分。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GDP 指标体系没有考虑未来人们的福利。环境的恶化主要是影响子孙后代而不是当代人们的福利。突出的例子是，对鲸鱼的捕杀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本来鲸鱼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另外，不可再生资源正在日益耗尽。所以许多环境学家说，应该把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地使用，与“地理的”或“自然的”资源一次性地用光区别开来。他们还指出，公司必须根据会计惯例，在计算他们的利润的时候，把有形资产的折旧（如对因磨损而造成的机器价值的减少进行折旧预算）也考虑进去，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可持续的利润，而且可以证明，利润并非仅仅来自资源的消耗和未来潜在产出的减少，同样地，国民经济核算把固定资本的折旧从 GNP 中扣除，从而得出净国民生产总值 NNP。NNP 衡量一个经济在储存足够的资金、保持资本设备原来状况后所创造的收入。生态经济学家说，我们应该同样考虑自然资本的价值跌落，考虑对环境资源的可行性的替换或维护所付出的未来成本，要对由于现在对不可替换资源的消费而造成子孙后代将永远失去的福利的价值作出估计，并从 GNP 或 GDP 中扣除。他们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把资源当做免费的投入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们应该对资源损耗和环境恶化的效应作出充分的估计，并在 GNP 中作出调整。这种调整是很有意义的。华盛顿的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估计，如果石油和森林资源的损耗从印尼的 GNP 中给予扣除，并对土壤流失的成

本作出估计，那么1971～1984年印尼经济年增长率就不是官方所说的7%，而只有4%。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详细讨论的，通常不太容易估算资源在未来的价值或者下个世纪资源维护或替换的成本。而且把“折扣率”应用在未来成本也难说是否恰当。

从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GDP指标体系作为衡量福利水平变化的指示器必然存在致命的错误。不论GDP作为短期经济管理的工具多么有用，但用来衡量人类福利就不适当了。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用GDP衡量的经济在持续地增长，而整个社会却由于“感觉不妙的因素”而变得日益地焦虑不安。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事业的进步没什么联系或一点关系也没有。非经济专业人士对GDP增长意义普遍的误解表现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人类进步毫无疑问是成正比例关系。在19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以及20世纪都是这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依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物质的需要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在发达国家尽管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十分了得，但是存在普遍焦急的心态，对经济增长作为进步引擎的失望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日益增加。这反映了在发达国家，额外增长的边际福利效应在递减，而且利益分配更不平等，而追求更高增长的边际成本却在递增。特别是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存在着许多无法度量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如社会混乱、紧张的状况以及环境的恶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在详细讨论这些成本之前，看看一些大胆的想法，即建立其他衡量福利事业进步或人类发展的指示器来更准确地反映和确定我们所处的境遇是有益的。

衡量福利事业进步的其他方法

调整 GDP 系列指标，使之更准确地衡量福利的变化，更好地衡量政策是否成功，有助于保证经济增长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真正的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这个任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问题成堆。但人们已经作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努力。或许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 1972 年建立的经济福利指标。他们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把闲暇和无报酬的就业赋予积极的价值，并扣除那些遗憾的需要，如上下班往返以及警察保护的费用。但他们极大地忽视环境的成本，所以许多人跟他们争论哪些遗憾的需要应该被扣除，哪些可以不计。但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在如何估计闲暇的价值上却存在巨大的分歧，因为它在经济福利测量(MEW)指数中作出最大的调整。但是他们这个计划的结果却很有意思。MEW 总是大于 GNP(因为以前没有包括进来的利益比成本要高)，但从长期来看，MEW 比 GNP 的增长要慢得多。赫尔曼·E·戴利和约翰·B·科布在他们的著作《为了共同的利益》中写道，以人均计算，1929～1965 年 MEW 可持续的增长为 1.1%，而 NNP(GNP 的折算)的增长为 1.7%。如果从战后时期(1947～1965 年)看，可持续的 MEW 每年仅增长 0.4%，而 GNP 每年则增长 2.2%。

赫尔曼·E·戴利和约翰·B·科布在 1989 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指数，即可持续的经济福利指数(ISEW)。这个指数表明，在把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的成本从其利益中扣去之后，从

长期来看，实际的增长率仍是正数，但比 GDP 的统计数字明显要低得多。按 ISEW 的人均增长率计算，美国人在 1951～1986 年每年只增长 0.53%，而按人均 GNP 计算则达 1.9%。ISEW 指数实际上表明了，在 1970～1986 年间，经济福利还有小幅度的下降，特别是在 80 年代早期，ISEW 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作了大的调整，这是使 80 年代 ISEW 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因素。它还扣除估算的由于噪音污染造成损害的价值，并调整环境恶化的成本。它还加进家务劳动的估算值，但忽略了闲暇价值的调整，因为闲暇价值的推测成分太大。但对这些调整仍有许多争议，更不用说用不均等指数来衡量消费增长的方法以及教育成本的相当一部分被扣除（把教育成本看做是遗憾的需要）。在非再生资源损耗方面，赫尔曼·E·戴利和约翰·B·科布把矿产提炼为基础生产价值 100% 的扣除也是很有争议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仔细考察在确定这个指数时所必须作出的决定就可知道其中武断的成分有多大。"

正是这种武断使所有调整 GDP 系列指标的努力都带有致命的弱点，这也是较广义地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不能被经济界或政界接受的原因。如何对成本、效益进行界定和估价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主观判断与标准价值关系的问题。比如，人们应该如何估算未来成本和效益，如何确定穷人收入增加的价值和富人收入增加的价值。如果对指数作出的调整越是雄心勃勃和复杂，那么得出的结果就越依赖于调整和衡量的价值判断。因此，许多国家现在正采取发布独立的特定范围的报告，这些报告提供的互补的信息是以清晰合理的假定为基础，但并不企图建立一个完全的指标体系（因为它常常掩盖标准化假定的缺陷）。1996 年英国第一次发表这种中型的

"绿色报告"。他们估计,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1993年约耗损22亿英镑,相当于该国0.5%的GDP。

近来,人们对建立不同指标的努力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不是去调整GDP指标,而是更重视客观的非货币度量的福利指数,这种方法是柯利设计的新经济福利指数(NEWBI)。这种指数也把实际的人均收入包括在内,但是只是把它看做七种指数之一。其他六种指数反映不平等、失业、通货膨胀和利息率的水平及其变化。统计时,七种指数具有相同的权,从而得出福利的综合指数。这种指数表明,英国在1973年的福利水平最好,而自从1973年以来,福利水平波动很大,虽然在80年代中期大幅上升,但仍没达到1973年的水平。在NEWBI中把失业当作福利的负增长,从而作出加权计算所产生的效应可以表明,这类指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主观判断以及对各种因素的加权。如果对失业的加权分别是其他六种因素的三倍,那么NEWBI指数所显示的自1973年以来的福利水平确实大幅下降,只在80年代有稍微的回升。

另外一种不同的福利指标是每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里面所提到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DI包括三个指标:人的寿命、教育水平(成年人的文化水平和学校的注册率)以及以实际的人均GDP(或购买力水平)衡量的生活水平。这个指数只是三个方面的简单平均,而且对所有国家都使用同一标准。有些结论很有意思,西班牙、荷兰、希腊、哥斯达黎加和越南这些国家在这个综合的人类发展指标的排行榜上都比他们各自的人均GDP的排名要靠前得多。而新加坡、香港、海湾国家和地区如科威特的UAE人类发展指数比其GDP指数却低得多。这种情况表明,在这些国

家经济增长了，但利益的分配较不公平。《人类发展报告》也采用其他不同的福利指标，如“能力、贫困测量”和“性别能力测量”（衡量性别的不平等）。

虽然这些不同的指标令人兴奋着迷，但它们都逃脱不了对不同的福利因素作加权时的武断和主观性。传统的经济统计指数如 GDP 仍然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因为这些系列指数把那些只是推测性的主观判断排除在外，而且它们使用以货币计量的看起来“客观”的衡量标准。这样统计数字会给人一种精确或准确的感觉，这在我们当今的科学时代确实很有市场。可是别忘了，这些统计数字却极大地忽视了市场的局限性、收入不平等的效应以及人类困境的许多复杂因素。而像 HDI 和 NEWBI 这些指数，确实避免了对文化水平、寿命和失业等因素只简单地赋予货币价值的问题，但缺少相应的计量单位来衡量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不论同时考虑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多么重要，也不管我们多么想确定一个特定时期到底有没有福利事业的进步，但是任何想建立一个单一、可靠的指标的想法都注定是武断的、不适当的。我们最好还是灵活使用一系列“互补的指标”来衡量生活的质量。米歇尔·雅各布在他的《绿色经济》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 问题显然在于想建立一个单一的衡量福利的指标。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好主意操作起来却毫无意义。福利不是一个一元的概念，它不能用一个指标来表示。经济活动的成绩必须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每一个指标都从其自己的角度

出发来表示它们认为是重要的某一个方面。确实，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指标会有矛盾的地方，因而很难用“总的来说”来概括社会是变好还是变坏了。但是使用单一的指标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在计算里面。最好是把不同指标的变化公布于众，让人们看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判断从一年到另一年的一定变化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从而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

人类的进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不容易简单地用数量和科学的精确性来衡量。它不仅是一种事实，也是一个主观的估价的概念。建立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是否有进步是必要的，从而可以让我们作出判断。不同的尺度、不同的观点会产生互相冲突的判断。这就是人的本质。

政府还是会继续置 GDP 作为福利指标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缺点于不顾。他们会因为不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客观的福利综合指数而感到自慰。政治家和现代媒体一样都喜欢有一个直截了当和可计量的目标，而对经济增长和 GDP 系列指标的追求好像可以提供这种方便。在他们看来，在这个严厉的效率的时代，以不同的尺度为基础的主观判断会把人的思维弄乱。政府通常也很有兴趣人为地把增长的成本说得少一些。任何承认某些经济增长方式的无效都会减少经济增长政策的光彩，而且会赋予目前“越来越糟”的感觉以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任何对我们通过自由市场政策进行的指数式的福利增长的怀疑，都会使来自贫困地区对重新分配现有的福利和收入状况的要求变得更难阻挡。

第八章　环境对增长的限制

生活中我们总是担心，环境会遭到极大破坏，以致有一天人类会像恐龙那样，成为灭绝的物种……用不了20年的时间症状就会显现，从而决定我们的命运。

——大卫·E·普赖斯，《人类会灭绝吗》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因此人们日益怀疑，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作为人类进步的引擎是否还应热烈地去追求。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着对人类雄心的客观的、物质上的限制。而且我们还认识到，人类主宰自己命运在能力上的局限性。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今天人们有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概念与其说与自信的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还不如说与古代人们的观念更接近。随着我们人类活动的扩展，及其与我们自然栖息地的不可预测的、危险

冲突的增加，人类正日益陷入困境，越来越缺少安全感。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对它的破坏，认识到混乱的环境的反应所造成的危险，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能预测和控制的范围。而且随着人类从利用自然到企图大胆地重新设计和控制自然，许多人已经不安地感到，我们可能会因没有对人类雄心进行适当的限制而把事情做得太过分——这简直是在玩火。人们已经觉察到，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和应用的日新月异，使人们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而且人们忽视了各自独立的专业知识的局限性，这些都是危险的。同时，随着这些担心的日益增加，人们越来越怀念过去时代那纯朴的大自然和乡间的美丽风光，大有失乐园的感觉。我们孩童时代所生活的环境——广袤无垠的田野以及世代耕种的乡村农夫，现在他们已经采用先进的耕种技术，而且地域空间也很有限了。有水源的草地，郁郁葱葱的树木、溪流、池塘和灌木正在消失。诚如赫胥黎所言："我们英语诗歌的体裁已丧失了一半。"

本章要考察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越来越多的环境的代价，以及这些成本或代价在减少经济增长与人类进步相互关系时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一部分分析人类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我们正在破坏的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并评估这两个因素对我们人类在管理、控制自然，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和持续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综合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由于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在对付污染以及关怀未来时代的人们的利益方面的失败所造成的环境的恶化，并分析其中重要的因素。本章最后主要着眼于现代人们为防止市场失灵所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来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遗产，我们对未来可持续的人类进

步的希望就系于这些努力的效果。

有关规模和复杂性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环境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活动规模的产物，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中越来越快地变化的产物。货币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活动激剧增加，人口也是这样。但地球就那么大，它所能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有限。世界人口，1850 年是 12 亿，1950 年增加到 26 亿，而到了 1990 年达到 53 亿，这是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远快于出生率的下降。第三世界的人口中有 40% 是在 15 岁以下，这意味着世界人口将持续增长，或许在 2025 年将达到 85 亿，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潜在的父母数量的增加远远快于人均出生率的下降。但是，在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过程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只在其中扮演一部分的角色。因为来自富裕的发达国家的需求一直在增加，虽然其人口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增加。这些富裕国家在物质的繁荣和资源的消耗方面大幅度上升，他们是地球资源的最大使用者。这些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16%，却消耗了世界一半的燃料和三分之一的谷物。北美人均消耗的谷物是印度的五倍，消耗的燃料是印度的 60 倍。

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加以贫穷国家想赶超西方国家经济的扩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巨大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在世界瞭望研究所的报告《1996 年世界状况》中，布朗说，自 1950 年以来，对谷物的需求增加了两倍，而对石油燃料的消耗却是过去的四倍。他在文章的

开头这么写道：

> 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呈螺旋式上升，其增长速度已经超出了地球的自然系统的承受能力。这样，全球经济正在对它赖以发展的基础进行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表现在：渔业萧条，水质下降，森林萎缩，土壤流失，湖水发臭，庄稼枯黄，热浪滚滚，物种减少。

他进一步阐述这种种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比如能否生产足够的食物来供养这个星球上每年多增加的9000万人口。马尔萨斯在其著名的《人口论》的第一版中错误地预言，在18世纪末，人口的增长会很快地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饿和人类进步的终结。而实际上，通过开发新土地和利用不断进步的技术可以增加食物的供给，这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胜利。1820年英国农民可以生产四倍于他自己消费的农产品，而在1987年则可以生产八倍于他自己消费的农产品。20世纪70年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其继续快速发展，应归功于"绿色革命"，即新的高产农作物和更有效的化肥。但布朗指出，80年代，土地的产出增长开始下降。在1984～1992年间，实际的人均谷物产量下降了6%。在1992～1995年，世界生产的谷物比它消费的要少。结果，世界的谷物储量在1987年足够维持104天，而到了1996年初只够维持49天——少于普遍认为的最低的安全线。即使把欧洲和美国"闲置"的土地恢复用来种植农作物，那几年谷物的储量还是会下降。布朗和其他研究者把谷物供应状况的恶

化归因于水土流失、作灌溉用的沟渠的损毁，使用过多的化肥而造成边际收益递减，以及由于空气污染和臭氧层损坏而造成的紫外线辐射。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估计，全球土地沙漠化的成本现在每年已高达42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许多重要的农业地区，水资源由于过分使用而大量减少。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巨大的奥贾拉拉灌渠的水位每年下降四英尺，这样下去不到20年，大平原的灌溉将受到威胁。

由于其他食物来源有限，我们非常有必要而且应该赶紧寻找办法来对付这些明显的使谷物供给受到限制的因素。在世界大部分草地上过分地放牧意味着，如果要增加牲畜的数量的话，也有必要增加谷物的生产；同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渔区也由于过度捕捞而很快将接近或超出其可持续的范围。即使有足够的食物喂鱼，养鱼也只是一个代替。而且，如果谷物产量增加的需要没有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那么正在日益减少的森林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每年大约减少2000万公顷（面积比英国还大）的雨林，自从二战以来，全世界的森林面积减少了一半。这不仅意味着丧失了这些森林的可持续的生产，而且丧失了这些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树林从而使全球气候变暖。更严重的是，砍伐森林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水资源减少和洪水泛滥。那些光秃秃的土地不用五年到十年时间就会变得贫瘠荒芜。砍伐森林对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加深，如果农民没有柴烧就烧肥料而不是把肥料用在他们耕作的土地上。

我们人类经济活动的规模所带来的危险，当然并不局限在过分地利用土地、砍伐森林，过分捕捞以及超出可持续的食

物生产的范围。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但其他问题依然存在,因为环境是我们生活中一切重要方面的源泉,而不仅仅可以提供食物、树林和用水。它还是我们的垃圾箱呢。

从环境作为源泉的角度来看,环境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要维持未来人类的进步,我们对所有重要资源的使用就必须是可持续性的。从广义上来说,资源可分为三种:一是永恒的资源——阳光、风和潮汐。这些可以直接(太阳能加热、风车或潮汐发电站)或间接地利用(主要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环境经济学家戴利把阳光称做"太阳能收入",他在其著作《稳定国家经济学》中指出,过去200年的经济增长是"因为人类不靠太阳能收入而依赖地理资源生存"。这种"地理资源"构成了第二资源,即非再生资源,主要包括石油、煤、天然气以及金属如铜、镍、铁等。太阳能收入取之不竭,而地理资源却会耗尽,这样就有必要发现以前不为人知道的新资源或寻找替代品。第三种资源是可再生资源——鱼、木材、谷物、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等等。如果我们把阳光比做永恒的收入或资源,非再生资源就像没有利息的资本(用过就永远消失了),而可再生资源则可看做是有利息的资本,可再生资源可以自然地再生和产生永恒的收入,但前提是这个资本不能动用。如果这些资源的消耗慢于其再生率,它们就可以永远维持下去,但是,一旦这种可再生的可能性消失,可再生资源如果过度利用,那么其今后的产出就会下降。当然,良好的管理和技术进步,可以增加可再生资源的产出。比如谷物产量可以通过选用优良的稻种和肥料而得到增加。但重要的是必须区别真正的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较好的短时期的开发利用。比

如，使用鱼群探测机来发现鱼群并不会使鱼的储量本身增加，它只会使人们对鱼的捕捞更为容易，但往往造成过度捕捞。

长期的可持续性的人类进步要看人们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依赖于永恒的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的产出。所有其他资源的消耗都是一次性的消耗，未来的人们已不可能得到。随着我们活动规模的扩大，要想不超出可再生资源再生所允许的限度是很困难的。环境对垃圾的吸收和承受能力也是一样，是有限的。有些垃圾无法被吸收，它对未来时代的人们还会继续造成污染；而其他的——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可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通过土壤、空气和水等自然过程将其吸收、处理或消除。但是，如果废物垃圾的倾倒超过了有关环境媒介质所能吸收的程度，这些自然过程就会被击溃和摧毁。比如，河流、海洋可以不断地、大量地吸收我们的垃圾，但是其吸收限度一旦被冲破，它们就会变成死河、死海，毫无生命和活力。

自然界及其生态系统有很强的、适应变化的恶劣环境的能力，它可以自动调节和发展，但是这种适应需要时日。生物学家卡森在她很有影响的著作《静静的春天》中写道：

> ……时间是最基本的配料。但在现代世界却没有时间。变化如此之快，新情况层出不穷，一切总是跟随人类鲁莽的和掉以轻心的脚步，而不是跟随自然的、沉稳的脚步。

如果人们无法妥善地进行管理、应对环境和社会的变化，这种日益急速的变化不仅会威胁自然界再生和适应的能力，

而且会威胁人类自身适应变化的环境的能力。要理解这方面的危险,不能仅仅简单地考虑日益扩大的人类活动的规模与有限的地球的关系,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复杂性及其限度,以及我们将面临的不可预测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局面的风险上。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理性所提出的巨大挑战,以及对人类所声称的可以控制自然界的嘲弄。

或许关于环境限度重要性的最好例子莫过于鱼的储量与过度捕捞的关系。几千年来,海里、河里、湖里的鱼是人们重要的菜肴。仅本世纪,全世界鱼的捕捞量就增加了 20 倍。布朗指出,全世界鱼的捕捞从 1950 年的 2 200 万吨增加到 1994 年的 1.01 亿吨,平均每年增长 4%。但在过去几年,过度捕捞已经带来许多不祥的征兆。自从 1988 年以来,世界的鱼产量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在许多著名渔场鱼的产量在大幅度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世界上每 15 个海洋渔场就有一个渔场的捕捞已经达到或超过其可持续发展的限度。15 个渔场中有 13 个渔场鱼的产量在下降。而且三分之二的鱼种由于大量捕捞而面临绝种。大西洋蓝色金枪鱼的储量减少了 94%。在北海,每年捕捞了大量的鳕鱼和黑线鳕,其中四分之三是在还没长大成熟的时候捕捞起来的。用鱼群探测器和长数英里、宽几百米的渔网来捕捞残存的鱼,效率确实很高。由于人类的勤奋捕捞,鲸鱼数量的灾难性减少的悲剧现在又在一般鱼的储量上重演。加拿大渔业界已经觉察到这种代价,以前加拿大纽芬兰的外海是最丰富的渔区,现在由于产卵雌鱼的激剧减少而造成了鱼的数量灾难性的锐减。但这不是缓慢的线性减少,所以采取适当的储存和保护的第二次机

会也丧失了。错误一旦犯下就无法挽回，可持续的产业就会遭到摧毁，因为过度捕捞已经超过安全线的20%。1992年，纽芬兰岛约有3.5万人因为渔业的倒闭而失业。如果欧盟与它爱争吵的成员国未能达成共识来大量减少鱼的捕捞，同样的命运就会落在许多欧洲的渔民身上。如果他们继续大肆捕捞以致超出鱼再生的限度，捕捞那些可以再生下一代的雌鱼，他们就是在挥霍和浪费高产出的资产，因为只要捕捞稍微收敛并在限度之内，这种可再生资源就永远不会减少。储蓄者都知道，一旦你开始靠生息的资本本身，而不是靠利息收入生活的话，利息就将以指数式减少。如果鱼的储量下降，那么这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就会被摧毁，人类进步过程中食物的紧张就会进一步加剧。

在许多其他的环境问题方面，超越可持续的限度所产生的非线性的影响，会由于自然系统遭到破坏而产生巨大的复杂性而变得更加危险。在《静静的春天》一书中，卡森提请世界关注，自从1945年以来，从喷务器喷出的大量有毒的雾气给世界造成的越来越多的恶劣的影响，像DDT这类农药散发出的有毒、有害的残质，会打破生态平衡。她指出，对喷雾农药功效的相信是由于低估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效应限度的重要性造成的。害虫有它的天敌，但农药把害虫和它们的天敌都杀死了。而且农药的使用会加速一些具有抵抗力的新的超级害虫的进化，这些害虫没有天敌，会成倍地增加并形成新的大的灾害。但这只是使复杂的生态系统混乱和遭到损害的一个例子。自然是不能抑制的，自然界的平衡是脆弱的，来自外部的冲击会打破这种平衡，而新的自然的平衡却未必是可以预见或像人们企盼的那样。

或许生态系统复杂性所隐含的最令人担忧的危险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迄今为止,全球变暖速度并不快(本世纪增加了0.6℃),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也不快。国际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在1995年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0.8℃~3.5℃。据估计,这将导致海平面上升1.2米,尽管最近IPCC估计,海平面上升还不会那么快。在确定全球气候变暖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巨大的复杂性,使人们很难准确地预测全球变暖的程度会有多大。大家知道,温室的气体像二氧化碳以及甲烷会妨碍射线进入大气层从而使气温上升。而二氧化碳的增多是由于汽油的燃烧和森林的破坏造成的。但还有其他许多反应机制。全球变暖会增加水的蒸发并增加云层的覆盖,这会减少阳光的照射同时又储存热量。气候变暖会影响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以及最坏也只不过是海平面上升1.2米的预测,贝克曼在他的著作《小的是愚蠢的》中说,通过大幅削减使用汽油来对经济增长急刹车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更何况这种危险的程度还不清楚,对一些海拔较低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某些太平洋岛屿的可能性的冲击,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即使造成淹没,其代价与全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想法的危险在于它忽视了全球气候变暖过程中许多力量和因素的复杂性和混乱性,从而忽视了非线性混乱反应的危险。我们从爱德华·洛伦兹以及其他人对气候类型混乱的研究(如著名的蝴蝶效应)中可以看出,气候系统或海洋潮流的反应机制所产生的效应并不是线性的,不可能准确地作出预测。这是混乱系统的特点,即使可以用简单的等式做出模型,但是最初的条件只要有微

小的不同就会导致巨大的变化和不同。所以许多科学家认为,全球气温的小小的变化却可能引发世界气候的极大的不稳定。

这些复杂的系统对小小变化会产生敏感的反应。现在又多了一个例子:全球变暖会使世界的海洋潮流不稳定,海洋学家提请人们注意,冰山的融解造成世界上许多低洼地被海水淹没并引起海洋潮流的激荡。而造成冰山融解的因素却很多而且复杂。突出的例子是格陵兰海受到所谓奥登冰山的影响。80 年代到 90 年代早期,奥登冰山迅速融解然后消失,极大地减少大西洋北部深海的范围。科学家们担心这种崩溃会导致墨西哥湾流的弱化(墨西哥湾流是由墨西哥湾向北流至大西洋的水流,它使欧洲西北部的冬天气候变得温和),而且会引发其他激烈的、不可预测的全球气候的变化。事实表明,在上一个间冰期,气候从一种状态突然"转换"至另一种状态是常见的。人们担心,由于海洋水流的变化,全球变暖会造成气候的不稳定,并对我们这个拥挤的星球上的许多地方的食物供给带来极大破坏。甚至可以说,这种相对较小的变化也足以昭示一个新的冰期的来临。经济快速增长正在使我们不断地削弱和损害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引起的效应和后果却是我们无法预见或控制的。尽管我们的科学技术非常先进,但我们仍然不得不在希望与担忧之间徘徊——乐观主义者说,一切总会有办法的;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一切终将超出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影响的不可预测性使人类进步面临极大的挑战。人的理性可以创造新的活动和解决显露出来的问题,却不能预测和避免由于人们对自然界复杂系统的破坏而

造成的危险和威胁。而且,人类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和对付各种不同程度的风险。我们不擅于在短期的不利和长期灾难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喜欢冷冰冰的事实和证据。而举证的责任是由那些想阻止经济增长浪潮或干预自由市场机制的人负的,因此我们只好接受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除非我们能够肯定它会导致灾难。正如卡森引用生态学家谢泼德的话说:"这种想法认为生活的理想应该只是在水面上露出一个头,只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环境恶化限度的一点点……谁想生活在一个快完蛋的星球上呢?"

不确定的问题以及我们直到危险已经显现才采取行动的倾向(但这恐怕就太迟了),常常与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的许多威胁交织在一起。比如,正在毁掉欧洲的森林并毒害它的许多湖泊和河流的酸雨是由离遭受破坏地区几百英里之外的污染造成的,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是由不同国家管辖的。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6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估计,酸雨正在影响欧洲 60%的经济林,每年造成大约 35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对原始山野的植被和草原造成危害。而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协定的限制来加以扭转。比如为保护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树木和湖泊,英国要作出一些牺牲。其中一个协定是 1988 年由欧共体制定的《大内燃机工厂指南》。它定下了减少二氧化硫和氧化氮溢出的目标,因为这些化合物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

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国际环境协定要数 1987 年的《蒙特利尔协议》,它的目标是减少含氯氟烃来防止臭氧层的恶化和破坏。这个协议比较容易执行,因为含氯氟烃主要是从少数大的化学工厂排放出来的,现在它们已开始采取一些成本

较高的净化措施。但是，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溢出的协定的执行情况却令人担忧。危险非但没有减少，而且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在燃烧矿物燃料和石油。而且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消费增长很快，虽然目前他们只消费此类资源的一小部分。如果要在全球实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那么发达国家必须大幅削减才能使发展中国家增加消费。起点的不同意味着在不同国家进行可持续的气体排放的再分配这个棘手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种不同不仅与不同的收入水平有关，也跟不同的燃料使用效率有关。在 90 年代中期，日本、瑞士和法国的人均收入比美国高，但这些国家燃料的使用效率更高，所以人均的废气排放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高水平的燃料使用效率难道不该让他们免于燃料的进一步削减吗？实际上，是美国最不愿意接受减少碳化物排放的强制性措施。

达成国际协议来解决许多迫切的环境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这也可以创造一种合作的空间和框架，避免出现有些国家“挥霍无度”而有些国家则“勒紧腰带”。在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环境下，那些自愿采取自律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的国家，往往会在竞争中输给那些滥用环境和资源的国家。只顾追求个人私利便难以保证避免不必要的环境的恶化。

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概括避免各种各样环境恶化以及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的必要，那就是对公共草地的类推（村民使用公共的草地来放牧牛羊，从而导致 18 世纪这些草地的消失）。这些公共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使用这些草地是免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公共的环境所

提供的舒适如海洋、森林和我们呼吸的空气与那公共的草地作类比。它们的共同点是这些环境条件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经常也不要求他们作贡献来维持或保护它们的未来。实际上也不可能真的使人们不去利用它们。结果,每个人都自私地不断地增加他们对免费的或公共物品的使用,直到有一天这些物品不能再给他们提供任何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将以这种方式导致对公共资源和环境的过分开发,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每个人在使用某一特定的公共物品或环境时会诚心想避免它的逐步恶化。但如果大家没有合作精神,就无法避免它的恶化。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道德或法律(对于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则需要国际的协定)来保证进行合作,人们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冲动会导致对公共物品的开发以越快越好为准则,直到这些环境或资源遭到摧毁;或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出现有的人滥用别人自律而保护下来的环境和资源的现象。这种自私的行为会摧毁公共的环境和资源,这种效应被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称之为"公共物品的悲剧"。我们可以从欧盟在捕捞问题的争议上得到一些相关的解释。欧盟规定了限额以期管理和调节"共同的"渔业资源,防止过度捕捞,但某些国家渔业部门短期的利益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却拒绝大幅减少在他们领海内的捕捞,也不愿意减少他们的渔艇,这样渔业资源就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鱼的储量的下降往往归咎于那些替罪羊,像英国的"限额蝗虫",而英国渔民则认为西班牙的渔船应按法律规定被卖掉。敌对和不信任削弱了必要的合作。当然更糟糕的是,规定的限额很难执行,并可能通过地下经济而得以逃避。自私的短期竞争和缺少真正的合作将导致公共资源的最后耗尽。

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与人口、资源耗尽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相联系的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成本的增加。要理解这些成本增加的原因，单单分析科学、技术和国际合作在对付日益扩大的规模和人类经济活动的速度的失败，以及复杂的生态系统遭受损害所造成的不可预测的后果是不够的。因为环境问题的普遍存在也是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失灵而造成的。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我们日益关注环境遭到破坏这一问题，但是自由市场机制并没有完全满足我们在这方面的偏好，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环境成本以及我们对环境的偏好的表达是市场机制所无法调节的。污染和环境恶化，用经济界的行话来说，常常是“外部性”的东西。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它所涉及的成本（或利益）并不在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造成人们不愿看到的污染或环境恶化的企业知道，这些不良影响并没有反映在它们实际成本或商品的价格中。所以，市场机制并没有迫使他们把环境的成本计算在内。比如说，一个工厂的老板之所以继续采用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浓烟飘满天空，损害周围地区居民的肺部健康），是因为这样做的成本比他转向较少污染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成本要低得多。尽管这些污染造成的代价被第三者如附近居民强烈地感受到了，但这些“外部性”的成本，在纯粹的没有管理的自由市场条件下，是不会反映在工厂自己的成本里面的。所以工厂就不会想要制止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污染并不反映在市场上，其价格几何也无从计算，因此，自

由市场并没有为减少污染提供一个激励机制。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这看不见的手只是在理论上可以导致通过市场表现的那些偏好得到最有效和最优化的满足。个人是根据市场价格发出的信号来作决定的，如果价格不能完全反映有关的偏好和成本（像外部性中的这些），以个人利益为原则的市场参与者在作决定时就无法对可以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事情再作什么贡献。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意味着个人会权衡在市场交换中个人的边际利益和边际成本，然后竭力实现个人纯利润的最大化。由于存在着外部性因素，所有的社会成本——包括外部的和通过市场表现的社会成本——并没有全部反映在有关市场交易的参与者的个人成本或利益中，这样，对个人利益的理性的追求并不会使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正好相反。比如说，空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不是落在制造污染者及其顾客的身上，而主要是落在周围居民身上（比如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那么总的社会成本就会大大超过从这些会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中所得到的社会效益。但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说，那些生产者还会继续制造污染，只要他们的个人利益超过了他们个人所付出的成本。除非外部成本（和利益）可以通过税收、法律责任等反映在他们个人的成本（和利益）上，制造污染的生产者才不会对产生社会成本的这些外部因素视而不见。因为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里，制造污染的企业如果把外部的成本考虑进去，并采取利他主义寻找一种没有污染但更昂贵的生产设备，那么它显然要处于劣势并在竞争中输给那些少数肆无忌惮的企业。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规模的扩大，我们这个星球越来越拥

挤，环境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以及再生的能力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和破坏。过多的活动会导致拥挤，污染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损害，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会使可持续性发展变得不可能。许多小规模的没有负面影响的活动在其规模扩大时就开始严重地影响别人的福利。经济增长可以增加人类活动的相互联系和经济主体的相互依赖，因为它可以通过加剧环境的危机来使那些没有直接参加交易的人也强烈感受到市场活动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样，经济增长就会使环境等外部性因素的重要性更加显露出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总的社会成本与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的经济交易的总的个人成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结果，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市场价格就变得不那么能反映总的社会偏好了，而变成了只能反映自由市场中个人偏好的满足，而个人偏好的满足与社会总偏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我们这个环境日益恶化的世界，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将不再是人类进步的引擎。零星的个人经济决策都不考虑外部性成本，总有一天，总的外部性成本会发生悲剧性的爆炸，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这叫作“零星决定的悲剧”。

外部性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它们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寻找办法减少这些外部性的难易程度。外部性最简单的形式，可以是当地个人行为效应的溢出。比如，如果我选择在我的花园里再建一座小房子，这就可能遮住我邻居的花园，对我自己来说，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我不必考虑我这种行为的负面影响。这种当地外部性很难通过“所有权”而归入市场机制。但假如我的邻居有权不被遮挡，那么我就得给他以足够的赔偿，使他心甘情愿被遮挡——只有这样我才能在花园里再盖一栋

房子。这样,我的行为的外部性成本就完全变成了我的个人成本。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外部性成本已经“内部化”了。但是要在市场机制内建立这样的所有权来促进外部成本内部化却并非那么容易,因为有些外部性是弥漫的或具有渗透性的。比如说,农民为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决定使用杀虫剂,但这样做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刺激新的抵抗力强的害虫的出现。或者当农民过多使用化肥来增加产量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水遭到硝酸盐的污染。但所有这些,在一个没有干预和管理的框架内,人们不会去考虑他们活动的社会成本与他们自己个人成本的巨大差别。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所有权来使那些遭受影响的人们避免这些外部性因素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飞机造成的噪音污染也是这样。一般来说,这种外部性成本并不反映在航空公司自己的成本当中,但要根据“愉快舒适的权利”来使噪音污染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反映到航空公司的成本中去却是不可能的。即使法律上要求它那么做也是无法操作的。航空公司无法去赔偿和满足那些受到噪音污染的人们的要求。

雅各布在他的《绿色经济》一书中指出,外部性常常是与“公共的场所”(如海洋)相联系,这里所有权根本不存在;或者与“公共的物品”(如洁净的空气)相联系,这时所有权更无从谈起了。公共的物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很难叫人不去用它。而且那些纯粹的公共物品与其他商品不同,它被某一个人消费了并不会减少别人的消费。所以我们可以尽情地呼吸洁净的空气,或者在海上看看灯塔(另一种公共物品),而这并不影响别人的享受和欣赏。结果公共物品很容易受那些为所欲为的挥霍者的攻击和破坏。如果有人要我为更洁净的空

气，或者为维护灯塔，或者为保护鱼的储备等掏腰包，我显然会拒绝，因为不管我付不付钱，我都可以使用它们。我并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别人付了钱我还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它们。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这么想，自由市场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差劲的管家。所以这些职能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由私营企业来行使。

公共物品的性质对理解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最为关键。政府干预可以减少外部性的影响，如污染、拥挤或资源的损耗。比如，一个渔民在一个已经过度捕捞的海区打鱼将给所有其他打鱼者带来外部性成本。由于他的过度捕捞而造成的资源损耗的代价将由他人而不是他自己承担，而他自己可以独自享受他现在所捕到的鱼的好处，利己的念头将促使他继续捕鱼，即使这么做的总社会成本远远超出他个人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希望别人自律而自己滥用的冲动，以及不相信别人的动机的倾向，意味着只有政府强制实行数量限制、管理或税收才有可能扭转这些公共物品悲剧的命运。一般来说，无法建立一个市场机制来协调有关各方的行为以防止资源的损耗，也不可能规定一个最佳的捕捞水平。因为鱼不属于任何人，价格只反映对鱼的需求和捕鱼的成本，它们都未必与可持续的供给相联系。过度捕捞是危险的，只有当自由获取公共物品的权利被限制，或最大捕捞数额由政府制定法规并强制执行或由所有者垄断的时候，鱼的储量的损耗才可能得以避免。

公共物品如洁净的空气，由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人人可以享用，因此不可能把它私有化。正如无法出租一定体积的空气，因此也无法让自由市场本身来决定污染空气该出多少钱，也无法确定净化空气所需的代价该由那些呼吸空气

的人出多少。保持纯净的空气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只有政府能够防止过度的滥用。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密自己也认为，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来管，虽然在18世纪他不可能预见有多少公共物品需要保护以对付市场活动所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如果要避免环境的灾难性后果，自由市场必将不断地需要政府的干预，来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的框架以利于自由市场的安全运作。但如果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保护的话，政府可以使用一些“市场”的工具来帮助管理它们。比如，政府可以让私营的公司代表政府来管理，并劝阻企业和个人减少环境的外部性成本，不单单用法规，而且可以采用市场的手段，比如征收(反映污染的实际社会成本)污染税。

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在较多政府干预的国家，确实使用许多这样的方法来保证环境恶化的社会成本由那些使环境恶化的企业来承担。有时政府通过法律来管理甚至禁止污染的发生或资源的损耗。比如，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在1956年出台的《洁净空气法案》，禁止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烧煤，从而大大减少了烟雾和粉尘颗粒污染。一些政府还制定限量，即制定可接受的最大污染限度，并把指标分配给制造污染的企业。当然，禁止和限额是对自由市场的极大的管理性扭曲，虽然总体上可以减少污染(或资源的损耗)，但可能导致次优和低效的解决方式，比如某污染企业可能为社会和自己创造很高的利润，只要总污染水平可以接受，而且能使另一个污染企业(其为社会创造的利润较少)大幅减少污染，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继续让这一高污染企业从事其生产显然是有利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许多政府资助的计划都试图寻找经济学的行话所谓的“使外部性内部化”的办法，力图让市场来决定哪一

种方式可以最有效地把环境恶化减低到可接受的程度。一种计划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征税(如二氧化碳排放税),来反映污染或资源损耗的全部社会成本。如果这些税收可以反映环境遭受破坏的实际外部性成本,那么有关个人或企业就会看到他们的企业生产成本与社会成本联系在一起。只要这样做的好处超出他们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他们便会有强烈的动机来使其生产活动达到最佳状态,即继续制造污染或损耗资源。另外一种方法是允许把限额分配给公司来交易,这样市场可以有效地把它们分配给最有用的生产者。这种方法可能比税收体制更好些,因为政府可以确保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像税收一样,可交易的限额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机制来更有效地限制环境的恶化,那些容易做到的企业,可以通过把限额卖给那些需花很大代价才能限制环境恶化的企业并从中获利。

这些方法确实可以帮助减少污染的过度制造和其他外部性成本,但我们使用这些方法来纠正市场机制的能力,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税收或限额这些规定的制定往往是很复杂的,难以制定也难以执行,而且可能使企业陷入官僚制度的泥潭中去,特别是在可交易的商品部门更是如此。因为如果受到管理或征税的企业与其他国家没有遭受类似管理或征税的企业竞争的时候,前者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并将失去一定的市场份额,这是不公平的竞争。若要做到既公平又有效,那么这些管理或税收征管就应该是国际性的。但要签订这样的国际性协定显然是不可能的。另外,通常也很难为环境的成本定一个价,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经济活动所不应超越的环境的限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显著的例子,即汽车的使用对环境恶化的影响来探讨其中的难处。

环境经济学家米山说，汽车的发明“可能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大的不幸”。许多不怎么激进的人士反对这种看法并指出，小汽车大大增加了流动性，赋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和隐私。但毫无疑问，那些买车、开车的人给社会造成的许多外部性成本并没有反映在他们个人付出的成本当中。1995 年欧盟委员会的绿皮书《实现合理和有效的运输定价》则包括了这些成本的不同测算。在欧盟各国，道路运输每年吞噬约 5 万人的生命，使 300 多万人受伤。绿皮书估计，这些交通事故造成的外部性成本达到欧盟 GDP 的 1.5%，而且，拥挤——另外一个主要的外部性成本——也有上升的趋势。因为出外旅行的人增加得很快，远远超过现有的道路空间所允许的程度。如果额外增加的人们决定使用某一条已经近乎堵塞的道路，那么这些人的加入就会对所有其他使用该条道路的人的车速起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但个人只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只要总利益大于他这么做的成本，他还会照样让他的车在这条道路上行驶。他不会考虑他这么做会不会同样使总的社会利益超过总的社会成本。据估计，道路拥挤的总的外部性成本已达到欧盟 GDP 的 2%。其他由道路交通造成的外部性成本还包括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有人估计，仅英国每年就有 6000 人死于来自道路交通的空气污染，并导致将近 200 亿英镑的外部性成本。欧盟文件没有对其他的外部性成本进行估价，如由于道路扩张对自然景色的破坏，摩托车对城镇、乡村的社区凝聚力的破坏，如果要对这些因素作一个客观的令人满意的货币估计，更是难上加难。

汽车运输的外部性成本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无法限制它们。道路运输的问题反映了我们前

面已经讨论过的关于大众的悲剧和个人的决定所造成的悲剧的许多特点。没有人会愿意让我们的生活被交通拥挤、噪音污染和事故所主宰。由于这些成本大多是在市场之外的，不是车主所要承担的，而且这些是许许多多个人决定汇总而成的，因此不能说人们是有意要造成这些不良后果。但人们又是利己的，不愿意自我约束，除非某些特定的道路使用者能够肯定其他人不想去旅行。因为社会成本已经超过了社会效益，否则他们还是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滥用公共的道路、空间和空气。

最近，有的国家政府通过制定规章来限制汽车使用的外部性成本并着手寻找办法，比如，征收各种污染和拥挤税来保证开车者为他们的车付出更多的代价。新的规章要求在车内安装催化转换器并在发动机上安装减少噪音的装置。在税收方面，许多研究已经进入关于道路使用定价以缓解拥挤。但问题在于不仅要准确估计道路拥挤的成本价格，而且要做到：在道路非常拥挤时如何向道路使用者要更高的价，而在不拥挤时不向他们要价。同样地，根据汽车排放的实际污染量来征税，在技术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尾气排放量的多少取决于发动机的性能、车速和周围的温度等等。或许最有效的减少外部性成本的办法是对不同种类的燃料油征收不同的税。一个研究表明，每公升燃料油的边际外部性健康成本相差很大——柴油每公升 84 便士（柴油是致命的粉尘颗粒的制造者），每公升加铅汽油 43 便士，无铅汽油每公升 9 便士。但现在，柴油已经逃脱了额外的污染税。税收的差异只是在促使人们从使用加铅汽油到无铅汽油上发挥一点点作用。不同税收未必反映确切的外部性成本的相对价值。但课税程度应大

到足以让车主使用比较不会制造污染的汽油。在许多情况下,税收收入可以很有效地用来提高不同税收征管的效率,比如可以对生产或使用较少污染的汽油的企业或车主进行补贴。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使外部性内部化的复杂的计划,想尽量减少总社会成本与那些反映在市场价格上的成本的差距,但是技术上、理论上的困难还是最大的障碍。而且我们很难决定可接受的污染或资源损耗水平到底该怎样。不仅因为它是个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且还因为现实中这些决定面临许多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二氧化碳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不知道硝酸盐大量溶解到水中后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也不知道用在牛身上的人工激素是否会影响人体健康。另外,即使我们可以预测我们活动的效果,但也很难准确估计它的价值。

由于它们的这些性质,外部性成本很难用现在市场的价格来衡量。市场价值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比如,估计人们"愿意付钱"的调查或企图估计在市场交易中表现出来的有关偏好。比如,经济学家想通过比较机场附近遭受噪音污染与其他地区没有受噪音污染的同一类家庭的看法来估算没有飞机噪音的价值有多大。但所有这些手段都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很难估计那些远离决策过程的人们对环境舒适是怎么看的。许多环境问题超越国界,而且对未来几代的人都将产生影响。比如在考虑英国核电站硫磺渗漏的外部性成本的时候,必须考虑德国和瑞典的人民对其森林、树木的价值是怎样估计的;另外不仅要考虑现在的德国人、瑞典人的看法,而且要考虑未来几代的人将因为我们的污染而遭受什么样的不良

影响。而且许多人认为，环境恶化的某些形式，比如动物种类的灭绝、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或秀丽风景的破坏，这些是无法用货币的价值来衡量的。事物的美或其内在的价值与工具性的功利价值存在着冲突，而这给成本和利益的计算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国会必须裁定在一些特别的森林里巢居的猫头鹰的价值，与这些森林砍伐下来作木材用的功利价值哪个更大些。正是由于这种价值的难以估量，引发自由市场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的激烈辩论。在一个喜欢量化和准确答案的时代，惟一可以听到的语言就是要么完全肯定要么完全否定。这似乎过于简单化了。

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机制的最大的失败是它无法考虑未来人们的利益，甚至也无法考虑在现有市场之外的现代人们的利益。市场具有一种强烈的短期倾向。虽然价格机制可以保证现有供需的均衡，它未必会使这种均衡的机会在未来也达到最大化。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与未来的人们对快乐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另一个原因是，未来的人们不可能在现在的市场上出价。即使这一代人声称他们关心其儿女未来的命运，但他们的关心与那些小孩本身对其命运的关心却是不一样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市场经营者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供给与需求，那么其中一些人就会愿意为明天的利益而在现在付出代价，这样价格机制就会开始把今天的消费者挤出去。而实际上，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不仅未来的供求状况是不确定的，而且所有未来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或命运都是不确定的。

我们可以以油价为例来作一个说明。油价只能部分地反映未来的供求情况。油价确实有一个期货市场并允许这个市

场通过价格来反映未来预期的供求关系。但油价的期货市场有其局限性。它无法操作未来几年的期货合同,因为那么多年以后,不确定性太大,因此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愿意现在就订一个特定的价格。即使拥有资产的石油公司也不会重视考虑10年以后的石油生产。毕竟未来的市场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未来哪一天可以无限制地获取核电力或廉价的太阳能,这样就会完全改变对石油的需求,价格机制本身不可能保护未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是家政的敌人。

即使在不确定性较小而且社会愿意考虑未来人们的利益的情况下,市场要根据今天的成本或效益来确定明天的成本或效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这就是把未来的成本或价格"折成"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净现值"。为了决定今天的成本对明天的成本的功效,市场参与者(包括政府)通过把未来成本转换成相应的现值来进行比较。为此他们使用了折扣率,即假定一个在一段时间内现金的平均回报率。比如假定现在清理污染的成本是100万英镑,而50年后清理污染的成本要多一倍(扣除通胀)。再假定这段时间的实际利率是5%。扣除每年5%的利息,50年后的200万英镑只相当于现在的17.4万英镑(换句话说,17.4万英镑如果以年息5%去投资,50年后就可增值到200万英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折扣是完全理性的,并且是符合任何一个作理性的长期投资的决策者的想法的。但是,这个例子中所假定的5%的高回报率是建立在未来50年会有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和高投资回报率的前提之上的。为此,我们得出结论,(经过通胀调整的)在50年后拿出200万英镑比现在拿出100万英镑会更

容易，假如在这50年中经济能高增长，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种方法，用经济学家戴利的话说，是混淆了现在趋势与未来命运的界线。环境学家们对这种经济可以持续高增长的假设深表怀疑。但为未来保存资源或为未来预先付出更高的成本，用现在的价值计算显然是昂贵的，因此也是不理性的。把数学的折扣方法用于市场机制和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再加上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讨厌以及人们更喜欢使现在的每一天过得快乐的想法，都使得要同时满足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的要求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造成人们不喜欢用折扣率来估算环境恶化的价值。首先，即使未来的人们会更加富裕的假定是对的，但这与我们现在正在挥霍的而且是无法替代的资产，如风景区、野生动物和雨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都不太可能再创造出来，或寻找可替代的东西。即使未来的人们会更富裕，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可能不关心这些不可替代的资产的消失。事实上，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人们对环境的质量会看得更重而不是更轻。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可能对子孙后代造成的损失打折（低估），而应该把它放大（强调其危害性）。其次，折扣法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果实将为那些遭受环境恶化的人们获得，这在很多情况下未必是真的。因此，许多环境学家认为，与其通过作一些毫无根据的关于子孙后代的价值观、利益和困境的假设来推算我们的所作所为将给他们带来的损害，还不如尽可能地保护我们的遗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毫无愧疚地说，我们没有在滥用或挥霍那些对子孙后代的发展和进步至为关键的环境资产。

确保未来子孙后代能公平享用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方法

是看看我们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储存，即上代人传给我们的地理资产还有多少，我们是把它用光还是传给子孙后代。像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可能在两个方面非常有用：首先，它可以通过扣除经济增长中环境的损耗成本来更正 GDP 统计数字。不是把资源的开发看作 GDP 中的产出，而是把它看作地理资源的损耗。这应该归入成本，因为我们的资源储存越来越少。其次，它可以为资源损耗的外部性内部化提供一个参考数据，比如在资源的价格上作出一定的调整以反映资源的损耗对子孙后代的成本。我们可以制定税收或限额的标准以确保资源的现价能反映被用掉的资源今后不得不用其他来替代的成本。以石油为例，政府需要制定税收或限额，而且它们应能反映子孙后代用风车或太阳能发电站来替代被耗尽的石油资源所需花费的预期成本。

当然，这个计划会涉及许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如对资源替代成本的未来价值的估算。另外也不可能达成一个提高资源价格的国际性协议，来为子孙后代多保留一些资源而牺牲现在人们的利益。而且，这种方法对于不可替代资源来说也无济于事。另外，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重新定价政策之所以很少得到环境学家以外的人士的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认为“生态系统将遭毁坏”的人士说狼来了已经说过很多遍了。罗马俱乐部这个环境学会在 1972 年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限制》的报告，该报告预测到 2000 年，据现有的储藏和需求状况，人类将用完许多基本的矿藏。1973 年的石油危机，虽然有政治上的渲染，却使上述的结论增加了分量。汽油配给票发到英国的每家每户，好像西方国家的物质繁荣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人类好像已经是在依托那么一点稀缺的并将快

速消失的资源而勉强生存着。但是 1972 年报告所说的几乎每一种资源，现在所知的储量都比 20 年前多得多。比如石油，尽管 1970 年以来经过大量的消耗，现在的储量也比当时所知的储量要多。生态悲观论者误解了储量的性质，以及消费、储量和价格机制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高的价格既可能导致较低的消费或寻求代替品，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开发。没有一个企业会去费心开发两三代以后才需要的资源或生产成本比现价要高的资源。一句话，低估短缺和价格机制在保证采取补救的措施来保护或增加资源方面的作用肯定是错误的。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例子来证明环境主义者是过分夸大了市场失效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机制严重的局限性及其使环境激剧恶化的方面。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反映像污染、拥挤和资源损耗给社会带来的外部性成本。它也不能完全反映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为纠正自由市场机制而采取的措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难以说得通。在全球日益变暖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复杂性和限度效应使人们在预测未来的生态状况或供需关系方面更加困难，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对付环境问题上市场失效的例证更说明了保持强有力的社会道德，以及建立更具活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像污染这种外部性，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而社会就是这样。使现代人们的市场偏好最大化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良好的社会结果。一句话，自由市场机制不足以确保可持续的人类进步。

调停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

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环境对人类福利事业进步限制的程度也增强了，这令大家都很懊悔。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当我们挥霍了过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超越了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限度后，我们的经济就会越来越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可以这么说吧，如果经济增长的好处是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当我们变得富裕的时候，额外的财富对我们的福利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而经济增长的边际环境成本（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子孙后代）在增加，那肯定会降低追求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增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与福利的增加密切相关，假如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开始超过边际收益的话，便有可能成为负相关。因此，经济增长将有可能不再是人类进步的引擎，反而对人类进步起致命的阻碍和削弱的作用。可持续的人类进步确实要求放弃为了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某些政策。

但是对绿色革命所倡导的“不增长政策”还是有很多强烈的反对意见。一方面，污染在那些贫穷的国家非常普遍，而且造成很大的危害。富裕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减少污染，净化河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实行《洁净空气法案》和禁止烧煤，英国的城市现在比50年代干净多了。排在世界最富国行列的德国和瑞士，其环境保护做得非常好。就污染来说，零增长也许是有碍生产发展的。但俄罗斯经济十几年都是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其污染却十分严重。因此它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解决污染问题。而且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公平分

配的问题。西方评论家们说增长对全世界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因为环境在日益恶化。但问题是他们能否提出一个有关现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重新分配的方案,来帮助那些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人们?这些好处包括净化当地环境的能力。据估计,发展中国家有7亿人在遭受由于不通风的炉子而造成的室内污染,有10亿人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另外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城市,以及大约一半住在小镇里的居民,其周围几乎没有环境基础设施。现在,人们不仅对两代或数代之间的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漠不关心(即我们是否留一份公平的资源份额给子孙后代),而且对同时代人的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也漠不关心(今天的贫穷国家是否得到公平的资源分配?)。如果认为不同代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必须以减少同代人之间的公平分配为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论点是:环境恶化应归咎于最富的五个国家和最穷的五个国家。这些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不可再生资源,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如此;而最穷的国家都由于滥伐森林和水土流失而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由于生存的需要,饥饿的农民在过度开垦剩余的土地,砍伐幼林,从而减少了未来可持续增长和进步的机会。在这些情况下,贫穷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公平地进行分配,那么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无论从福利还是从环境的角度看都是非常有益的。在这些方面,人类进步显然是有赖于经济增长。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显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边际环境成本甚至有可能是负数。鉴于全球环境因素的抑制,与贫穷的第三世界(发

展中国家)相比,富裕的西方国家已经不那么需要经济增长了,所以第一世界应该考虑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腾出空间让第三世界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毋庸置疑,民主的西方国家政府肯定很难同意这种办法,因为有那么多的选民仍然在渴望着更多的、潜在的未来增长可能带来的利益。西方国家只是许诺在本国国内进行更公平的再分配,使富人的需求减少一些而使不那么富的人的需求增加一些而已。说实话,在实践中,西方也很难采用有意识的低增长政策,因为在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下,西方正在与许多快速崛起的低成本的生产者进行竞争。

显然,追求经济增长仍然是西方政治上的需要,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改善福利状况的需要。但很重要的是,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办法来提高增长过程中的环境的效率。除非我们能减少环境的成本,否则将无法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两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使这个问题更加一目了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但每年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将近三分之一。假如世界都像美国这样消耗资源的话——除非增长的环境效率得到改善——那么全世界需要消耗的资源将是目前的六倍。即使不是环境学家也会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地,现在世界上只有8%的人有小轿车,如果印度、中国和非洲的人们也像西方那样依赖车的话,那么环境的恶化将令人难以忍受。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会再次拯救我们,就像过去那样。比如,趋光性电池和风轮机技术的巨大进步,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很廉价地通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光和风来发电,而现在仍然主要是靠会产生污染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和煤来发电。由于有充足的电力供应,我

们还能够以电解水来更经济地制造可携带的氢，而由氢驱动的汽车既无噪音又无污染，可谓好处多多。但是人类从能源限制中解脱出来却喜忧参半。一方面它可以使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如金属）不断回收利用，无限地、可持续地利用到未来；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扩大经济活动的范围并加快经济的发展，但也有可能引发与环境限度有关的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可无限利用的能源本身并不能解决废物、废气的污染，拥挤和食品短缺等问题。

当然人们可以用以上提到的以及其他方法来改善增长的环境效率，纠正自由市场经济的失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应保证污染的成本由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个人来承担。我们应为能源制定一个可以反映其未来价值的价格来减少目前的资源损耗。我们可以想出把增长成本和代价考虑在内的更加准确地衡量经济增长的方法，并制定真正的以福利的持续增长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应尽力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因为发展中国家经常为获得偿还债务所需的外汇而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和过度开发农田来种植出口的农作物。西方国家也应通过援助的方式把一些环保技术以较低价格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用专利进行保护。同时，也应该制定全球性的环境标准协议。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中，高污染和能源损耗多的工业会移往环保要求低的地区。应该建立国际法规，以免贫穷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倾销废物和掠夺廉价的不可替代的资源的场所。也要防止那种因为要实施环保而导致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环境效率，但这些措施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并进行操作是很困难

的。比较而言，现代的全球自由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明显的优点就是过于简单，它并不要求全球的合作，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的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你的雨林就是我的氧气；我现在多消费了不可再生资源，你的子孙后代就得少消费。像所有的公共物品一样，我们只有通过合作，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才能拯救我们的地球。正像所有的公共物品一样，我们地球的命运要得到那些肆意滥用别人自律而腾出空间的人们的怜悯，没有人想多付出成本。如果我们想解决环境危机、提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水平，就必须设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到底是人们可以更好地合作以捍卫我们人类的未来，还是恶性竞争最终毁掉人类的未来，人们对此仍抱极大的怀疑甚至悲观。

第九章　徒劳无益的无休止的竞争

我承认，那些认为人类的正常境况就是争斗的人所谓的理想生活，我并不喜欢；我不认为现有的那种互相践踏、互相推搡、彼此倾轧的社会生活方式是人类能够指望的最好命运，或者是工业发展的某个阶段的一种正常症状……对人类天性来说，最理想的处境应当是这样的：人们既不穷，也不需要变富，更无须担心被往上爬的别人挤到后面。

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对于下层人来说，富人的所有物不是小玩意，而是刺激他们日复一日辛苦工作的东西——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企及的欲望目标。

F·赫施，《发展的社会限制》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确定的社会福利越来越

少,更不用说快乐了。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不仅要分析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在对付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上的失败,同时我们还要分析科学理论在有效控制复杂的生态系统上的失败,及预测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带来的负面效应。本章首先要探讨为什么传统宗教和哲学会认为追逐财富的竞争是徒劳无益的,然后分析为什么现代人对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好处却滋生起一种失望的情绪。我们想解释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闲暇和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反而使我们更加自私和贪婪。我们还要分析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在不断增加的原因。

这些社会成本中有许多代表着美好生活的一些关键的非经济因素的恶化,如闲暇、独处、和平与安宁、良好的亲子关系、社区精神以及免于重压和不安的自由。由于这些美好生活的因素不属于正式的市场领域,也不列入一般的经济分析家讨论的范围,它们往往被包含在对经济增长的匆忙的追求中。因为在我们这个科学和数字的时代,那些不正式列入市场机制计算的成本和收益并未被认真对待。如果未经衡量的非市场的社会成本的边际增长速度确实快于收益的增长的话,那么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从福利的角度看,则是有害的。另外,即使在适销的产品和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偏好的范畴内,现代经济也往往只是创造新的需求,却并未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尤其是在这个日益拥挤的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居民们对那种只有高层的相对富有的人才买得起的商品也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从这一点来看,至少可以说,经济活动在总的水平上是越来越徒劳无益了,因为一个人相对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另一个人财富的损失。正如我们在本章所要探讨的,不断

上升的相对财富而不是绝对财富的重要性保证了在总的水平上，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会增加总的社会福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的弊端已经为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规定所证明，这些规定是为了抵消为获得相对进步而日趋激烈的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有许多人一直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令人厌恶的甚至是错误的。基督教的教义告诫我们要把精神和道德的需要放在肉体的需要或对物质进步的需要之上（“你们不可能同时为上帝和财富服务”），并认为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会不可避免地排挤人们对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境界的渴望。从这一点来看，对财富的追求与道德进步以及对永恒的拯救的追求是不相容的，《马太福音》（第19章）中很有名的一段这样写道：

> 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变得完美，去把你所拥有的一切卖掉，把它们分给穷人，你就会拥有天堂里的宝藏：跟随我来吧。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听完后，他忧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后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跟你们说吧，富人很难上天堂的。我再对你们说一遍，一只骆驼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上天堂容易得多。

在古代异教徒的世界里，许多思想家也赞成禁欲主义者的教义，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将导致挫折和不幸”。比如伊壁鸠鲁和他的信徒认为宁静和免于焦虑是快乐的关键，而这要通过减少人们心中的欲求才能得到。

但这并不是他们信条的全部;他们认为幸福来自于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而不是对快乐的最大限度的追求。享乐主义者们极力避免带有竞争性的活动,并深信试图去获得巨大财富是不明智的,因为许多焦虑产生于你赢得它后还要努力保住它。对他们来说,财富和政治野心只会带来失望和挫折。享乐主义者认为肚子的满足和友情带来的简单快乐所赐予我们的才是实质上的快乐。卢克莱修在公元前1世纪这样写道:

> 如果一个人能运用真正的哲学来指导其生活,他将在有着宁静思想的简单的生活中获得满足,有了这一点,他永远不会变穷。人类向往名利和权力以期其命运可以依赖于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在富足的享受中度过和平的一生。好一个闲适的美梦!在通往权力巅峰的奋斗途中,他们被危险围困。然后仿佛一个晴天霹雳,他们被妒忌从权力的巅峰抛进了污浊的深渊。因为妒忌和雷电一样总是打击最高和最突出的部位。

早期基督教的极其纯洁的禁欲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为免于心灵的宁静被打搅或招致别人的妒忌,应避免任何在财富和影响上高人一等的企图。这种教义在一个怀念简单、拥有美德、不贪婪、家庭和社区紧密团结地生活的时代里找到了回应。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时期的诗歌里,人们不停地描述以唤起简单的田园生活和农夫在宁静的乡间耕作的意象。这种意象与富裕但道德沦丧的都市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诗人

后来都把这种怀旧的语气以及物质进步带来的道德这一理论与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联系起来，这个事实就是，死亡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对于许多人，我们平凡的命运是对世俗野心的嘲笑，同时也表明，对物质贪得无厌和无休止竞争的最终失败。18世纪托马斯·格雷在他的一首诗《乡村教堂的挽歌》中，用拉丁语怀旧的诗体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画，表现了自给自足的、简单淳朴的农村生活。

别让野心嘲笑他们有用的劳作，
　　他们的天伦之乐和默默无闻；
也别让野心用轻蔑的微笑，
　　瞧不起穷人短暂和简单的生活。

勋章的夺目，权力的荣耀，
　　所有的美，所有的财富，
最终却是，同一归途，
　　荣耀的路向坟墓延伸。

后面的几行已成为不朽的诗句：

远离尘嚣众生卑鄙的争斗，
他们那朴素的愿望从未改变，
沿着生活中静静的山谷，
保持一份超然的心态。

一个世纪之后，一位在其著作中流露出对哲学与经济进

步浓厚兴趣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有一章以"固定的状态"为题。在此章节中，他希望经济进步终有一天会让位于"固定的状态"。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和其他人所认为的这种状态将是穷人更潦倒。相反，他坚持认为，在富裕的国家里，财富再分配比增长更重要，人口控制是比追求进一步经济增长更有效地达到消除贫困目的的途径。在对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竞争活动带来的不快乐表示一番痛惜后，穆勒写道：

> 虽然充足的衣食供给不成问题，但人口还是太拥挤了。人类时时刻刻与其同类呆在一起，这对人没好处。没有孤独的世界是很可怜的理想状态。孤独意味着独处，对于思想的深入和性格的培养来说是必要的。在大自然的美丽和庄严中形成的孤独是思想的摇篮，是一种不仅对个人有益而且对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热望。在注视这个世界时，我们再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东西。借着发展农业的名义，灌木丛和多余的树被彻底根除，几乎没有为野生灌木和花草留下生存空间。如果无限制的财富和人口增长只是为了支撑一个日趋庞大而不是更快乐的人群，而这种增长又使地球失去大部分能带来快乐的东西，那么，我衷心希望为后代想一想，在现实强迫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以前，让他们能生活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固定状态上。

在穆勒极其浪漫的"固定状态"的观点中，他设想我们的

一切努力是指向精神文明和对社会及道德进步的追求的。它应该使闲暇时间增加，而不能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在激烈的争斗中把时间耗尽。

穆勒在150年前的1848年所预言的“固定的状态”现在还未成为现实。许多诗人、哲学家和牧师不停地嘲讽徒劳无益的竞争，指责只顾财富和物质文明的目标的追求是一种罪过——它使人们整日瞎忙，蝇营狗苟，丧失了美梦。但是，人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在过去的150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物质财富快速增长，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确实促进了人类福利事业的进步。不论我们的活动是多么徒劳无益，道德和精神的进步与物质的进步不是同步的。但是为经济增长而辩护的人们毫不费力地就可以举出一大串的好处，如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医疗卫生、教育方面的实惠，还有下水道、自来水、室内厕所、电冰箱、洗衣机，更短的工作时间和童工的禁止等等。

由于社会各行业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即使是穷人（至少说发达国家的穷人）也能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而这原本只是富人的特权。诚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经济的发展使以往仅限于女王享用的长筒丝袜如今（由于尼龙的使用）成了每个工厂女工的生活用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越来越难以替代大量财富的创造，因为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经济，显然可以保证穷人在虽然无法与其同时代的富人保持同等生活水平，但仍可达到一两代以前的富人们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这种争论已成过眼烟云，因为提高生活水平总比降低生活水平好。人们仍认为最终每个人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不再受极差的居住条件和医疗条件的困扰，每个人都能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能获得以

前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广泛的选择自由。当然，为了得到这些好处，牺牲旷野独居，放弃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和朴素乡村生活的道德认同感也是值得的；当然，普通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邪恶的，也不可能与上帝的教诲相冲突。由于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个人的贪欲得到了约束，带来了普遍利益。

人们常常认为——而这无疑是穆勒不能想到的——额外财富的边际效用正变得越来越弱，而且随着整个社会更加富裕，大多数人都可得到必要的生活享受，这样人们将越来越趋向于用额外财富来换取更多的闲暇，从而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从这点来看，西方社会应早已不再由榨人血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坊组成，而应变得更加温和、友善和文明；由于普通人已可得到以往贵族式的物质享受，他们也应已具备了贵族式的对闲暇的喜好，懂得贵族式的休闲方式。不过，这只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实际的情况是，整个自由市场经济近年来似乎又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吝啬、越来越疯狂的物欲横流的世界。社会上穷人越穷，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和英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开始高于前 20 年的水平，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又反转过来了。目前，美国约四分之一的全职工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9 小时，英国四分之一的父亲每周工作超过 50 小时。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短期工作，必须在假日上班却没有加班报酬。

20 世纪末，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已不再允许工人缩短工作时间去享受更多的闲暇。相反地，安全稳定的工作数量已被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幸保住长久工作的人们其工作时间变得

更长;必要时他们的工作可由临时工补充。因此,节省劳动力的社会进步正在导致生产力成果的分配不当——有的人赚的钱超过了自己的需要,但却没有空闲时间,其他一些人却闲暇过多(以失业的形式表现)而钱赚得少,更有一些人两者都很少。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和对高效的不断追求使许多人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对失业的恐惧刺激着他们全力以赴展开和同事之间的竞争。各行各业的工人越来越感到心力交瘁,感到压力和焦虑。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导致压力和焦虑,因为人们必须努力学习新东西以避免自己的技能过时。工作场所已不再像通常情况下那样维持着联合的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衡,也不再是集体的和家族统治的企业。它可以被描述为一部创造财富的机器,企业各个成员为了生存展开的内部竞争就是这部机器的燃料,各个企业成员要么证明他或她比自己的同事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要么就要面临失业。

技术进步常常会允诺给予工人和消费者更大的灵活性、更多的选择和更高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它常常只是抬高雇主和消费者的期望。譬如,调制解调器和虚拟办公室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灵活性——让人们可以在家而不用去办公室上班,可在夜晚上班而不必早晨去办公室上班。而实际情况却是,人们被迫随时在家和办公室工作。同样,移动电话并不仅仅方便了人们在旅行时接听偶尔必须听的电话,它迫使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随叫随到的状态,随时回来应付工作。所剩的闲暇时间,对许多现代社会的上班族而言,都被消耗在越来越冗长、艰苦的上下班途中,在令人目眩的消费丛林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在健身过程中,在训练馆进行我们机械便利时代认为可以最自然的方式提供的运动中。

人们提出了很多理由，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某些最富裕国家的国民，似乎正慢慢地回复到达尔文所阐述的适者生存的竞争状态，为什么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占有欲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一种最有意思的理论是由福山在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跟尼采一样，他也认为工作的动机大多不在于可满足的物质需求本身，而在于无法满足的因社会地位和竞争的胜利而产生的被承认感。许多人只是不想达到满足的状态，不想成为毫无特点的平凡人，而希望超过别人，获得荣耀。在我们这个物质化的社会里，要达到这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商业成功和竞争的途径。实际上，福山认为，在和平年代，这是咄咄逼人的野心所必需的发泄口，否则它将导致更具破坏力的结果。正如这个理论所说的，人类是一种不安分的、好斗的动物，即使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也不会满足。他生活的条件越优越，他就会努力追求出人头地的荣耀，追求竞争性斗争的胜利。

对于现代经济社会永不满足的欲望的另一种似乎也言之有理的解释，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根据这种论点，动机总是基本上与物质息息相关的，但由于工业能量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营销和广告上了，新欲望产生的速度几乎与旧欲望得到满足的速度一样快甚至更快。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著作《工作的尽头》中引用了2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查尔斯·凯特林的言论："经济繁荣的关键是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感。"通用汽车公司在其早期每年都改变其模式，它使工人不会满足于旧模式。每个父母都能通过广告的最原始效力认识到这一点，孩子们总是希望最新版的、最先进的玩具，或最新款式的运动鞋，但其原因并不在于这些新东西能给予他们从旧东西里无

法得到的固有功能或乐趣，而在于人类希望领先潮流的本性。如果这种创造出来的欲望未得到满足，那么无论孩子或大人都常常会感到真的很不快乐。这也许是人的天性使然，但现代社会的流行趋势是每月都在变化，而不是几十年才变化一次的，而广告让每一个人都在反省自己是多么地落后于潮流。商品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容易被淘汰的特点，广告和时尚更突出了这个特点。物欲的车轮越滚越快，但落后的人是跟不上的。

尽管有组织的不满足在二战结束后的头30年有助于推动一波真正的福利制度的繁荣和发展，近年的经济形势却陷入了停滞，无法对曾经出现的变化和生产增长中长期需求作出足够迅速、稳定的调整，因而造成大量因变化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一些经济学家责难阻碍了劳务市场高效运行的严格劳务限制，认为这些限制造成在社会变化中被淘汰而失业的人找不到新的工作。其他学者把原因归于时代快速的变化，或由于石油禁运、冒失的货币政策和近来由贸易区的大规模扩张所引起的强烈经济冲击。那些认为激烈竞争主要取决于经济形势的人还可能提出，在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已很难找到能取得整个社会的认同、避免更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在竞争中丧失的途径。他们认为，在竞争中的优势是暂时的，必须随时果断地作出决定，比别的国家更快地进行创新，适应新形势，降低成本。就这一点而言，在一个自由贸易主义盛行的世界宣扬原地踏步，满足于眼前的物质和道德标准，是很危险的愚蠢行为。

关于激烈竞争步伐日益加快和现代经济增长效果日益减弱的最后一个并且是最引人注目的解释，是相对于绝对财富

而言日益增长的相对需求的重要性。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早已指出,经济物质和需求可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绝对需求,主要对象是具体的商品,这部分需求在理论上可以使每个人都得到满足。一般地,每个人对例如食物和影碟机等的需求都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发展也可能不断地为此目的服务,只要我们忽略广告不断造成不满足感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存在绝对需求或需要,例如对标志社会地位的物质或对地位的需要,可以说,这部分需求是不可能达到人人满意的程度的,即使是无限的经济增长也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凯恩斯向我们指出了这个重要的区别。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R·F·哈罗德造出了"寡头财富"一词来描述诸如在高级住宅区的住房、在最好的餐馆里订的最好的座位或最具身份的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这种"寡头财富"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表示身份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因此,如果更多的人想用金钱买到它,就像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已成功地满足了绝对需求时发生的,将会出现两种情形:要么这些人所希望得到的标志地位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将提高到保持其精英特点的水平,要么这些商品将失去其精英的地位,因为一旦被过多的人所拥有它就贬值了。

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专门立足于保证个人相对地位提高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总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们失望的程度。因为不言而喻,要让每个人都能得到比他一年前更高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尽管这种相对竞争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但社会创造财富的动机在本质上却是徒劳的。因此,标志社会地位的商品与基本物质商品之间的区别可能有助于解释社会上日益广泛的中产阶级希望破灭的

现象，也可能有助于解释在当今日益富裕的社会中一直存在所谓的“感觉不好”的现象。诚如穆勒所言：“人们不渴望成为富人，但却想比别人更富。”我们可以加上一句：“而且中产阶级不可能比其他生活水平中等的人更富。”

费雷德·希尔斯在他的重要著作《发展的社会限制》中指出，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物质财富正在带来普遍必然的对相对财富的徒劳无益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可满足其对基本的可再生的物质的要求和渴望，因而它推动人们追求哈罗德所称的“寡头财富”和希尔斯所称的“地位商品”，也就是那些本质上数量有限的商品，那些在一定范围以外是不可能保持其本质而提供给所有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商品。经济增长不仅使更多人得以竞争这些数量稀少的象征地位的商品，而且在对某种商品（如古董家具）的需求首次达到供应极限时，扩展加入这个范畴的商品的数量。因此，以更大范围的日益稀少的商品为对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对保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需的相对财富的追求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竞争性的争斗中，一些象征身份的商品价格被抬到更高的水平（如古宅）：尽管使用这种有身份商品的人数的增加可能在繁荣现象的早期带来较大程度的享受，但越过一个特定临界点后，需求的扩展最终会破坏标志身份的商品本身的特性，使它贬值为大众化的东西。因此，需要更大的增长来支付所需的防卫性消费，以抵消这种拥挤带来的不良后果。

希尔斯指出，这种加剧了的竞争和拥挤的后果，关系到多种因其固有特性而非直接因其地位或被人们认同的价值而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的商品。例如，大多数渴望得到古董或去马略卡度假的人可能认为只要不出现拥挤现象，不会因此提

高相对价格或造成质量的降低，自己对于还有多少人在享受同样的商品是漠不关心的。但日益发展的物质繁荣和经济增长正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广的领域导致这种拥挤和质量的降低。这可以从到本地森林里去休闲或在方圆几里无人烟的地方穴居的享受的例子中感受到。那些享受这种生活的人们希望得到那种可以进入这些地方的独特感觉。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有权到这些地方去，那些原先的访问者所享受到的内在价值削弱了。寂静被喧闹所代替，安宁被交通堵塞和汽车尾气烟雾所代替。只有当山区或山洞地带的情况已经恶化到大家宁愿呆在家里的程度时，拥挤现象才会停止。那些仍希望享受寂静和安宁的人们此时就必须赚更多的钱，才能应付往更深的山里探索的费用或到有限制的保护区的门票费。这样，经济增长常常迫使我们将原本免费的商品变成具有一定价格的经济商品。

现在把免费的商品变为交易的商品显然会增加 GDP 的水平或经济活动。这里 GDP 的数字是夸大实际福利增加的一个例子。现在确实有更多的人去登山或光顾海滩，只要还没发生拥挤，这也确实是净福利的增加。这也意味着财富的更广泛的分配，但一旦拥挤起来，经济活动中增加的费用就意味着人们为获取同等水平的福利享受必须增加防御性的费用。在这个例子中，防御性费用包括购买个人专用独享的去处，或购买机票到遥远的国外去寻找洁净的空气和安宁，而以前这些好处在自家门口就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其他场合也往往这样)，GDP 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同样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们需要花力气来防止稀缺商品的减少。

地位商品天生受规模或总数的限制，人人都拥有是不可

能的，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享受地位商品。为确保地位，地位商品将通过提高价格来进行定量供应（而普通商品的供给可以增加，价格降低）。举个例子，伦敦附近佐治亚州围场的乡村庄园根据增长的相对价格定量供应，因为需求增长超过了有限的供给。同样，多尔多涅和托斯卡纳的乡村住宅曾经很便宜，现在与非地位商品相比都贵得多了。在某些情况下，地位商品一定等级是依据进入难度的深浅而非依照价格的高低定量供应的。这在职业的例子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在许多问题上人才市场和地位商品理论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声誉、利益、地位或高于平均收入的工作可以视为地位商品。为获得它们，不仅仅资格水平是必须的，而且必须比其他的求职者更胜任这项工作。如果更多的人在绝对资格水平方面能胜任特别有限的有地位的工作等级，许多效应中的一种就有可能出现。有时，可用在开始时出高价而后逐渐降低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工资将被降到足够低以清除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位商品由于加剧的竞争导致经济收入减少而降低了价值。例如，在出版社的职员没有拿到正常的工资，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量合格的文科毕业生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并且对这项职业非常感兴趣，许多人即使低薪也愿意做这项工作。经常地，尤其是好职业及享有声望的工作，即使有许多合适的、有抱负的求职者，这种薪水由高至低的求职方法也并不奏效。这部分是由于在获得其他地位商品的竞争中高收入的重要性。因为，当前那些享有声誉的工作，在维持和试图改善待遇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既定的利益，它们的薪水根据进入他们职业的难度或障碍而异。在一些职业中——如律师和会计师——控制新进入者的数量（采取限定能够通过

专业考试的数额而不管其实际水平如何),这种定额保证了在职职员的高收入(和长工作时间)。在其他职业中,没有采用限额或限额已经放开,这样就可以避免采用薪金的由高至低的出价,而是采取按素质高低给予工资。资格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力,还能将求职者分类,例如,大多数人在获得第一个学位时,他们认为除了获得先前被授予的学位外,还需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虽然更高级别的学位同所申请的工作可能有微不足道的关系。有时也会遇到其他新障碍,比如要进入伦敦的某一区和华尔街金融机构,不仅要表明自己称职,而且要愿意干更长时间,并把工作完全放在家庭和其他利益之前。

所有这些解决地位商品加剧竞争的方法都将导致工作时间的延长。如果出现由高到低的出价方式和由于竞争地位商品的贬值,个人将强调工作更长的时间来维持他们前一时期收入的优势,这个决定只会导致每小时收入的减少,为了避免由高到低的出价,用官方或非官方限额制度保持或创造出人为的就业压力(像会计师或律师业),当那些职业要求工作非常长的时间时,就会发生强烈的换工作的倾向;另一方面,当资格成为进入某一工作或职业的障碍时,人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接受训练;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工作时间本身被用来表示差别的话,这就可能没有正当的理由限制最雄心勃勃且最不把家庭放在首位的求职者的进入。总之,那些足够获得更好工作的幸运儿现在必须花费更长的训练和工作时间才能保住名誉和收入阶梯里的地位,名誉和收入有助于在激烈的竞争到来之前获得有利的地位。这是无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尔斯地位商品感知理论在解释我们社会现实中的普遍

悲观倾向和"感觉很糟"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它解释了总的社会福利并不因经济增长而增长。对于个人，福利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概念。对普通人和社会来说，收入、财产和资格的绝对水平都在提高，但获得有限的地位商品依然取决于每个人收入、财产和资格方面的相对地位或级别。用价格来控制的地位商品却由于越来越多人的使用而导致质量下降，因此有必要增加预防性花费来保护既定的地位水准。在这两个例子中，由于激烈竞争和众多的需求，维持既定的福利水平需花费越来越多绝对的金钱和时间，如果不使自己地位变得更低或减少获得某一水平的福利，就不可能退出这种激烈的竞争，而且，要获得地位商品带来的同一绝对水平的福利，就得花费数年来获得财富或资格阶梯上的一个相应的地位。譬如，那些在 80 年代没有选择压力大但工资高，而只挑选了那些较少压力但对社会更有益、工资相对低的职业的人们，现在发现他们买不起 10 年前同一工作、相同工资的人们所买的房子。就地位商品来说，相关地位决定了人们所能享受的绝对福利水平。无情竞争可能是集体的疯狂，但对于个人而言，参加这种角逐是明智的，除非他或她对地位商品的魅力毫不动心。

地位商品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富裕的国家比一些欠发达国家有更多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东西能解决真正贫穷国家的悲观因素，因为他们的人民正在为衣、食、住而奋斗。但是一旦社会的大多数人达到了高于基本生活水平的富裕阶段，这就到了发展的时期——大多数对物质财富的新欲望要求对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录像机等进行无穷无尽的再生产。在这个阶段，生产的增长能提供所有人所期望的

更多的产品;穷人由于工资的增加和新产品价格下降而获利,富人们也不会因为穷人们受益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然而,当这些一般水平的物质需求满足了大多数人时,人们对地位商品的欲望就会大幅上升,并远远超过了物质商品。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里,如英国或日本,由于土地的稀缺使诱人的居住空间成为地位商品,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更多的人试图购买数量有限却诱人的住宅,若想付得起住宅的价钱,每个人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如此富裕而拥挤的社会里,收入水平至关重要,但满意程度或福利的总增长却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对地位商品的额外压力的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人们期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带来的,要讨论地位商品就不能忽视公平分配这个中心问题。一种极端是当很少人买得起住宅及工资水平相当低时,好地段的住宅和家庭佣人自然更便宜。没有太多的人怀念过去的那些日子。同样地,更多的日用品如英格兰南海岸的沙滩和湖区的山脉,当很少人有钱到那里去时,它们自然更加吸引人了;因为那里绿树葱茏,也没有"五英里"的交通阻塞。这里任何避免无情竞争过度角逐的社会阶层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过度角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中产阶级追求的扩大,以及更多的人拥有机会和自由。社会从没有清楚地区分过哪些是可以使更多人们获得全面的满足的追求,哪些将由于拥挤而无法使人们满足。结果,许多人发现他们的欲望不能被满足,而另一些人也将花费更多的努力、时间和金钱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样膨胀的欲望可能增加那些无法满足自己欲望的人的挫折和孤独感。同时也使那些可以获得欲望满足的人感到不安。当然,在一个

流动的社会里，那些获得地位商品的人们是通过努力地工作而不是由于特权或出身名门，这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是人们向往的。但同时，由于人们需花更多的钱才能维持优势地位，所以有才智的人就更加不愿意进入工资较低，但对社会有益的行业，如教育或医疗行业。增加社会公共部门的工资需要更多的税收；但征税并不受欢迎。那些理论上收入已增加的人也并不感到更加富有了，因为他们更高的收入的大部分用到为在激烈的地位竞争中保住现有的福利水平的商品上去了。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税收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在这个对身份地位充满渴望的社会里，人们极力维护相对收入中的竞争优势，而地位商品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无论财富的总水平如何——因此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在再分配之上，在现实和道德方面却不是那么顺畅。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认为，为满足贫困人口的需求，最优的机制是使经济不断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指数式增长的奇迹暗示了增长的滴入效应，较刺激的减少和增长乏力而为富人所摒弃的重新分配而言，将更符合穷人的利益。在自由市场经济滴入效应的观点看来，经济的新的增长可以使穷人获益，同时富人仍被刺激去加速财富的积累，因而也同样获益。但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损害了富人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即增加了他们为竞争地位商品的代价，而又没有让穷人分享到这种地位商品。当然，贫富的现状可以改变，但就经济的地位商品而言，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前增长的时代。有限的财富不是属于穷人的，就是属于富人的，但不会同时属于二者，那种穷人很快就会有富人身份地位的观点是十分渺

茫的,除非后者以失败出局。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争论只适合地位商品,而不适用于经济中大量的物质生产部门。50%的最贫困人口,他们享受不到地位商品及其带来的好处,但他们确实比以往更容易拥有洗衣机、电话和录像机,快速的增长可导致无用的高成本的对地位商品及名声好的职业的竞争,但对所有人而言,它也同时加速了廉价商品的获得。考虑到经济、社会及重新分配政策的平衡,最重要的是要评价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位商品——过度的需求只会导致过度的挫折——而且应该评价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再生的物质商品,只有当福利是依赖后者的时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才能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受益。

相对财富收益的日渐重要,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经济活动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又一例证,个人的决策对未直接参与决策的其他人的福利往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地,我们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加剧了环境的外部性,即不受欢迎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副作用。所以,它正在增加所谓"社会的外部性",即个体为了竞争地位商品的决策提高了其他人为竞争这种利益的成本及拥挤程度。比如,我决定买一座乡村小屋或竞争一个特定的管理职位,或抢占伦敦市区的一块街面,这些都会对有同样需求的人产生溢出效应。因为所有这些商品(除了具有共同点外),是不可能在体积或数量上变大的,供给不能满足潜在的或明显的需求。如果我得到这份工作或那间茅草小屋,其他人就得不到;如果我在星期五下午5点时与伦敦一半的人口一起上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富足得可以买得起汽车了),我们都只能在交通拥挤中苦等。

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魅力就在于，它看上去可以利用个体市场的参与者自由表达的竞争性的个人利益，并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或交易来提供更大的利益。价格机制通过供给者的成本及需求者的偏好作用于供给和需求，以达到市场导向偏好的满足及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需求的增长及更大程度的竞争可以引发供给的增长及效率的提高。一般地，当需求是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时，事实即是如此。然而，当对地位商品的竞争被加入到等式中来的时候，看不见的手就失去它的魅力了。就地位商品而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往往会给他人造成损害，一个人的获益将导致另一个人的损失，更加激烈的对地位商品的竞争并不能扩大供给。也不会提高效率，实际上，它可能导致无效率的大量产生，因为拥挤及为保持地位优势而使防御性商品的开支增加，同时取得成功要越过更高的障碍(如上涨的价格及资格的要求)。任何个体都会作出理性的选择以获得地位优势，但总的说来，当所有这些决定的互动效应存在时，社会结果往往是负面的。

理论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合作来抑制对地位商品的无序竞争，通过集体协商来限制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激烈竞争，使大家只获得有限的地位商品的份额而免于承受竞争的副作用的影响，这样，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从现在起考虑，如何从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自由市场经济参与者的零零散散的决策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中重新夺回控制权。举几个例子：一些城市，如雅典及墨西哥城通过交叉系统(如单双号)来限制交通拥挤，而新加坡则采用更加复杂的手段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为了整体利益。所以，在就业方面有可能限制个人的自由，限制个人竞争更多更好的

工作,限制通过延长工时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样,可以使工作在更多的求职者中得以分配,从而减少由于过长的工作时间而导致的健康的损害及不安全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由条例所限定的双边协定,是任何人也无权破坏的,这将产生这样一种社会后果——在大多数人眼中,这种后果要比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决策好一些。

在社会中,随着强大的有渗透力的道德观的影响,社会上具有同样信条的人们都会有一种协同性,这会使他们将其贯穿于法律之中。比如说,在一个清教徒的社会中,没有人会在安息日工作。但因为西方民主中传统社会伦理观的衰落,以及逐渐依赖于法律而不是社会压力来达到对实践活动的规则的遵守,为避免对地位商品无用的竞争,集体性协议的范围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旨在减少个人自由的社会法律使任何民主人士都不会感到完全舒服,因为选择的自由往往被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保障而不是威胁;第二,这种协议往往难以实行,因为——在缺乏具有渗透力的社会法律下——在竞争领域,个人总有一种很强的冲动要摆脱别人对其自由的限制;第三,由于此类协议或立法仅治疗地位竞争的表面症状而无法对它进行根治,所以往往只是以一种形式的竞争取代另一种形式的竞争。

或许我们可以以工作时间为例,正如欧盟社会宪章所做的那样,对一个人应该工作的时间进行限制。理论上,这种对一个人被允许工作的时间的限制是可行的(虽然欧盟社会宪章没有这么做),甚至可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将消除把工作时间当作竞争职位及相应收入的机制,这也是社会所渴望的——当超时工作被限制,这就保存了更多的婚姻并可能

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里，这样的协议并不被当作阻止那种导致社会破坏性的过度竞争的文明之举，倒被当作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与此同时，这种协议又极难实施，比如，一个人如何证明工作是否被带回家去，如果是的话，那他是为把白天的工作做得更完美的自愿决定，还是由于雇员们的过度压力造成的呢？如果此类规定被扩大至管理层领域，那么，正如过去的直接或间接的长时间工作（作为一种职业要求），被用来防止出现对优越的工作的过度需要一样，另外一种防止工资下滑的障碍就必须随即被建立。这种下滑的工资水平（比如在伦敦），当然会使受雇用的人数增加，而不会使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但这必然会遭到从事相关职业的人们的抵制（为保护其高工资）。为保护工作时间遭限制时工资不会减少，他们可能会制定新的学历资格的障碍来人为地减少求职者的人数。

很明显，学位资格要求的限制较其他工作限制更具有优势，因为对那些通过及未通过的人来说，新限制反而使旧限制不再显眼，而整个社会也从中受益。一些限制，特别是学位资格的限制较其他限制而言，在社会中更加有用，更能使个人受益。然而，许多地位商品或工作并不是在这种社会有用的合理方式之下定量分配的。就某种职位的求职者而言，仍要凭个人专长及出身等来接受审查。在缺少社会的价值观来限制个人对地位商品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对其他大部分的地位商品要么争破头，要么由于很多人都可得到而贬值，要么由于相对价格上涨或其他社会障碍而进行定量分配。

既然中产阶级对地位商品的热望在增长，因此恶性竞争看上去既激烈又无用。相对收入重要性日渐突出，将导致一

个日渐商业化的社会。在这里,时间变得越发宝贵,人们很少会从事一些对社会有益但收入甚微的活动,由于时间成了更加宝贵的商品,人们也逐渐牺牲更多的闲暇,比如爱好,或与朋友和家人相聚。恶性竞争的社会是一个自私的、非社会的、令人心烦意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相对收入是关键,一种破坏性的敌对和竞争成了一种社会标准,使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相互对立。亚当·斯密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了为形成有内聚力的社会怜悯、想象、认同及善良的作用,但他又认为个人利益的动机之作用(这在其后来的著作《国富论》中占了中心位置),会导致合作基础上相互依赖的社会的发展。由于分工,人们在个人利益驱使下,会积极参与互利合作的交易,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对地位商品的争夺,与斯密的分析并不吻合。哪里有地位商品,市场中其他的参与者便成了某个人要获得成功所必须去击败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命运将变得更加相互关联,正如我们集体对自己的拯救更加明显地有赖于相互合作,但我们更加倾向于把其他参与者看作绊脚石而不是伙伴。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应当更多地归因于整个社会的世风日下,由于贫困而产生的一些不良行为,甚至暴力犯罪现在都时有发生。

第十章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挑战

在启蒙运动中，游离于乐观主义思想的躁动之外，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中出现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关系密切的动力，一是控制我们困境的人类理性的力量，二是经济中利用私有利益促进更多生产的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然而，自从1914年以来，面对着现代战争的恐怖，狂热的民族主义、宗派暴力及内战，这种认为理性将确保在道德和政治领域的、纯粹和持久的、进步的乐观信念正在挣扎中生存。更近一段时间，即使是认为通过科学知识的进步，人类的理性也能日益地扩展我们对于人类在自然中所面临的困境的控制这一信念，也随着我们接触自然规模的扩大，复杂性的增加，类型的增加，前所未有过的专业化及更少的可以为人们所全部理解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发现而受到质疑。尽管如此，在经济活动的竞技场中，亚

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魅力在于它似乎解释了在我们当今复杂的世界中，自由放任及对私利的追逐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需要道德动机或可操作的理性计划。这是一种机制，它表面上似乎通过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和社会的进步，而不需要考虑人类道德的脆弱性和人类理性的局限。

在上面的四个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自由市场机制的三个普遍的缺点。即自由市场机制限制了人们在福利事业进步中明确的推动力的信仰；市场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缺乏联系，自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失败包括对环境外部的保护（例如污染和过剩）；以及看不见的手无法确保个体在追逐财产、地位优势等个人利益时能同时导致社会福利事业总体的进步。我们还注意到许多由于没有认识到的，或是看不见的手无法防止的，伴随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并没有在GDP增长的利益中冲销。结果，GDP增长作为福利事业进步的指标就存在致命的缺陷，即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一定会提高。这些观察在专业的经济学家之间并未引起太大的争论；这一事实也未引起政客、政策制定者及公众太多的注意和重视。

然而，在专业经济学家间就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甚至它的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仍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其中有一些是本章的主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不确定和复杂的世界上，关于为改善自由市场的基本运作，合理的政策介入到底有多大的必要上有很大的争论。这一争论，作为理论原则处于经济学的正中心，对于本文而言极为关键。因为，如果一个人相信由于忽略了外部性和分配问题，自由市场有时要求政

府介入以使其更有效率，而且就其他原因而言介入也并不总是在实践中降低效率，那么倾向于依靠自由市场中无拘无束的运行去创造社会福利的整个假设就会被严重削弱；当然，只要不希望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去寻找通道，控制和指挥自由市场的活动以确保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的社会福利提高的行为将受到尊敬。反之，如果一个人相信——除了建立法律框架和货币体系之外——政府不能介入以改善自由市场的运作，而且介入本身会破坏效率的话，那么除了将看不见的手不完美的工作作为维持人类进步的最好希望而全盘接受外，将别无选择。在这第二种观点中，人类的理性将仅限服务于个人利益，而且我们可能会被迫接受——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在为民主意愿服务时人类理性操作的无能。

在与经济问题相联系的政治竞技场上的争论常表现在两个方面的混乱：1. 关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及我们应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其在道德规范问题上是否成功。2. 关于使这些目标得到更有效的实现所遇到的经济问题。道德规范上的经济辩论是基于不同价值判断标准的基础性辩论。那些论点可能会在经济如何运作的单独分析上取得一致。但在特别的结果是否确实在道德上可接受则可能产生分歧。举例而言，虽然20世纪90年代法国有许多人口，但法国并没有对降低最低工资将导致更低的失业率产生争论。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认为通过增加收入差别来处理失业问题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个关于社会将如何组织及收入该如何分配的原则问题。在一个趋向经济学的规范中，最有效率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人们最渴望的。人们可能希望牺牲一些效率和增长以换取更大的公平。当然，可能出现两种在效率上相同而在分配上明显

不同的结果。从道德立场去判断经济进步是极为主观的。它们建立在自由与公平分配、将来后代利益与今天穷人的利益、环境质量与物质繁荣孰重孰轻的不同的价值观上。这些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道德和规范方面的辩论，我们在最后一章将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然而，不论一个人的道德立场和道德目标是什么，都存在一种独立的政治辩论，这种辩论集中于：在一个既定条件下，经济如何在参与工作和实践的人们身上相互作用，这是个有益的经济辩论。经济学常被视为对经济运作方式进行的客观研究。它们寻求对经济给予科学的解释，并对经济作出合理的预期。但存在着许多经济学派——从古典自由市场货币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它们对经济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分析上有明显的分歧。这些不同的分析支持不同的政党或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即使有些在价值观上基本一致，但关于这些不同的经济蓝图中哪一种将能最好地维持人类的进步，仍有激烈的政治争论。事实上，对于本章及下一章提出的这些客观问题的回答本身就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举例而言，对纯粹市场失败的实例到底有多普遍就存在不同的评估。这些不同的观点表现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既定目标，是应通过自由市场改革(设计出的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率)，还是通过更进一步的政府干预来减少经济增长的成本。类似地，关于如何严肃认真地接受新的复杂性“科学”的挑战的决定，必然影响到我们对自由市场可以准确反映人们的真正偏好能力的信仰程度。对于这些问题有不同回答不仅有助于决定对自由市场的政治态度，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乐观程度——在今天这不断增长的、开放的、复杂的世界上——也关系到可持续的

人类进步的可能性。

凯恩斯和普遍的市场失败

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如果任其自由运行的话，它会很快找到一种竞争性的均衡，也就是说，在经济中一整套商品价格体系将确保每个市场的需求等于供给。这套价格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在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达到商品的有效配置(尽管不一定是公平的分配)，这种关于市场机制的观点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总的来说，自由市场已证明了它能使生产所需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保证消费者确实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有效生产。而且，价格体系是通过一种非极权的方式得到的。任何人只需想想战后 40 年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的失败，就能了解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多么的复杂和重要；不论国内的服务有多么庞大，中央计划所显示出的在配置大部分资源方面的能力是无法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媲美的，而且这也是支撑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最关键的真理。然而，在实践中，很明显的是，市场中的重要因素有时并不会有效或快速地出清。这种市场失败的典型例子莫过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那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看上去已经处于一种均衡之中，但在这一均衡中，劳动力市场没有出清，在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中存在巨大的不均衡。正是这一萧条使凯恩斯著名的对自由市场的批判理论崭露头角。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大量自亚当·斯密后不断发展的古典经济的框

架的同时、他迈入对其中心信条的持续的挑战上。在其最著名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凯恩斯的中心目标是大卫·李嘉图时代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在一个竞争性的均衡中——需求总是等于供给(或者,如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需求);这一古典的假设表明,在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中从来不会有真正的自愿的失业。达到这一愉快的平衡所要求做到的就是将妨碍自由市场运作的一切障碍移开。在《通论》的第三章中,凯恩斯写下了如下传统的共识:

> 李嘉图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奇特性和神秘性。这归功于其设想的环境的恰当的复杂性。他所得出的结论与常人的期待大不相同——这增加了它的知识权威。其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得朴素无华,这是它的优点。其适用于大量和不断的逻辑结构这一点,使其美丽。它能解释许多社会不公以及人类进步的计划中不可避免的事件的残酷性,以及改变这一状况的企图从总体上更可能是有害而不是有利,这使其理论具有权威性。它承担起衡量个人资本家自由活动的正当程度,吸引了权威背后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通论》的核心是分析经济在长期地抑制需求、不同寻常的活动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如何陷入停滞。凯恩斯强调,不确定性会导致衰退——强调它通过增加储蓄的欲望而减少消费以及投资的倾向。凯恩斯在书中第 12 章分析了投资决定

所依据的长期预期的本质：

> 突出的事实是用于前景估计的基础知识的极度不扎实。从现在起的几年内，我们对影响投资产出的因素的知识将变得微不足道。

根据研究证券商本性的伟大理论，凯恩斯认为大部分的投资是“动物本能”和“自然乐观主义”的产物，而不是仔细的数学预测，实际上，我们现有的有限的关于未来的知识“不能提供足够的数学分析基础”。结果，投资只好依赖于内幕消息：在投资前景估计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考虑到投资依赖于诸多因素，甚至于神经、歇斯底里和对天气的反应等等的综合作用。

凯恩斯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这样的观察结果：伴随着经济衰退的发生，在将来的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刺激的明显下降通常与忧心的消费者的更高的储蓄欲望相一致。根据定义，假设任何时间段的储蓄（包括从海外流入的净资产）的价值均能与实际投资的价值相等，但计划储蓄的水平与计划投资的水平之间并无自动的联系。如果计划储蓄（也就是说，人们希望持有的现金流量）高于计划投资的水平，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总需求将会缩减。而且，实际需求的短期下降可以通过商业额推知将来预期的低需求时间的延长，从而引起计划投资与就业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正如凯恩斯在《通论》第16章所说：

> 如果储蓄不仅包括放弃现在的消费，同时也包

括向将来的消费下一个特殊的订单，结果将会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来的投资的预期利润将会增加，为目前消费作准备的资源将减少而成为为将来消费作准备的资源……但无论如何，个人的储蓄决定实际上不会涉及到向将来消费的超前订购，而只是取消现在的消费。

现在，根据定义，如果货币供应（也就是说，流通中的现金数量，加上银行存款水平）固定不变，那么每个人要增加他们手中持有的现金数（或现金等价物）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个人都企图这样做，消费支出以及收入将会下降，收入损失阻止了平均流动储蓄水平的上升。这些收入的减少以及需求的下降，凯恩斯认为将导致更高的失业，进而导致实际需求进一步低于潜在需求。相反，经济衰退中的实际需求反映了与衰退经济情形下的收入和就业水平相对应的需求的下降，由于用于预防目的的储蓄倾向增强，为了消除实际需求与潜在需求的差距，并重新建立一个完全就业平衡机制，凯恩斯提倡政府当局应该寻求增加货币供应以满足增加流动储蓄特有量的欲望，同时加强公共建设以产生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并由此刺激消费。他认为，这类干预比古典自由市场的处方更可取些，即等待工资与价格的下降，以使储蓄的实际价值回升（即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价值），及消费与投资倾向的增强。这样一个放任主义的自由市场的途径，凯恩斯认为，将要度过相当长一段令人难以接受的时间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即使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增加工资和价格弹性。他还认为，经济衰退中利率下降，将使储蓄与投资平衡的古典假设出现错误。至少在

一些情况下，在放任主义的条件下，利率下降未必会导致不储蓄和刺激投资。这就是所谓的“流动偏好陷阱”，在不确定的衰退条件下，长期利率不能下降到足够刺激大量投资的水平，因为如果低于一定的水平，消费和投资量将难以弥补潜在投资者因为放弃显见的流动资金的利益，以及从事显见的信用和通胀风险投资的利益。

自从凯恩斯写了他那本伟大著作的60年来，经济潮流来来去去。自由市场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集中于凯恩斯的次优市场均衡例子（延长的经济不均衡）的重要性和频繁性，它们将持续多长时间，人们怎样解决它们。凯恩斯的反对者，从1930年开始，就已经认为许多用于建立理论（比如流动偏好陷阱）的假设，是十分特殊的情况。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市场的不完全性、工会的协议等被去掉，来允许更大的工资和价格的弹性，那么经济便能很快地调整到一个完全的平衡状态，因而消除不自愿的失业和“清理”劳动力市场。他们驳斥了凯恩斯的观点：激剧下降的名义工资和价格——在一个没有管理的经济中——将倾向于增加不确定性和进一步减少消费与投资（至少在短期内）。总的来说，右翼自由经济学家偏向于认为市场总会很快地获得一个健康的平衡。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分析至多只是提供在高度不平常的衰退条件下的正确做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调整的速度和规模都必须很大。如果在其他条件下，凯恩斯的方法最终将导致通胀。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效率和速度方面所表现的乐观主义，总的来说导致他们主张自由竞争，放任自由，尽可能消除对市场的干扰，消除贸易壁垒，鼓励自由贸易，去除失业保护，允许工资调整，以此阻止失业；

外来的环境立法和繁文缛节应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他们也偏向于认为，旨在减少成本干预的许多尝试被误导后将造成市场效率降低；最好是放任自由，不进行干预，这样就可提高市场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相反，当今的凯恩斯追随者仍强调许多真正自由市场的障碍的不可克服性，因而强调以干预的正面影响来管理需求，并改善供给。这些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更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存在市场失败的可能性，并不时地导致次优增长或就业的拖延。他们强调，比如克鲁格曼在他的《兜售繁荣》一书中所说，即使在高度自由的经济中，不完全竞争市场（由于信息不灵或自然寡占）和个体轻微的不合理行为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平衡，其中一个理论条件是个体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而且其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总能给出他们真正利益所在的信息），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克鲁格曼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指出当未售出房产的数量开始增加时（也就是说，意欲出卖房产的人比想买人的人多），价格将缓慢地下跌。通常这并不是因为管理市场干扰的结果，而仅仅是个体自由决定不降价的结果。这种决定从个体的角度看完全是合理的，不是大部分市场参与者没有预料到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度下降的结果。有关的一些个体可能会客观地认为他们的房子是不平常的，与众不同的。尽管价格下降，如果他们愿意等的话，他们将会找到以原来价格成交的买主。然而，如果过多的人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将出现集体的不合理和房产的供给过剩。在市场的总水平上，只有当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这些房产才能被清理掉。而且，许多市场参与者会很谨慎地避免成为第一个降价的人而遭受

损失。房地产市场的成功，正如劳动市场一样，个体的行为依赖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但个人行为的决定是建立在关于其他市场参与者未知的将来行为以及整个经济的不确定的预期上的。即使在自由的、没有管理的竞争市场中，最优的平衡也是不存在的。假如人们没有很好预见就不能知道其他市场运作者总体上是否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参与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价格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调整到清理市场的水平，也不能发出正确的供给过多的信号。

凯恩斯关于自由市场运作的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要求进一步质疑看不见的手在各种情况下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同时，它似乎要证明一些合理的政府干预能够确保市场的顺利运作，而且，那些认为市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不管它的开放度如何，都不大可能把放任自由放在纠正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之上。R·利普赛和兰开斯特教授的分析与这关于放开和干预的相对功过的讨论特别有联系。因为他们证明了，除非市场能避免所有的干扰，否则它不能从理论上证明，其中一个干扰的消除必定能够使市场以更高的效率运作。这些发现，使人们对80年代英美关于尽可能消除干扰的政治主张产生了怀疑。由于有意义的干扰总会保留在任何实际经济中，即使在最自由的市场，一些税收法则和规范都要求人们付钱用于防卫和维护法律。因而，许多经济学家，当同意这些毫无作用的、甚至起副作用的干扰应被消除时，认为以提高市场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为名而不断消除对社会有好的影响的干预是值得怀疑的。这些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追随者，认为应该坚持或采纳环境和社会保护法，以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他们也认为由这些措施产生的特殊的干扰，

实际上不会导致比市场本身所造成的不平衡更为有害，因此不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这与右翼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让我们一方面相信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减少不平等或环境的破坏，哪个更好呢？

毫不奇怪，在这些令人烦恼的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很少取得一致。显然，凯恩斯革命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夸大了政府成功干预的范围，以及这种干预的需要。这种干预很多情况下超出了凯恩斯所描述的特殊情况。特别在二战后，经济中出现了对全面需求管理的效率的狂热崇拜。虽然政府比个体市场参与者掌握更多的信息——特别是与总行为有关的——但别忘了政府也面对不确定性，不知道在一个连续运转的环境中他们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举个例子，弥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有时犯下了这么一个错误，忽略了在积极的货币政策对需求不足产生任何影响之前会有一个“长期的和不同形式的时滞”，更有可能的是，当需求回复时它仍然继续产生影响，结果容易导致人们不愿看到的通胀的上升。

许多观察者认为，当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市场参与者以自我行动的个体部分决定而导致集体的愚行的时候，政府在组织协调行为方面确实起着必要的作用。举例而言，通常政府能够最好地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组织分配公共财产和使用公共空间。它们也有助于联合起来保护资源或减少拥挤和环境污染，并通过颁布法令和建立处罚机制来惩罚那些肆意践踏规定的人。大部分人也会同意，在经济衰退、战争或出现严重政治和环境危机时，政府能发挥一定作用，对市场的极度不平衡形成一致反应。但当干预进入这些特殊情况外的、具体的资金或劳动资源的分配领域时，很可能会是阻碍生产力的。

失业或污染的水平可能成为民主政府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的主体，但政府计划很可能与分散的自由市场的可怕力量不相协调，不论是在决定提供具体市场服务的最佳水平还是在迎合所有市场消费者偏好方面，皆是这样。

在80年代，对政府能力的失望以及政府能找到对付宏观经济问题答案能力的怀疑一时甚嚣尘上，这是因为大多数的政府在对付70年代的滞胀（经济衰退的同时又高通胀）方面一败涂地。结果，人们又转回去相信没有干预的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好处了。

但到了9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与自由市场货币主义者之间孰优孰劣却更加难以分辨了。凯恩斯主义的过度干预对70年代的滞胀应负一定的责任，并且导致了许多国家在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低估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性。一些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者所开出的药方，如对经济中的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也导致明显的低效。但另一方面，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验表明，放任自由已导致了极大的变化和反复无常，无论在资产价格方面或是经济增长方面，都比1947年之后的25年要大得多，而且助长了一系列的金融灾难（如80年代末期美国的存贷危机）。放任自由同样要对英国的疯牛病危机负部分责任。在英国，关于牲畜饲养制成品的规定在80年代早期放宽了，结果给牛肉工业和消费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美国及英国制定的供应方的改革措施，如降低最低税率、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等，迅速导致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直到90年代后期，也未产生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长期增长率有较大提高。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当然还相当受限制）的增强并未阻止欧洲大陆

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而且比60年代凯恩斯主义高度管理时期要高得多。因此，毫不奇怪，90年代末期许多国家的选民开始越来越对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感到失望，并表现出选择实用主义政府的倾向，这样的政府既要平衡一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增长，并主动地去控制自由市场的过度行为，同时对他们能够取得显著成绩的能力表现出适当的谦虚。选民对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或政府的介入能够导致他们福利持续的、明显的增长表示怀疑，也是在情理之中。

冲击以及复杂性的影响力

飞速变化的影响力是现代关于进步的疑问的核心。对积极变化的可能性以及人类控制与处理变化能力的信念，是人类对进步充满信心所必须具备的精神上的首要条件；但如果变化过快，并带来震惊，它则可能反过来破坏对进步的信念。这会表现在一些社会部门中，其职员必须以他们感情、性格和技术能力所允许的更快的速度，去适应新的环境而增加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与迷惘。同时，过快的变化会削弱环境避免重大的消极后果的能力，并经常会对复杂的生态系统造成混乱和不可预知的后果。甚而，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讨论激烈的经济动荡，不仅会导致对环境和人们的安全感的消极影响，而且对于经济增长率本身以及对经济——甚至在长时期内——保持良性均衡的可能性有影响。动荡造成了不确定性，摧毁信心，并使经济变得难以预期。因而，经济，正如处于其中的人们和环境一样，对缓慢且稳定的变化能更有效地并

可预期地去适应和自行调节。

从8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了尝试解释冲击的影响力，他们特别强调滞后现象的经济理论。滞后现象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短期经济行为决定了在众多可能的最后均衡中，经济将达到其中的某一种程度。根据滞后现象的理论，一次的冲击将导致经济衰退，它不仅会造成一些短期的消极结果，而且这些短期影响本身也会产生一种长期的影响力，即当经济复苏时，经济将处于何种均衡状态。因而，一次急剧的经济衰退可能产生减少资本的影响，因为在一定的金融临界点之下，企业将被迫使其机器设备停产，而若非资金不足，这些设备本该是不停地生产的。同时，经济衰退还可能从两个方面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及供给产生中长期的影响。第一，那些劳动力市场的内部人员（即仍有工作的）当需求增加时，对他们自身能获得更多的实际工资增长更感兴趣，而不想看到那些丢掉工作的人重新获得工作；而企业也会相当乐意于拥有一支较小的且工资较高的劳动力队伍，这些劳动力会有动力去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担心若不尽其努力他们将会丢掉其宝贵的、高工资的工作。第二，那些失业人员在长期寻找工作中，将丧失信心并且会缺乏所需的现代技术去竞争工作。作为滞后现象的后果，经济衰退的冲击对潜在增长率及自然失业率具有消极的和长期的影响。

那些相信滞后现象的人们认为，避免经济冲击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确会谴责目前的许多经济问题，例如高失业率、金融及市场动荡，并继而把这些冲击部分地归咎于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比如资本控制的完全取消以及快速的自由化。他们认为，用突然的放开与自由化以及大幅提高利率来作为控

制通胀的政策工具，导致了7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减速，这与采用更灵活的市场以及低通胀政策相比反而减少了更多的工作。相反地，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滞后现象表示怀疑。他们坚持认为，真正自由的市场能迅速自我清除并自然返回到一个最佳的均衡状态，他们不回避应引导那些衰退和冲击，这些衰退与冲击有时是迅速消除市场扭曲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认为，消除扭曲（如就业保护立法以及其他的规定）将长期地减少冲击的消极影响，这是通过允许市场更有效地自我消除与更快地返回到最佳均衡来实现的。在他们看来，衰退甚至对于减少通货膨胀预期和产生更完善、更适合的工业会有长期的好处。

要对滞后现象的重要性的争论作出评判是不可能的。从70年代中期开始在多数欧洲国家，失业率已急剧上升，特别是在80年代早期以及90年代早期的严重衰退期间，而这一衰退是由于对石油价格及德国统一的冲击作出紧缩货币政策的反应而导致的。而且在许多国家，失业率一旦上升，就会居高不下，而不管自由市场如何改革。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这是由于放任自由太少、太迟，而无法将欧洲劳动力价格纳入世界市场之故。他们认为放开管制的努力应加倍，否则，不论有没有冲击，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自然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

滞后现象理论尝试着把冲击造成的经常性的消极且实质上无法预测的长期影响，作为古典理论的一个部分。与凯恩斯一样，那些相信滞后现象的人认为，一个经济能够达到许多不同的均衡，而其中只有一个均衡点是最佳的。该经济体系在受到冲击后，会被吸引到何种均衡状态取决于那时所属的

特定的短期经济状况。而且根据该理论，从一均衡状态转变为另一均衡状态的准确性和程度，基本上是无法事先预测的，即使该转变发生后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滞后现象的转变类似于当主要临界点被突破时在许多其他复杂系统中出现的非线性反应，也类似于混乱理论所说的，初始条件下的主要因素的微小的改变都会导致混乱的反应。

滞后现象与非均衡理论之间的相似，说明了必须对经济理论中的古典均衡模型进行更加彻底的重新思考。而且，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大学教师也的确开始强调复杂性与非均衡理论对经济的普遍重要性。正如瓦尔德洛普在他的《复杂性》一书中清楚地描述的，对于许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人类经济行为的学问与复杂生物学和物理学系统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认为，大经济系统就像天气，二者都是高度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而且两种情况下它们的复杂性都导致了要得到非短期的精确的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瓦尔德洛普的书中引用了密歇根大学的霍兰的一段话，来说明这种相似：

> “请看气象学，”他对他们说，“气象永远不会固定下来，它自身永远不会完全重复，它基本上是不能在一星期前提前预测的，然而我们仍能解释我们从天气所看到的几乎一切现象。我们能够辨认一些重要特征，如气锋、气流以及高气压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力学原理。”

气候系统学问与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相似吸引了金融市场

中的一些操作者,他们面对着许多矛盾的且不精确的经济预测,但也得到了一些具有一定洞察力且有说服力的保守的经济分析。与瓦尔德洛普的解释一样,以新墨西哥州圣菲学院为中心的经济学家们从80年代末开始对复杂性系统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包括经济体系在内的许多复杂性系统,表面上看像是混乱边缘的自发的自我组织,也就是说,它们似乎是介于稳定均衡与完全混乱之间的微明地带。这些系统按其力本论,依靠积极反馈机理,增加了盈利与非线性关系。复杂性理论家认为旧的一定的均衡状态不仅会减少盈利与可预期的线性均衡,而且不能建立一个较好的、现实的、动态的复杂系统的模型。这样,亚当·斯密这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变成了这样一幅图景:一个自由经济达到了稳定的、协调的均衡,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现已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即世界更不确定,更难以预测,即使很小的意料之外的事件也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而这变化虽在事后可以解释,却无法事先预料。经济组织和资源配置异常的、分散的能力是动态的、发展的、不稳定的,而且永远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点。

从许多方面来说,要理解经济学必须了解复杂性。首先,经济相互作用的异常复杂性表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是不可靠的。比如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和企业作出的选择都是合理且具有远见的。我们经济上的许多选择,在福利方面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要取决于其他市场参与者未知的未来行为。我们的选择与别人的选择是互相依赖的,而且是在我们无法肯定他人的行为将会如何的不确定的环境下作出的。我们必须不断地使我们的行为去适应动态的,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不可预测的环境。在瓦尔德洛普的书中,斯坦福大

学教授阿瑟认为，人们所面临的情形与下棋的游戏相似，不仅所有可能的排列变化都是有效的、无穷无尽的，而且任何移动都会产生不确定的效果，因为另一方下棋者的反应是不可预测的。一个棋手事实上在游戏中必须在头脑中有一系列的步骤或是计划，并且对可能的结果作出一个猜测，但他却只能在事后对形势作出完全的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当然绝不只是两个对手。这样的基本的不确定性以及要在复杂情况下作出完全的、有见识的选择的不可能性，渐渐破坏了看不见的手所构建的整个合理的框架，并使得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将达到一个最佳的均衡点的假设产生了一些问题。这里不妨引用瓦尔德洛普书中的一段话：

> "同样地，"霍兰说，"无法想象系统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适用或效用或其他什么的达到最优化。不可能性的空间太大了，他们缺乏具体的方法去寻找最佳点。他们能做的顶多是去改变并使自己相对于其他个体来说进步一些。简而言之，复杂性适应系统是以不断的创新为特征的。"

经济经营者在复杂的情形下永远不可能十分理性地行动或是很有远见，他们也永远不会准确地知道他们所选择的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将取决于大量的由许多个人按不完全信息作出反应所形成的无法预测的排列变化。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自由市场中的个体所作的种种决定不可能导致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结果，尤其是在公共财物的分配与环境外部保护的情况下。这并非完全因为个体预测其

他人将肆意践踏规定和限制，而是因为在自由市场中缺乏这样一种机制来使个体进行共同的抉择，去分享稀缺的公共财物或者抑制正在恶化的污染和拥挤的情况。这还因为个体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而且常常是通过不可预测的方式，另外还因为他们联合的行为有时具有重要的非线性的突破临界点的效应，这一效应是集合状态下的幼稚的个体难以分析的。举一个平常的例子：我不能知道如果我决定在一个特殊的星期六早上 10:30 使用 M40 号高速公路会对自己的福利有什么影响，或对他人有何影响，这将取决于无数的他人的决定，包括偶发事件如事故。我的决定可能不会造成拥挤，但它可能成为使道路超过其容量极限的最后一个砝码，从而对所有车辆造成阻碍。无论在哪，复杂的系统与非线性反应处于危险情况时，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通常的政治假设，即人们的市场行为是其真实偏好的可靠表达，且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知道得最清楚”这一假设也值得怀疑。个体的消费者当然可以看作他们自己偏好的最好的仲裁者，但他们有时却可能由于对环境的不了解而误传了他们的偏好，可能无意中在复杂的情况下促进了他们所厌恶的结果。

虽然源自信息不完全和协调问题而导致的某些形式的市场失灵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但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也不该夸大。在很多情况下，实施政府干预的后果也是事先不可预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复杂的世界中，经济效益作为预测工具还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怀疑经济增长作为政治行动计划的基础的可靠性。从一定程度上说，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个人和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知道如何不断地适应这个充满生气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在我们这个

不可预知的世界中，盲目地信奉经济教条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的。

一个更具体的感受是，复杂性理论削弱了古典的经济均衡模式，因为它更加重视日益增加的收益。大部分的市场均衡理论是建立在日渐减少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收益概念基础上的。特别是在真正自由竞争市场这个苛刻条件下，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大到有能耐扭曲价格机制的自由运作。传统经济学家一般总是假定：随着企业扩大，他们必须依靠减少边际收益来自我限制规模。换句话说，这里存在重要的规模负面反馈效应。在真正自由的市场中，传统理论假定，完全自由竞争是自给自足的；垄断和寡占被看做是对市场进行干预和限制所产生的非自然的结果。比较而言，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完全竞争的条件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如果存在正面的反馈效应的话，即成功的趋势是渐增的。技术比赛或市场竞争中的获胜者，常常能自由地居于主导地位，然后控制价格，继而通过竖起阻碍竞争对手进入此行业的屏障来削弱自由竞争。

自我肯定成功或正面反馈的最好例子是，打字机和电脑键盘上 QWERTY 那六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字符键。起初引入这个是为了降低打字员速度，使之与技术水平相适应。这种在标准键盘上不合理的字母分布就这样被锁定下来。作为一种巨大投资，每代使用者都要花大量的钱和精力去学习这种不合理的字母分布，也许这种巨大投资还是无限的，结果是，主要的打字机制造商几十年前采取的措施，至今仍指挥着成千上万人的打字习惯，尽管这种措施已经没有现代性质可言。同样地，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一个竞争者的小小成功尝试常会使他占据他那个领域的主导地位。举个例子，Betamax 在电

视录像方面输给了 VHS,无数的软件包装商输给了微软,不仅仅是因为前者的技术较差,而且至少是因为他们在竞争的早期就略处于下风。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肯定会选择更"安全"的市场领导者的产品(也就是说,最早察觉这一点的最有可能主宰未来的市场)。

无论在哪里,增长的收益是重要的。市场的地位是起主导作用的,但至少在理论上还不能证明一个自由的市场会产生最优的结果或均衡。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所有良性自由市场均衡的重要条件,即完全竞争是很快会被消除的。早先的优势会自我加强,也可能会固定下来处于某个位置,而使其优势失效。增加的收益保证了在很多场合下,甚至是最自由的自由市场也不会导致最优结果。无论是好是坏,偶然的事件或小小的优势也可能导致一种结果被固定下来,而使许多协调的平衡被破坏。

这种增长收益的存在,使那些赞成对市场进行干预和反对自由放任经济的人有了空子可钻。因为如果早先的优势是那么重要,政府帮助确保这种早期优势的存在或许将在长期内有益,而没有必要靠政府的持续支持。高科技及高垄断工业尤其如此,如飞机制造,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政府给波音公司的军用飞机订单,以及欧洲给予空中客车补贴,各自都是在帮助这两个竞争者建立主导地位而牺牲别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公司在研究和生产方面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将会由于可持续获得的利润而显得不必要。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总在寻求关税壁垒来保护他们所谓的"幼稚产业",以便给他们时间来达到与原先市场主导者进行竞争所需的规模。同样地,某一特殊行业或一系列行业的

公司被集合起来(如瑞典 Basle 制药公司,苏格兰格兰硅谷中的电脑公司),有时常利用政府干预(如建立工业区或改革目标关税保护等),就像偶然事件一样,一旦建立,这种集结将提出一种更进一步的想法和信息交换,建立一个强大的供货商基地,并集中当地的人才和竞争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帮助加强这些联合起来的公司的竞争地位。诸如此类的例子表明,增长的收益会支持政府对自由市场运作加强干预。但是在这些及很多其他场合,政府的能力也不能高估。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将很难分辨其中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很难正确预见下一阶段的明星工业。

这种关于复杂经济体系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增长的收益和效用终止的重要性,使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不可能靠自己去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找到一条最佳的解决途径。同时,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府在试图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最优解决途径方面显得软弱无力。这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干预,而且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所采取的决定都是这样。这也许可以清楚地表明,一个真正自由市场的目标,要确保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保持一种协调的均衡和平衡的进步。尽管有看不见的手的活动,自由市场参与者的一个个单独决定的总的影响,仍会导致不可预见和不受欢迎的后果。但同样地,周密计划的政府干预也可能导致无法预见的问题和结果。

这种困境的复杂性对人类活动的活力非常关键。但它也把不确定性引入了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未来存在内在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我们对未来的绝对信念变得摇晃起来。我们曾经相信,我们可

以推动未来的进步，用亚历山大·蒲柏的话说："自爱使人奋进，理智使人收敛。"无论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还是在科学和政府的引导下，人们的理智都不能确保我们一直成功。我们生活在"混乱的边缘"，我们对自身控制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过于自信，对自由市场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也过于自信。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和全球命运

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移动对关于把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从人为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做法是否与人类进步更宽泛的理念相冲突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是很关键的。这个讨论一部分涉及到设想的变化速度，因为贸易和资本移动的逐步自由化所产生的结果，似乎比突然自由化所产生的结果更好些。毋庸置疑，二战后逐渐放开的贸易限制使各方面的经济财富和福利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化看来，还是暗示着更多的问题。除了那些与令人震惊的快速全球化相关的问题之外，最激烈的讨论莫过于集中在贸易和资本移动全球化方面的负面冲击。它将冲击民主政府或国家实施的，影响他们国民的，有效控制经济、社会环境的政策的能力。甚至那些怀抱“地球村”的观念和认为人类应共命运的人，以及那些对国家

主权无兴趣的人,也希望找出全球自由贸易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因为自由贸易会使民主政府在试图控制或引导市场机制方面变得软弱无能。另外,政府想限制自由市场的合理运作也变得不可能。政府在很多方面只能希望他们的国家主权在自由资本移动和自由贸易发展过程中遭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将成功地干预市场。既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全球自由贸易区内,人类便无法使用民主手段重新把财富从富人手里分给穷人,保护环境,保护公众利益或者减少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移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消费者的选择和自由。但也威胁着那些无任何资本或技术的人,这些人将被剥夺对未来生活的发言权。

从18世纪晚期的赫尔德起,很多人相信真正的进步应包括民族化的实现。也就是要提高每个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和唱自己国歌的能力。而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认为,进步就是全人类单一全球命运的实现。这里就存在着深层的不安定性,如关于现代全球消费者市场和文化的某些方面麻木的一致性,以及深深困扰着人们的关于在现代自由市场中由国家自主决定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软弱性。在某一方面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如英国右翼势力保守党自诩为国家主权保卫者,它本应该竭力反对欧盟内的主权让渡,然而却热烈地欢迎这种使主权不断衰竭的资本运动,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公民可以减少他们交给国家税收的自由(即可以把钱放到逃税港去的自由),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大的地区联合体如欧盟、美国仅仅是政体联盟,但却在国际贸易(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有效地抵御了全球自由市场超负荷的影响,欧盟和美国

只有大约10%的经济直接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而小国的比例则达30%～60%。这样，小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的贸易伙伴。那些赞成维护国家主权但又欢迎自由资本运动和自由贸易的人很可能以为，全球化将把政府有效地隔离在自由市场活动之外，他们可能由衷地相信，全球化不仅可以使富人更自由地利用他们的资本并得到最多的好处，而且也将使所有人的财富达到最大化。他们也一定认为，国家主权只存在于无市场的区域，如只在法律秩序和防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样单一的主权力量在基本经济领域，如雇佣权或者在文化特征方面也应该有一个全球自由市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断，它至今仍代表了一种热情的且最具说服力的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观点。斯密认为，通过扩大社会分工协作和专业化，自由贸易将对全社会资源进行更佳的配置，从而增加真正的财富：

> 在经营各自家庭的财产时人们是多么地谨慎，那个王国中很少人是愚笨的。如果外国能提供比我们自己制造更便宜的商品，那么最好用我们自己某一具有优势产业的产品跟他们交换，这个国家总的工业，由于总是按一定的资本使用比率，将不会因此缩减，反而会发现一条能发挥最大优势的使用途径。当然，这不是在雇佣方面达到最大优势，而是导向一个目标，它能买到比自己生产的更便宜的东西。

斯密坚信，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所有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来

保护其特殊产业的尝试，只会降低“其土地和劳动力年产出的真实价值”，因为它将减少在一个既定投入水平下的总产出，因为资本和劳动力将流向那些比国外相关企业更无效率的企业，并远离那些比国外相关企业更有效率的企业。更有甚者，贸易限制将会减少一国税收（比如产出的价值），这将带来一种长期的后果，即缩小潜在的工业基础规模，因为资本投资只能有比例地增加一国的总税收。斯密认为，比较而言，自由贸易将使每个国家发挥本地区的优势，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它想要的商品；这种效率的增加将使未来投资比率增至最大，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将保证投资会以最有效的生产方式进行。

大卫·李嘉图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中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传统论点。该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在其具有超过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的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是有利的，而且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也是有利的。一个国家可能在大部分或全部产品上拥有绝对的生产优势，但对它来说，与生产力较低的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有利的——通过专业化生产，只出口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那些与别国产品的效率优势相比，它超过竞争对手的效率优势最大的产品），并进口那些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那些效率优势最小的产品）。同样地，对于一个相对非生产性国家来说，（在绝对条件下）与外国进行贸易，并集中于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生产劣势最小的领域也是有利的，这样可以减少由于生产力低下带来的成本。按照这个理论，贸易将使所有国家提高他们自身内部的机会成本率；通过允许每个国家——在必要的汇率调整后——在具有相对较高生产力的领域内进

行专业化生产，贸易将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各国真实财富总量。

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现代自由贸易正统观念的主要成分。像所有其他的市场交换一样，贸易被看做是互惠互利的，而贸易保护主义则被认为减少了效率和财富。贸易保护主义的成本可以分散到所有消费者身上，因此，比起集中于有关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好处，它就不那么明显；但在总水平上，人们一般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减少财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二战以来，贸易逐步自由化导致的世界贸易的巨大增长确实促进了世界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增加了贸易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同时，贸易通过增加竞争给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并且——至少在一些地区——给了他们更多的商品选择。例如，如果欧洲生产者没有面临日本的激烈竞争，那么欧洲市场上的录像机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便宜和高级。

然而，尽管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具有不可怀疑性，但它们还没有获得一致的赞成。在过去的200年中，那些认为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希望管理它的人与那些认为贸易应尽可能自由的人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不同程度上，许多国家希望从实行管理贸易逐步过渡到自由贸易来减低其社会的过渡成本。一些国家通过关税、补贴或非官方的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产业；这种干涉显而易见容易造成（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利润增长的扩大及不完全竞争。但有些专家论证说，到20世纪末，在一个区域贸易集团取代全球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得到更好的供应。他们认为，这将使得区内自由贸易的许多优势与资本和劳力结构根本不同的区域之间管理贸易的许多优势结合起来。

对于所有这些管理政策或半保护主义的政策，总是有三种基本的反对意见。第一，自由贸易主义者坚持认为没有一个政府具有成功管理市场所必要的组织能力或详细信息。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在一个天赋自由（及自由贸易）的体系下，"统治者被完全免除了义务，在试图履行该义务过程中，他总是必须面对无数的欺骗，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或知识来进行适当的运作，这个义务就是监督私人企业，并引导它朝着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第二，斯密之后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通过鼓励适应和创新，自由贸易竞争的压力比贸易保护主义更能形成贸易与财富创造方面成功的必要条件。比起政府的帮助，忧虑是企业更好的保姆。反对管理贸易的第三个一般论点是，报复性关税的不断提高将导致的危险是贸易战。即使幼稚产业在利润增长条件下运行，干预也只有在不被其他贸易伙伴赶上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表面理性的一方行动常常引发针锋相对的报复行为，并导致浪费又无效率的关税或补贴的螺旋式上升。同样地，退回到通过对外关税保护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在理论上听起来可能是个好主意，但是一个为达此目的而设计的关税壁垒的突然建立会引起严重的经济震荡，损害第三方以及——当报复来临时——那些首先提高关税的一方。本世纪30年代有一个这种现象的精确例子，从那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就被冠上这么一个坏名字。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的一次突然大幅提高加上使邻国困顿的竞争性货币贬值毁掉了世界贸易，并对加剧（虽然不是引发）30年代的经济萧条负有责任。毫无疑问，不协调的及竞争性的关税壁垒的建立会引发严重的破坏。正是为了避免这点，二战后关贸总协定被建立起来以协调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这个过程在

促进贸易方面很成功，大部分人都同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

在经过40年世界贸易的成功发展及世界范围内对贸易自由主义的一致赞同之后，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因素集合起来又重新激起以往的辩论。一个是1993年达成的关贸总协定的新协议，大大地增加了自由贸易的范围(不论在地区还是在经济部门)。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渗进，也不可能引起这么多的争论，这个因素就是1988年后的几年间地震般的地缘政治的变化，一方面俄罗斯、东欧、越南甚至中国的一部分汇入了世界经济，而其他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发展，比如拉美国家和印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开放度更大。自由贸易区，原本包括大约7亿非常富裕的人，现在包括超过20亿～30亿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很贫穷。然而最关键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外汇与资本管制到1993年实质上已被取消，资本可以自由追逐它们所发现的最好的投资机会。自由资本移动使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投资资金越来越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高回报的投资机会，结果发达国家自身的生产投资则减少了。人们开始担心，国内投资减少的影响和国外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的结合，可能导致第一世界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并造成发达国家普通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这个过程还会因为新的电脑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而加剧，因为新的电脑与信息技术本身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使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运作变得更容易。跨国公司是生产国际化的主要动力；他们有资本和公司组织的基础，可以在生产中利用所有国家的不同优势。因此，产品研究可在英国进行，电子产品在美国生产，而物质产品在东南

亚或波兰制造。当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移出第一世界时，人们担心发达国家将只剩下高失业以及巨额政府福利支出——如果不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的工资没有大幅下降（即在管理的情况下）——或者，带来更多的贫穷。如果工资率下降（即在不受管理的情况下），二者必居其一。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由于自由贸易地区扩大导致财富的增加将产生更多的投资（及工作岗位）。然而最应注意的是，斯密和李嘉图都假定，额外投资的大部分将投在资本家本国，投在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各个领域；这样，贸易带来的更多财富可以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受益。第一世界国家的危险是，这将逐步使它们转变为靠投资生活的国家，主要靠投资在别处的资本而生活，而国内投资的仅是一些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特殊产业，这些产业不需要普通的劳动力。那些有幸拥有可获得租金收入的资本的人，以及那些在富裕国家的绝对或相对优势领域里具有必要的特殊技能的人，当然可以生活得很好。而那些没有什么技术或资金的人，却只能靠福利或服务于新的世界精英的需要而生活。许多中层职员可能属于那些好运气的人；因为在电脑软件领域或像印度这样人口稠密、低工资的国家的会计工作领域有许多需要大量人才的合资企业。降低汇率未必可以解救第一世界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反而会减少这些劳动力的世界价格及其工资的购买力。虽然国内劳动密集型投资在减少，但第一世界国家的总财富在总水平上及在新的更大的自由贸易领域里将继续上升，因为在别处的生产投资利润将不断增加，而且他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高技术特殊行业，也使新的机会不断增加。这个总的成功将掩饰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严重不公，即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尽管如此,由于专门出口,来自外国的投资收入,国内数百万失业人员、在业人员和日益增多的贫穷普通消费者被抑制的需求产生的经常项目的盈余,会导致汇率上升,这些富裕但又日益不平衡的国家的汇率上升,可能恶化穷人及不熟练工人的困境。许多欧洲国家,像瑞士和法国,于 90 年代中期(在不同程度上)便处于此种状况。

贸易自由化当然总是同时带来代价和好处。在每个国家,那些在他们国家不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的人将首先受到损害。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利益将大大超过这些短期的代价,只要经济不被过度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及管理所歪曲,贸易导致的专业化领域的增长将很快吸收失业的劳动力。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对自由市场体系的效率及适应力的信念,只有当自由化过程被管理是为了降低变化的速度及避免经济震荡的时候才是对的。他们认为,只要变革速度不是太快,人们可以很好地适应,市场可以得到有效的开拓。如果这个过程太快,就有滞后的严重危险:股本会被突然的自由化摧毁,如果给予一定的适应时间,它本可以很好地竞争;而且,如果失业率上升太快,人们将不可能再培训,他们会变得沮丧,并加入长期失业的行列。那时可获得的资本及劳力将更少,从而导致更低的发展速度。同时,快速的变化更可能使在非竞争性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大幅下降,从而使社会上工资级差的扩大成为必然。甚至伟大的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亚当·斯密也认为应谨慎考虑引进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他在《国富论》中论证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要求,贸易的自由应该慢慢地分阶段地恢复,而且应该有相当的保留与谨慎。"他还认识到,如果贸易自由化突然被引

进，那么资本所有者将永远失去那些被套牢在没有优势的行业的资金。斯密后来在同一段文字中写道："因此，对他人利益的关心要求这种变化不会突然被引进，而是慢慢地、逐步地在很长的警告之后。"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二战后贸易及资本移动的自由化之所以如此成功和受欢迎，正是因为它是渐进的，而且因为它的成员国大部分是强大发达的国家，它们有着较接近的经济结构及工资水平。相比之下，80 年代及 90 年代的自由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突然引入自由贸易体制，而这些国家的工人有时赚的钱还不到欧洲或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 5%。

标准的经济假定认为，这些快速的向全球化方向的运动确实不会导致第一世界国家经济增长遭到破坏或发生震荡。发展中国家的调整问题很可能使变革速度减缓，以确保自由化对发展及利润有积极的而非破坏性的影响。然而，其逆命题也成立，即发展中国家在迅速适应新的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也可能对世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90 年代后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可能是第一证据，它表明破坏性的震动更可能来自这些国家而非来自第一世界国家内部。但关于这方面的忧虑目前并没有削弱贸易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他们深信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将带来更高的增长率，特别是在具有较少工资刚性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更是如此。

自由贸易主义者也认为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表明更大的自由贸易会使得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更不公平。他们指出，许多经济研究表明，在 80 年代及 90 年代早期至中期，贸易自由化在收入工资级差方面的短期直接影响比起供给方面的改革，例如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削减福利和减少劳动力市场控

制等的影响要小得多。但这可能忽视了一个基本点。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供给方面的改革在短期内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会比贸易自由化本身来得更大，而且，由于日渐明显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性竞争的残酷性，供给方面的改革显得更加迫切。至少可以说，供给方面改革的社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贸易自由化的间接影响。

而且，从长期来看，完全有理由担心全球化的间接影响将和自由化的更加直接的影响融会成一体，从而导致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的危险。那些掌握了新技术、新设计、新管理技能的人会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做得比以前更好，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去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技能。那些投资者可以通过新投资带来回报的增长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进一步的利用来获得成功。但那些没有技术或其技术已过时的人将日益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与那些来自于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相竞争，这种现象在贸易商品部门表现得最为明显。甚至在服务部门，由于人们对就业的渴望，同样的压力将使那些无技能的工人无法要求高工资。因为从现在开始，正是在服务部门，电子计算机革命将在最大的程度上节省劳动力成本——部分原因是电脑将完成许多归档工作，这比人力更加廉价，而部分也是因为全球电脑网络使许多公司可以对世界其他的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提供帮助。甚至在一些和电脑技术毫无关联的劳动力密集型服务部门，像饭馆或道路维护部门也是这样。从其他部门转来的大量的工人以及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移民压力，将使发达国家中无技能工人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当然，经过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熟练程度会得到提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提高得更快。

由于近来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的程度和影响的改变，在未来几十年内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将进一步扩大，而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政治和道德问题。在欧洲大陆，统一的政策决定了英国更高的工资下限、更好的对雇员的保护措施以及更好的福利制度，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地区的迅速扩张使其拥有亿万的低收入的工人，这可能使已经非常严重的失业状况和庞大的政府开支进一步恶化。为防止失业而增加的开支将造成更高的公债水平、借贷成本（从而挤出私人投资并引起更多的失业）或更高的税收。另外一种可能的措施是大量削减政府开支以及福利保护水平。因此，欧洲国家可能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是过量的政府开支使他们承受高借贷成本和高税收的负担，从而放弃部分贸易增大所带来的红利的增长；要么只能大幅度地削减福利支出，从而使社会紧张，两极分化加剧。此外，如果欧洲国家想在新的全球市场立足的话，他们只能选第二种。这是因为，在一个人才和资本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的新时期，高税收（特别是较高的边际税率）将导致人才的流失，而更高的政府借贷将导致利率的下降和资本投资的损失。政府在新的全球市场已无能为力，它无法满足选民的要求去采取行动来防止自由市场上的缺陷。

如果转型速度太快的话，新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运动的影响也可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消极的后果。特别是新的全球经济正在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平等，使贫富两极并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导致政治危机。东欧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突然放开市场会产生什么问题。东欧实行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动荡，

使许多国家甚至到1996年仍无法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产出水平，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一些人民已变得比自由化前更贫穷，而在这些国家中的另一部分人却能够享受到做梦也没想到的富裕。在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别的突然增大正在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并造成公众对自由资本主义甚至对民主的无动于衷。同时，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农业上的自由贸易的扩大，将加速农民赖以生存的耕作的消失，并造成从乡村到城镇的突然性的、有害的大规模移民。因此，对增长和物质进步的盲目追求——通过迅速实现自由贸易，全球资本流动和自由市场改革——很可能导致如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冲击"。

在自由市场全球性的关键性扩张后的10年内，要作出结论仍为时过早——我们不能肯定长期影响是否会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状况恶化。如此众多的新兴经济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自由贸易体系，必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混乱，而在试图估计这种经济和社会破坏的本质和范围时，将现在和一战前45年的形势相比较将使事情更明了。一战前的那45年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贸易迅速增长的时期，当时由于新兴市场的增长（主要是美国），世界贸易非常兴盛，相对自由的资本流动和全球性的市场导向体系被普遍接受。当时欧洲的增长最快。但那个时期的前25年却是以严重的通货紧缩、很高的借贷成本和劳动市场的混乱为特征的。通货紧缩和萧条首先从农业部门开始，这是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具有低劳动成本和日益机械化的北美大草原生产出大量廉价粮食运往欧洲，充斥了欧洲市场，最终导致欧洲大陆的就业率急剧下降。到1914年，英国农业的雇佣人数只

占就业人口的8%，而在1870年其农业就业率达25%。这些失业和通货紧缩也并没有促成低成本借贷，因为在新世界里投资带来的高回报，使实际利率保持在高水平。

如果将90年代与1870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作个比较，结果是很清楚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将更加令人担忧。首先，在早期，欧洲能够通过使大量的无产者迁移到人口稀少的新世界来缓解其农业部门崩溃所带来的压力。从1880年到1910年，大约有2600万人从欧洲移民出去。而今天，发达国家所面对的是大量入境的移民，而不是出境的。这就加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工资水平平等化，也带来了额外的社会压力。其次，19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福利制度，所以通货紧缩和失业并不会使政府像现在这样努力去保持储蓄而维持高公共支出和高预算赤字。再次，欧洲，尤其是英国，在19世纪是新生世界的一个净债权国，这使它在其他地区的投资获得良好的回报。今天，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瑞士和荷兰是巨大的净债务国，而主要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总体上也是净借贷者。最后，在19世纪末，欧洲通过引进关税来对付新世界和俄国的竞争却造成了经济混乱。只有英国拒绝走上这条道路，它仍然以世界的金融家和运货人的身份赚取利润，后来则通过英联邦优惠体制而获益。相反，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却在降低关税方面不断地取得进展。所有这些因素表明，在未来几年的经济混乱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比19世纪末欧洲所遭遇的挑战更大。今天的经济更加复杂，更难以快速适应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工人所接受的最低保护水平现在已大大提高了。

在19世纪末的欧美动荡时期之后，那里出现了日益增长

的政治上的共识(这与成年男子投票权的普遍进步相巧合),这就是必须对工人进行一定的保护并帮助那些不够幸运、不够成功、不够聪明的人。这导致工会的全面合法化以及基于再分配性税收的福利制度的逐步建立,这也为凯恩斯理论扫清了道路——在下一个经济萧条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必须竭力找到改善自由市场运作的方法。在自由贸易理论领域,自 19 世纪以来,有许多人关心自由贸易对分配的影响,并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产生怀疑。斯密认为,自由市场能保证新财富按社会阶层从富人到穷人之间进行阶梯式的分配——即所谓的"滴入效应"。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分配),人们之所以会怀疑社会财富增大与总的福利或幸福的增加是否完全相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增加1 000英镑给一个在温饱线上的家庭所带来的福利和幸福要比给一个亿万富翁大得多。但如果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成立,就与一个很自然的推论相悖: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将创造更多的财富,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将随之增加。事实上,如果更加自由的贸易的发展所创造的新财富被富人获得,这样贫穷的人将更贫穷。反过来说也照样成立。当然,问题在于,由于无法对一个人所获得的效用、幸福或福利进行科学的比较,因此也无法确定自由化所创造的额外财富对获利的人产生的效用是否比因这种移动所造成损害的人更小。

许多经济学家希望避免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效用比较,因为这不科学也不准确。正如我们在第 6 章所看到的,他们把帕累托标准作为一个不可争议的指针去判断不同产出的相对

渴求性。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在一种状态下,即所有人都受益而没有受损害的时候,那么这种状态是最理想的或是最有效的。我们已经看到,正是这种理论显示了一种能够令人满意的神话般的"完全自由市场"。虽然帕累托理论为一个完全自由市场均衡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它并不能帮助自由市场者合理地判断向一个真正自由市场或自由贸易发展在道德方面的可行性。它也不能保证从一个半保护主义的体制向一个更完全的自由贸易体制转换将有助于帕累托理论的改善,即在没有使任何人损失的情况下达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因为在任何一个向自由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总是有人获益,有人受损。

围绕这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支持穆勒的建议,即那些从自由贸易转变中获益的人必须对遭受损失的人作出补偿。只要从转变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遭受的损失,那么赔偿支出将会使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在向自由贸易转变过程中没有人受损。当然,这样的补偿支出无论是从理论上设计,还是从实践中建立都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此类推理构成了本世纪初在政府支持下通过税收制度对收入与财富的重新分配的基础。这个用于再分配的税收体制是挺有用的,而且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从总体有利的变化中受益。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这种再分配税收并不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那些拥有资本和技术的新兴产业巨头威胁说,如果政府敢向他们征收重税的话,那么他们就将离开他们的国家和社团,结果,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政府所保证的提高所有人的福利的能力遭受了潜在的致命打击。

滞后的危险、社会混乱和政府在收入再分配和保护贫困

者福利上的日益无能，还不是突然贸易自由化的惟一潜在成本，全球自由贸易的威胁使它更难在经济的贸易商品部门建立一个防止环境遭受破坏的机制。如果公司遵守环境保护的法规而采用更高成本的生产办法，那么他们将在自由贸易体制中面对来自其他没有执行这些法规的国家公司的竞争。结果，跨国公司可能会把生产转移到不受严格控制的地区，而一些小公司可能会因无法转移其生产而破产。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提倡通过征收污染税或贸易配额将污染或资源损耗纳入价格机制。但这个市场办法（它可能在欧盟或美国内部可行），对在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中的小国商品贸易部门是行不通的。那些把外部性内部化的公司与那些在贸易中没有被要求这么做的公司相比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实行自由贸易时为减少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环境成本的措施应该是全球性的，并要创造一定水准的公开竞争场所。但实际上，全球共识是很难达成的。复杂的市场解决办法如税收或配额是不大可能被使用的，因为无法达成全球性统一的税收或配额。而且，全球自由贸易更难使欧盟或美国用贸易让步作为引诱手段去鼓励在所有污染国进行环境合作。因此，更大的自由贸易可能使人类更难于减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

现代世界大多采取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事业的进步。这一策略能否成功要看 80 年代、90 年代的自由化程度的大规模提高能否促进更高的经济增长。也要看经济增长能否以可接受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为基础。如果快速自由化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被大多数人认为太高了，那么更高的经济增长的成就与普遍的对人类进步的信念的联系就完结了。而如果政府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日益增长

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表现得软弱无能的话，那么民主本身也会成为自由市场的牺牲品。世界的命运将是社会斗争和政治动乱。而最后市场经济也会让我们失望。

第十二章　利己时代

经济支配一切，决定政治决策和社会行为的界限。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出现，加剧了竞争，并在效率的要求下产生一种严重的自恋式的个人主义。

——巴西总统卡多索，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

在经济学中，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认真的经济学家经常强调他们的科学只关注手段；至于目的，则留待别人去定。虽然如此，但要划清这条界线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经济学家关注实际问题时，正确的目的可能就隐含在他的建议中。

——R·F·哈诺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

伦理学与经济学

经济学是对人类生产及财富分配的行为的研究。大多数的经济分析是对经济究竟如何运行以及特定的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科学的分析。这种“积极的”经济学强调的是社会所采取的用以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或结果的方式的效能。它关注的是这类问题，比如说，干预或放任自由哪一个是减少失业的最佳方式；货币供应的目标管理是否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可信方式。经济学家往往在积极的经济学与普遍问题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以便使他们的科学不受道德问题的侵害——比如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达到这些目标哪种方式是可以被道德观所接受的。经济学家希望避免对什么样的经济变化包含着人类进步作出价值判断。他们认为，社会目标及不同方式(手段)的道德可接受性应该由政治进步或社会伦理来决定。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那些方法的限制下来促进目标的设定。

尽管这种积极问题与普通问题之间的分析性区别本身具有理论上的价值，但在考虑实际问题时，假设经济学的规则可与道德截然分开，却往往会引起误会。在复杂的日常事务中，适当方式的考虑与期望的目标(或结果)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而且经济学的合法范围与政治学及道德观的合法范围也并无明显区别。这不仅仅是因为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无论其分析是如何客观，他们都是某些特定目标的热烈拥护者。这也是因为为有效达到一个特定目标而采取基于客观的科学分析之上的某种经济机制，往往会对社会达到其他目标的能

力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除了各种机制在达到特定目标方面会有不同的效能差别之外，不同机制对社会的渴望甚至社会价值观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有很大不同。情况就是这样，比如政治家要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比如更多的放任自由或更多的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放任自由、最低工资制的废除以及工会势力的衰落，可能会比政府的干预更有效地降低失业率。但这种效果则可能以牺牲社会凝聚力和团结为代价。它还可能拉大收入差距以及造成大多数人安全和工作条件的恶化。经济方式的选择可能会以简单的效率问题的面目出现，但它们往往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这种方法是自由市场政策，比如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和全球自由贸易，那就更是如此了。这时社会将变得别无选择。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人类进步的目标将为对效率的强制要求所支配，比如许多公司为保持竞争力正进入更无情的削减成本的漩涡中。正是这些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本的界限变得不再那么简单明了，因而也更加危险了。

正如本书前面章节所探讨的，18 世纪亚当·斯密的理论以及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共同助长了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含糊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果：使许多明显的道德问题的考虑屈从于更狭隘的经济效益问题的考虑。但这并非斯密本人的初衷。比如，在《国富论》中，斯密已敏感地认识到，劳动分工给劳动者的心智所造成的潜在的异化的可能性。因此，他倡导义务教育，以便使人们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受到陶冶以对付工业化的压力。同时，作为《道德情操论》一书的作者，斯密强调同情和仁慈在创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社会的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显然,斯密的意思是,只有在一个有凝聚力和道德约束的社会中,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才会同时为公众利益服务。斯密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合作和凝聚力才会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冲动所进一步加强。因为,由于劳动分工,进行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和交易对每个人的自我利益都有好处。但是,斯密所作的这种社会和道德背景的假设并没有他对自由市场机制的详细描述那样具有持久的影响。正是这种从他的其余论点的前后联系中抽出来的描述,似乎就论证了在一个公平的完全竞争的体系中,个人在自由市场上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就可以推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地保证一种结果,即开发一切从市场交换到所有的自由市场参与者都互利的潜在利益。对许多人来说,这真是个极富道德吸引力的结果——既带来个人的最大自由,又无政府干预,至少在经济活动领域是如此,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要求明确的道德动机了。利己和竞争都显得积极而有利,个人的天赋自由的种种好处也显得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谐一致了。

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后的150多年,斯密苦心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框架却变得更具有方法论、道德内容和功利主义的意味。因为这看不见的手与功利主义有着更明显的联系。功利主义从心理观察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个人的幸福,只要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合乎道德标准的。这看不见的手似乎表明,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并不会对利己的个人要求太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与天赋自由的全套标准相一致。如果幸福被定义为欲望的满足,如果所有个人的最主要的欲望都在市场上被表达出来,进

一步地，如果这看不见的手在互利的交易过程中可以保证每个人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那么，自由市场无疑是功利主义者军械库中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好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教义的吸引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与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并驾齐驱。正是古典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共生，再加上19世纪由于高压统治揭竿而起的自由主义者把个人自由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自由市场体系应具有真正的道德内容这一观点反而不被许多人所接受。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逐渐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理想，同时又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论。这看不见的手似乎费了好大的劲来调整对个人自由的道德要求与功利主义者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特定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

然而，作为一种道德体系，功利主义也有其弊端，而其中的某些弊端在自由市场经济学被暗中抬至道德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后也同样具有。功利主义者认为只有结果是重要的，个人动机的道德内容对于他们的行为结果的道德内容来说是次要的。比如，如果自由市场真的能通过驾御个人的自私动机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那当然更好。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个人动机的道德吸引力。功利主义还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一些人的福利是可以接受的。个人权利和道德规则只具有派生的地位或辅助性（工具性）的价值，如果考虑了所有因素而且所做事情的结果是积极的，那么二者还是可以让步的。

在古典经济学中，在既定的指导性框架或自由市场体系中，自由市场均衡并不要求在交换过程中必须有任何一方的利益遭受牺牲。人们只有在这样做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情况

下才进入自由市场进行交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均衡可以基本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市场远远比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当然这种更大的自主性是以失去许多功利主义教义的吸引力为代价的。对于那些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利的人,即使某些收入再分配会使效用最大化,财富和能力仍会维持现状。尽管神话般的完全自由市场体系并不会使任何在其中操作的人通过自愿的互利交易过程而变得更糟,但是自由市场体系的动态的发展(涉及对市场运行所依据的法律及税收的结构性框架所作的改变)却会使个人变得比以前更糟——有时简直糟透了。因此,当政府选择转向一个真正的更为自由的市场时(比如在贸易方面),并选择不施加干预来保护那些在供需变化中受损的集团,他们实际上是在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保全多数人的利益。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信条中,施加干预以保护社会中受损成分的福利被视为提高效率。由于平均财富最大化被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目标(功利主义含含糊糊的论调),社会整体财富的最大化就被放在保护少数人利益或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之上了。

对自由市场机制在道德方面的优缺点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判定其比照纯伦理学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明显的框架所隐含的伦理方面的内容和地位。一些其他的伦理系统对功利主义以及自由经济学的只看结果、只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对探索人的道德动机和个人权利缺乏内在的兴趣。比如,一些伦理学家非常重视个人动机的道德本质以及个人的正直性。他们认为,关键的不仅是我们行为的结果是良性的,而且我们行为的动机,如利他主义和仁慈的美德

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认为，有道德的人与有道德的行为一样重要。另外一些哲学家认为，既然理想的美德，如利他主义和兄弟般的情义不可能普遍地得到，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利己是个人动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必须对其加以控制。为更好地对利己主义加以控制，他们就可能规定，个人在自由追逐个人利益和社会在实现最大多数人福利最大化时，必须遵循一些绝对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包括客观的道德真理，它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积累。他们认为，个人不可能总是知道他每次行为的特定的结果。他们要求个人有时应自觉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并要求社会尊重个体的尊严以及权利和福利受损的个体，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许多伦理学家极其重视个人的权利，虽然它会妨碍实现所有其他人的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能赞同康德的伦理思想，即人不应该成为实现某一目的的工具，人本身应该被视为最重要的目的。比如，人不仅有权获得生命和自由，也有权变得富裕，那么这个伦理信条就意味着，不能以牺牲少数人的富裕为代价来增加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当变化发生以后，比如自由贸易或采用更高级的电脑技术影响了一些人的生活而增加了大多数人的平均财富，那些从这种变化中受益的人就必须给那些受损的人以补偿。从这种非功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整体的进步决不能损害少数人的利益。

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当然一直赞同财富的再分配以照顾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因为财富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比如1000英镑对一个穷人比对一个百万富翁显然更宝贵）。但功利主义要求再分配是为了使每个人的福利或幸福最大化，而没有承认个人获得一定的福利水平的权利。功利主义虽然也

允许个人获得总效用下的平等的一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或较多的)效用。自由经济学家则摒弃了这种以边际效用递减为理由来要求财富再分配的做法。这部分是因为，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作效用的比较是不太科学的，而且也没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再分配可以使福利最大化。既然为再分配而制定的税收或管理规则(如最低工资)会干扰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便以“科学”的面孔出现，强烈地反对财富的再分配。在他们看来，再分配会降低效率，打击积极性。尽管自由经济学宣称要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从而提高自身的地位，但由于它不愿意积极干预和抑制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所以其主张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在政治辩论中被忽视，因为自由经济学所具有的特征蕴含着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不能放弃和让步的，是科学证明了的正确的观点。正如凯恩斯所言，自由经济学，从财富和商业社会的角度来看，可以解释在进步的过程中，社会不公和明显的残酷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企图从总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只会弊多利少。自由经济学对少数幸运儿来说是一种便利的意识形态。

功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可以为所有的道德判断提供一个共同的尺度。它认为，道德冲突可以通过计算不同的选择所具有的总体效用而简单地加以解决——比如幸福或欲望的满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那种认为所有的欲望都可直接地加以比较，所有欲望的满足都可以在一种尺度上作数量的估算显然是错误的。但在这里，经济学好像可以来拯救功利主义了。因为经济学中，所有用来满足欲望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用一个可比较的单位(即货币)来表示。如果所有重

要的欲望都可以有效地通过自由市场表现出来(市场知道得最多),并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自由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得到满足,那么经济增长率就可以真正代表预期的欲望满足总水平的增长,这样,相关的产出的总值就可以通过消费者付出的价格而得到客观的反映。如果福利或幸福就是欲望满足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经济增长率可以真实代表福利或幸福的进步。这一结论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经济增长被放在政治和道德目标的首要位置。

但是,正如本书所阐述的,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福利提高是错误的,原因如下:一是有许许多多人类重要的欲望并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比如希望没有污染或期望社区精神);二是因为在自由市场体制下,那些没有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欲望更容易受到挤压而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满足;三是因为,即使在那些通过市场表现并得到满足的欲望中,我们也不想在道德上把它们同等对待——如合理的欲望(食物),不合理的或反社会的欲望(淫秽物品),创造出来的欲望(时髦的东西)——而是统统地用相对的货币价值来表示。而且,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福利提高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给欲望一个货币值是用来衡量购买者的财富以及有关个人欲望的强度。所以经济增长主要是衡量富人欲望的满足。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失灵、协调问题以及极大的不确定性使通过市场表达的偏好与人们真正的社会偏好的满足二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尽管如此,"市场知道得最多"以及经济增长是福利提高的同义词的谬误还依然存在,并导致我们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变得狭隘——这是很可悲的。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在这个金钱万能的时代,不通过货币表现的对商品的

欲望被日益忽视了,并退出了社会经济生活。我们认定的、惟一的、最高的价值就是用市场价格表示的价值。

个人主义与社会的死亡

本书的许多章节都重点讨论自由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我们已经探讨并得出结论:市场效率与分配平等之间缺少联系;自由市场体制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如洁净的空气)的需要;难以通过自由市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污染、拥挤和资源的损耗。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市场常常无法达到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所说的最优均衡状态。但对许多评论者来说,使自由市场机制不再是人类进步的强大的发动机,而成为人类福利和公众利益的威胁,其原因并不是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失灵和局限,也不是因为有些经济学家把自由市场经济的方法论提升到功利主义伦理信条所规定的道德理想和天赋自由的理想而造成的,而是由于自由市场削弱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坚持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自由追求,对于财富创造和经济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他们的言论过于夸大其词,因为自私的个人主义反而破坏了我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道德秩序。

一些功利主义哲学家认为,所有的个体实际上都是把追求他们个人的幸福作为他们所有行动的惟一目标。而这种狭隘的认为个人是自我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者的观念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声称它可以证明:

只要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促进公众利益的增长。这种认为自我利益是个体惟一的重要动机的狭隘的观点，哪怕是分析一下经济的运作本身就可知道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其他类型的动机和情感对经济的成功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责任感和牢固的职业道德往往是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日本）的重要特征。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节俭对于产生良好的储蓄率和资本投资是很重要的。信用对于成功的经济关系，如经理与职员或公司与供应商也很重要。而诚实是交换机制的最基本的润滑剂。如果信用和诚实很重要，那么个人在某些关键场合就会放弃或搁置对个人利益的不断追求。如果信用和诚实垮了，社会和个人就得花很大的精力和资源来制定详细的规则和合同，甚至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强制执行这些规则。福山在他的《信用——社会美德与兴旺繁荣》一书中说道：信用和诚实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律师费用、预防犯罪开支、安全保卫和监狱看守等费用的巨额增加，而所有这些费用则通过税收摊到其他经济活动之上。福山认为，未来只有那些具有高度的信用和社会合作的国家才能把经济搞得最好。而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在这个自由市场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要维护这些社会美德是很困难的。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熊彼特在1942年所作的预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将逐步削弱资本主义本身所赖以建立和取得成功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道德基础。

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迷信所造成的对社会组织的破坏比对经济增长能力的损害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这种反社会行为和群体价值观的逐步瓦解到底是由自由市场还是由宗教

和社会道德框架的瓦解造成的，目前还有很多争议。但假如在过去的20年中无处不在的自由市场观念对此不产生一些影响那才怪呢。个人对自由追求个人满足的崇尚以及自由市场论者始终坚持个人应该从人为的社会枷锁（如再分配的税收体制或工会联盟）中解放出来等观点，使得一心地、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变成从未有过的令人尊敬的行为。甚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认为，她作为自由市场的鼓吹者的角色比她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社会的首脑更为明显，更有分量。她说："社会是抽象的，而男人、女人和家庭这些才是具体的、实在的。"所以，这些言论如果间接地有助于个人主义而不是合法的经济活动也不足为怪了。如果个人物质上的成功成为主要的目标，如果社会义务和集体责任被看做根本与物质财富创造的胜利无关，那么我们不是会怀疑将有越来越多的个体会通过反社会行为或犯罪来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吗？如果再分配的税收机制被看做是不必要的和不道德的，而不是成功者回报养育他们的社会所应该做的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怀疑黑市、逃税避税是不是会与日俱增了。

当然，比起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和政治家的言辞，经济现实对社会组织结构和凝聚力有着更大的破坏作用。正如本书所要说明的，这些现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害了。在富裕国家，具有相对收入优势的人们对地位和地位商品的获得越来越在乎，而且想用钱买到可以摆脱身体疲惫和社会拥挤的商品，这些都使经济活动从过去的合作变成了激烈的竞争。市场参与者已不再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彼此当作可靠的合作伙伴，而是被看做在竞争中必须打败的对手。他人是自己取得成功和幸福的障碍。在80年代和90年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全球竞

争的加剧造成了更多的失业，特别是在欧洲，工作已经从合作的事业变成了个人战胜同事以免成为下一轮富余人员的竞争性的战斗了。而且，非熟练工人的长期失业，加上财政方面削减社会福利的压力，造成了下层阶级的贫困和绝望。在法国，这些不幸者被冠以“局外人”——这是对那些被社会和自由市场剥夺了权利的人的类似的描述，而社会和自由市场本来是应该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与此同时，全球化又进一步削弱了企业与社会、富人以及精英们与他们的国家的联系。企业如果要生存的话，就得关闭在本国长期运作的工厂而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中去。同时，一些精英拥有在全球环境中很有价值的可移动资本和技术，他们越来越有能力也越来越希望逃避本国的赋税。所谓的地球村并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缺乏社会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在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缺乏责任感而只有自我利益，并都在为生存而殚精竭虑地竞争着。

当然，怀旧地向往那种充满利他主义、兄弟友爱和互相团结精神的旧日时光，是错误的作法。虽然怀念失去的强烈的集体感、市民感以及忠诚合作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正如马基在他的《伦理学——发明正确与错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被一种利己主义和“自我参照的利他主义”或“有限度的慷慨”的混合情感驱动着。换句话说，不只被他们自己的利益驱动，他们也关心和同情别人的利益和命运，这些人包括家庭成员、同事、本地人甚至同一国籍的人。社会行为与慷慨就以此方式依赖于个人所属的团体。但现代生活和现代的世界经济需要流动的劳动力和资本，这些会分裂长期存在的公司，解散团体，使家庭分离。基本上已没有人像过

去一样在旧式的农业、采矿业与磨坊里和他们的邻居一起工作了。汽车也应为团体的瓦解负一些责任，因为它使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分散和无组织性——不到本地商店却选择十里外的超市购物，不乘坐公共汽车以有相互交谈的时机，却宁愿在交通堵塞中蠕行并大声按喇叭互相诅咒。这种团体精神的丧失是20世纪晚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社会风气的变坏也是由此而起的。人类社会世代以来，从个人角度来看，一直是类似的一系列集中的圈子：从个人到家庭，到家族、团体、村庄、地区直至国家。但现在，除了全球外，许多人周围没有可靠的圈子，他们独自一人，有的只是自我意识及相关的信条。

原本个人能在一个清晰的社会与道德框架中解决自己的事情，如今这种框架坍塌了。这有些可归咎于我们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世俗主义。正是从上两代人开始，许多西方社会的大众放弃了宗教信仰。而宗教可以提供一个客观的框架，包括道德标准与个人准则。宗教支持用个人的良心去反对欺骗以及反社会行为的诱惑，它也提供了一种精神的、非物质的尺度来激励人们。凯恩斯自己公开怀疑宗教信仰的缓慢消亡不会削弱社会的道德结构这一论调。下面是由维吉尼亚·吴尔夫1934年4月19日在她日记中提到的一种看法：

> 道德，凯恩斯说，如果能证明没有基督教就没有道德的话，那么他就不去推翻基督教。我开始觉得我们这一代——你的与我的这一代，应感谢我们父辈的宗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而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受过此类教育，因此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从生活中得到那么多东西。他们微不足道，就像处于强烈性

欲中的狗一样。我们拥有两个世界中的东西，我们从基督教得到了好处，却毁了它。

大多数启蒙运动和布卢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认为：当人的理性从宗教教条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时，人类社会将繁荣昌盛。当理性被解放但人们的良心仍被罪恶感束缚，人们的进取心还带有精神上的东西时，凯恩斯对认为自由的好处只有在宗教向世俗时代转化时才变得最大的怀疑，显得越来越有道理了。

在20世纪宗教缓慢消亡的同时，人们对客观道德价值的信仰也在逐渐坍塌，再也没有什么信仰能保证揭示一个简单的超现实的真理。理性与直觉也显得无力去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主观认识之外的道德真理系统。G·E·莫尔把“好”定义为一种只能被直觉认识的、美丽得令人欢欣的事物，或人类交流中令人愉悦之类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一个典型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定义。但是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说，直觉告诉他们，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应建立在不同基础之上，也许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或古典的功利主义。理性当然可以应用在道德辩论以使论证前后一贯和完善，但它似乎无法表现得比直觉更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道德前提基础。理性能分析不同道德原则在不同现实环境中的不同运用会产生不同结果，并参考传统价值观来评判这些结果，但它似乎无法为一个更高级的系统提出一个最终的、客观的、无以辩驳的行动指南和判断标准。最近的伦理调查也表明，从道德真理的客观现实信仰向不同的主观主义的转化，也在削弱严格的道德标准重要性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种作用造成的极

端后果是一些人已经接受了相对主义的观点——即道德信仰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与规范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可以评判其他不同的观点。另一些人的观点不那么偏激，认为虽然存在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和约束，而且它们被当作标准、客观的行为准则（比如，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具有并一致肯定的行为），但是这些准则和约束却从来都不能通过理性毫无疑义地建立起来，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独、完整和逻辑一致性的整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权利和职责是多元化的、无法确定的，而且我们崇尚的目标经常和其他人的目标发生冲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应该一方面让民主政府决定我们社会约束的内容，对由我们不同的社会目标引起的争端作出裁决，另一方面让自由市场机制迎合我们各自不同的个人目的。

然而，不仅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与追求自我利益的道德框架在20世纪已支离破碎，而且政府可以促进某些社会目标及加强社会约束的能力也遭到怀疑。在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理论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调控一个特别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即便是政府负有相对直接责任的方面，如搞好社会福利与环保（比如，同意一种重新分配税赋的因素或设立污染税），市场的全球化也使我们所选的代表们感到软弱无力。在一个全球化自由市场中，如果富人被课以重税以帮助那些住在同一地区的较贫穷的市民，那么富人将会去别的地方；那些制造污染者，如果被要求为其造成的破坏而赔偿，他们将转行从事其不需付罚金的行业或迁移他们的工厂。当民主政府对地域的统治权力无法控制其人民的资本与货币的自由移动时，选出的政治家们将无法抑制许多自由市场造成的缺陷和后果。这样，在社会道德框架瓦解的同时，民主政府设计和执

行的使自由市场能安全运作的合理框架也将松动，政府的力量也会被削弱。

对一些人而言，宗教教条和以往的道德规范的瓦解以及小政府的出现是值得庆幸的事。个人又一次拥有自由，从教士或僧侣国家的高压下解放出来，自由地去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按他们自己的道德观自由生活，从过去令人窒息的社会与道德标准中解脱出来。但是自由向来都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很多人认为，自由并没有意义，除非它包括了一个授权的因素。那些被新自由标准所阻挡或忽略的人们如果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或因一些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变化而一文不名的话，选择自由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更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行动的自由权利可能与另一个人不受损害的权利相冲突。确实，在我们这个不断增加内在联系和更加拥挤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个人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特别是当我们不想去自觉地考虑别人的利益，也逐渐不去追随传统的社会标准与道德礼节时，国家将被迫立法或作出裁决，以防止我们相互冲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堕落成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无政府状态。比如说，如果人们不考虑其房屋扩建时对其邻居采光效果的影响，或是不道德的房东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把坐落于安静的居民区的旅店变为喧闹的迪斯科舞厅而不感懊悔时，社会将别无选择，只能制定一项笨拙的侵扰性计划和消除噪音的规定来保护市民。类似地，如果报纸的记者和所有者的自我利益常占上风，他们将破坏正常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侵犯普通市民的个人隐私以销售不合乎公众利益的报道和故事，那么国家将被迫减少古老的言论自由。在这个利己时代，团

体精神和道德规范正在走下坡路，经常需要“更大的政府”以及更强的国家来干预我们的生活。

在80年代和90年代，最显著的政府权力扩张和个人自由缩减发生在法律和秩序领域。在北美洲和欧洲，从洛杉矶到莫斯科有着巨大的犯罪浪潮，其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部分原因是收入的巨大增加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最贫困社会阶层对绝对收入和工作预期的下降。这种下降是由于全球激烈竞争与快速变换规则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恰恰是个人的经济自由度扩大使其不受外界干涉而追求自我利益导致了限制私人市场外自由这一必然结果。即便是社会里最富有的人们，也在生活中出于越来越多的个人与家庭安全的考虑而把其部分的财富用于购买防盗装置、锁和窗子的铁格，为每辆车装上防盗装置，甚至配备私人保镖。

犯罪浪潮也部分来源于由宗教支持的强有力的道德规范的削弱。个人良心与上帝之眼一直都是最有效的警察。当国家被迫逐步接管原来在很大程度上由宗教制裁以及个人道德良心所扮演的角色，它只能通过加强监督权力来达到目的，而这样做只会越来越侵入和妨碍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现代国家经常凭借闭路电视摄像机和电话录音之类的仪器，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现代社会与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中所描绘的我们不愿承认的那种状况很接近了。因此随着社会伦理的消亡以及相对和绝对贫困的增加，我们不得不接受有组织的对我们的私人空间的侵扰，并看着国家用武器装备自己。这样一来，即便一个小心谨慎的政府也能随便侵犯我们的私人自由。与此同时，传统的种族平等道德标准的遵守，以及在

困难时期紧密结合的团体的实际支持的种种好处，如今正逐步地被一种非个人的窃听电话线所取代，通过电话线，一个邻居可以向当局告发另一个人（甚至无需知道其姓名）。由于社区与社会伦理已经崩溃，国家被迫加强法律制度，增加并制定新法律来控制个人主义与自私行为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现在还很不清楚“大政府”能否在法律与秩序领域运作得比其试图控制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成功些。

在怀疑中进步

对进步的信仰是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同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多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人类理性在科学探索以及在先进技术方面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似乎保证了人们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去理解和控制其困境。与此同时，自由市场在追求经济增长时驾御个人利益有了能力似乎保证了社会整体持久的财富与福利的改善。为了保证我们的成功，还应具有稳固的道德与社会凝聚力框架，以及强大且开明的民主政府作为额外的、必备的因素。至少通过这个紧紧嵌于西方自由民主之上的框架，人们才有理由相信增长的人类理性控制自然的力量以及自我利益在增加财富的创造力方面将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

然而，自1973年开始，普遍的乐观主义精神已被逐渐蒙上怀疑、焦虑和悲观主义的阴影，当科学的开拓者进入更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时，人们开始怀疑知识本身取得进步的范围和本质，怀疑人们能否充分了解和预测其干涉更具综合性的、复杂的生命系统效果的能力。有一种情绪在滋长，害怕我们

既没有智慧又无道德资格来运用众多的科学所给予的巨大力量,并使之产生好的结果,为大多数人造福。由于自由市场政策作为人类进步的发动机,其局限性正逐渐显现,另外个人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更加明显。我们忽然发现原本假定的自由市场所赖以运作的强大的民主政府和一个一致的社会道德框架正在瓦解。自由市场正在吞噬着我们未来所依赖的社会道德与机构的基础,正像我们无悔意地浪费资源威胁到物质环境一样。人类,由于精明和世故,现在正站在混乱无序的边缘。

当对进步的信仰衰落时,很多人就责备悲观主义者和凶事预兆者,控告他们衰竭了人们努力的能量。他们认为,对进步的信仰是进步的基本前提。基督教对基督再临的信仰也是此意。我们的思想和责任感融入了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救助工程中。伯里用此想法总结了他的思想进步史:

> 纵观历史,为子孙后代着想是人们行为的动机,但这动机是微弱的,有时是很有限的。由于坚持进步的教义具有明显的重要性,由于利益的中心将发生转移,子孙后代能享受到的幸福生活,我们无法享受,但我们的劳作和苦难却有助于给子孙后代带来幸福……如果每一个人可以以自己有意识的行为决定人类的好运或厄运,那么我们对别人的责任将在时空两方面向未来延伸,我们同时代人则是我们在履行职责时微不足道的"邻居"而已。

这种观点在1920年可能还是有价值的。那时候,牺牲及

集体责任的说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但在利己的时代和对短期物质利益疯狂追求的年代，或许我们会认为未来的进步确实值得怀疑。一种认为未来必有进步、必比现在好的观点正在滋长，并为我们漠视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提供了借口，我们惯于假设我们的子孙们将——由于科技进步和日益增长的财富——能够解决我们遗留给他们的各类问题。然而，世界却日渐拥挤，重要资源进一步枯竭，贫富悬殊更趋极端化。那种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心就不再是理由充分的乐观，而更像是过分自鸣得意了。

现代世界面临的问题不计其数。如果我们继续听任全球化和自由化导致的经济效率的日益加速增长，继续将所有循序渐进的要求视为错误的，那么，各个国家、各种机构乃至个人就不得不学会如何去适应人类历史上空前快速的巨变。当环境极限被突破，新的生态界限被逾越，人类就必须寻找全球性的合作来节约能源，并防止环境灾难的爆发。在全球自由市场上，要建立一个旨在防止一些国家滥用他国的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好处的法律并不容易，而且要达成对环境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的全球性共识也非易事。同样地，当技术变革和经济全球化使成千上万旧民主体制下的人们在就业和收入前景上付出代价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这笔通过经济增长而带来的财富，这可能包括更多的就业分享，工作时间上自愿限制或是强制性的限制，以避免一部分人因过度工作承受巨大压力，而另一部分人却得忍受失业和贫穷的折磨，以及由此造成的明显的社会不安全。只有想出某种方法，使现有的收入较理想的就业机会得到更广泛的分享，我们才有希望解决失业者日益贫穷、日益边缘化这一严重的社

会问题，也才能使技术变革兑现它早先的承诺，让就业者拥有更多空余时间而又不增加失业。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前景不容乐观，因为这种转变必然要求重新设置社会优先权，人们不再狂热追求物质商品，不再为获得显赫社会地位进行斗争，使成功人生转向赞赏能享有更多空闲时间，并品尝友情带来的愉悦。这种转变也要求重新恢复对政府职能的信心。然而，恰恰相反，90 年代的社会公众看来却更着迷于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战后舆论通过强大的集体行为来满足全社会的需求，似乎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在收入重新分配这一长期存在争执的领域，集体行为不受欢迎体现得最为明显。五六十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都一致性地征收高机动税率的所得税，尽管当时知识界反对打击积极性，削弱增长的收入再分配，并为此发起了一次颇有影响的争论。因为经济增长的奇迹和滴入效应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为穷人带来了利益，那时候就业充分、工资也在快速地增长，甚至即使没有那些收入再分配的税收体制，西方国家的穷人仍从强劲增长的经济中获益，除了极少数人，全社会都在增长势头里取得进步和好处。相反地，到了八九十年代，利益增长已日趋集中，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以相当成功的美国经济为例，在 9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终于有迹象表明穷人们又一次从经济增长中分享了一些好处，但在前面的 20 年间（直到 1995 年），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却几乎没有增加。长期来看，当日益增加的技术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还有福利的削减）已对发达国家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就业造成压力时，在许多经济体系中，财富的流动似乎已经减慢甚至停滞了，而且，由于环境限制了对经济增长的无休止的追

求，也由于地位商品和相对收入的优势在富有社会已变得越来越重要，除非收入再分配机制取得进展，否则是有许多其他原因可以对众多穷人的生存情况能够改善提出质疑的。但是，要重新分配必须明确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增加所有成员的福利(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已不可能)，是否会引起目前纳税人的反对。而由于对个人主义和狭隘的自我利益崇尚的日益发展，以及对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的日益普遍的怀疑，大多数选民越发坚定地拒绝支持所得税的增加。这使政府在制定对付未来社会和环境挑战的公共对策时将越来越软弱无力。

自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不同传统间就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并导致各种互相冲突的理想间多样的融合。到底是信仰集体行为还是个人自由；信仰相互合作还是创造性的竞争力；信仰合理计划还是自由主义政策；信仰公民义务还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信仰平等的理想还是个人自由；信仰人类大同还是承认人们不可避免具有目标和志向上的差异，所有这些信仰间都存在着变动着的平衡。而人类在过去 200 年间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大部分时期里，所有这些因素之间都存在过真正的平衡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存在于两恶之间，一种恶即过度，另一种恶是欠缺。"在古希腊，人们普遍认为，"凡事不要过度"是通往智慧和成功的关键。现代社会的进步也的确要依仗节制和平衡的美德。尤其要建立在对个人追求他们自身利益平衡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的基础上，而这种平衡又是通过对鼓励但不是过分干预的合理计划体制和强烈的公民义务意识的重视来实现的。无论何时，只要政府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创造性的平衡被打破，其中任何一个占统治

地位，其结果不是造成无政府状态就是极权主义。只有采取慎重的多样化的方式，经济才能成为成功的经济，社会才能成为进步的社会。

当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大部分时期存在的多重平衡似乎即将崩溃且不可挽回。随着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节节胜利和无法控制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曾长期存在的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有效的政府职能和成功的社会合作都出现了问题。要在公民义务意识和追求合法自身利益之间重建必要的创造性的平衡将十分困难。事实上，我们必须面对一种可能令人不安的局面：过去已存在了约200年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基本平衡将发生历史性问题，或许这种平衡只可能出现于宗教统治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向世俗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时期，果真如此的话，人类进步的前景就令人堪忧了。